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全民著.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5

(世界大人物丛书)

ISBN 7-5007-7353-6

I. 毛... II. 全... III. 毛泽东 (1893 ~ 1976) — 传记 — 青少年读物 IV. A75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3528 号

MAO ZE DONG

策 划:雪 岗	插 图:张 健	装帧设计:卢洲仁
责任编辑:洪 涛 赵 勇		美术编辑:颜 雷
责任校对:沈浚成		责任印务:宋世祁

社 址: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总 编 室:010-64035735	传 真:010-64012262
发 行 部: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 t t p : // www . ccppg . com . cn

E-mail : zbs@ccppg . com . cn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销:新华书店
---------------	---------

开本:787×970 1/32	印张:8.125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
字数:132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ISBN 7-5007-7353-6/A·16	定价:10.50 元
-------------------------	------------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目 录

1. 农民的儿子	1
2. 少年叛逆者	10
3. 走出韶山冲	18
4. 初到长沙城	26
5. 特殊的求学之道	35
6. 不安分的学生	42
7. 文明精神野蛮体魄	50
8. 读“无字之书”	57
9. 社会活动家	64
10. 北京之旅	73
11. 湘江怒涛	80
12. 真挚的爱情	89
13. 在安源工人中间	99
14. 国民党的大官	104
15. 农民运动的“王”	110
16. 挥师上井冈	119
17. 危难之中	132
18. 马背上的诗人	144
19. 窑洞烛光	153
20. 延安岁月	160



21. 重庆谈判	169
22. 李德胜的脾气	176
23. 江山再造	186
24. 初访莫斯科	195
25. 与美国人叫板	203
26. 不怕邪的毛泽东	212
27. 困难时期	223
28. “文化大革命”风云	230
29. 历史性的握手	236
30. 最后的路程	244
附 主要参考书目	254
后记	256



1. 农民的儿子

在中国湖南省的东部,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处的群山中,有一座山峰拔地而起,耸入云霄,这就是有名的韶峰,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中的第七十一峰。相传五千年前舜帝南巡到这里,为这里的秀丽风光所陶醉,令手下人“奏韶乐九成”,引得“凤凰来朝”。从此以后,这个演奏过“韶乐”的地方,就叫韶山冲。那陡峭的山尖,就叫韶峰。那清澈的山间小溪,就叫韶水。

韶山冲属湘潭县,在湘潭与湘乡的交界处,是一个群山环抱、南北蜿蜒起伏的狭长谷地。这里距省会长沙 90 公里,距湘潭县城约 45 公里。当时的韶山冲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

这就是当时韶山冲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韶山冲,有一栋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农舍,屋前有两口水塘紧紧相连,屋后是满山的苍松翠竹。农民毛顺生的家就在这里。

公元 1893 年 12 月 26 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毛顺生的妻子文七妹生下了第三个男孩。孩子出生的第三天,毛顺生请了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给孩子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毛泽东,字润之。因为头两个孩子都夭折了,温顺、善良的文七妹生怕这个男孩又养不活,在孩子两岁时,便将他送到唐家坵的外婆家寄养,拜当地龙潭的一块巨石为干娘,寄名石头,因为他排行第三,便取乳名为“石三伢子”。

毛泽东的祖上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父亲毛顺生读过几年私塾,17 岁开始当家理事,后来因为欠债过多,当了几年兵。退伍回到村子后,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积下一些钱,慢慢还清债务,赎回了典当出去的田产,家业日渐发达起来。他自耕 15 亩地,年收约 60 担谷,全家 5 口人,除去 35 担作为口粮外,还有 25 担左右的剩余,他便将这剩余部分加工出售,做起了米生意。攒了一点钱后,他又买了 7 亩地,生活更加富裕起来。从此,毛顺生便把主要精力用来做生意,田间的耕作和管理全部交给长工,冬天碾米的时候,加雇一个短工干活。但毛顺生并不让妻子和孩子们养尊处优,他让他们



和长工、短工一起去田间劳动。所以毛泽东 6 岁的时候,就随母亲下田干农活了。

毛顺生深知创业不易,守业更难,为了孩子能继承家业,他治家很严。毛泽东刚满 8 岁那年,父亲便送他到附近的私塾去读书。在这里,他读了《三字经》、《论语》、《孟子》和《诗经》。奇怪的是,毛泽东读书从不读出声来,常常急得老师邹春培要点他背书。

“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一天,毛泽东抬起头来恭敬地对老师说。

“你读书之人,不点书怎么要得?”老师皱起眉头,疑惑地问。

“你不相信?我背给你听听!”毛泽东自信十足。

老师一一点来,没想到他果然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老师没有教过的书,他也能认得、懂得。

对于毛泽东的聪敏,老师又惊又喜,同学们借此给他起了个“省先生”的外号。

有一次,邹先生外出办事,临行前,嘱咐学生好好温习功课。毛泽东和几个同学念了一会儿书,便偷偷溜到私塾前的池塘边,脱下衣裤,赤条条地纵身跳到水里嬉戏起来。正当他们玩兴正浓的时候,只听一位同学高声喊道:

“不好啦,先生回来啦!”



听到喊声，毛泽东和几位同学赶忙爬上岸去，手忙脚乱地找衣服穿。

邹先生见此情景，气不打一处来，他要这几个学生和他对对子，对不出来就要用楠竹板打手心。

“濯(zhuó)足！”老师厉声蹦出两个字来。

“修身！”已经穿好衣服的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先生收起了脸上的怒容，不禁连连点头。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学得这样好呢？这可不是天生的。原来，他每天回到家里，除了劳动，就是埋头读书。炎热的夏夜，蚊子成群结队地往人身上叮。毛泽东便钻进蚊帐，在床前放一盏油灯，把头伸到帐子外面看书，有时蚊子在头上和脸上叮了好多包，他还浑然不知，依旧聚精会神地读着。不过，这时毛泽东读的可不是“四书五经”，而是《精忠传》、《水浒》、《隋唐嘉话》、《三国志》和《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私塾老师是不准学生看这类书的，认为这些小说都是闲书、杂书，是误人子弟的。毛泽东不以为然，每逢老师教的课文记熟了，就忍不住阅读“杂书”，他把古典小说放在《公羊传》、《左传》等经史书籍下面，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便偷偷地读。

1906年秋天的一个上午，老师照例给学生们点完了书就背着手出去了。平时被管束惯了的学



生立刻像脱缰的野马，尽情地干起自己喜欢的事，早把读书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了。毛泽东独自坐在座位上，先把老师点的经书读熟了，接着，就悄悄地从小书箱里拿出一本绣像足本《水浒全传》，放在摊开的《论语》上面，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突然，从他的背后伸出一只手来，一下把那本《水浒全传》夺了过去。毛泽东猛地回过头，发现老师正发怒地站在他的面前，眼睛里喷射出两道灼人的火光，厉声喊道：

“你……你……你这离经叛道的学生，我不敢教你了，请你回家去吧！”

这时的毛泽东却显得格外平静，既不申辩，也不向老师求情，他收拾好书箱和行李，恭敬地告别先生，就挑起行李，大步跨出书房，向家里走去。

回到家里，没想到父亲不但没有责骂他，反而高兴地说：“回来也好。反正我也没指望你去考什么秀才举人，当今皇上又废了科举，读再多的书也没用了，你回家种地，还能帮我记记账哩！”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半耕半读的生涯。

停学以后，毛泽东白天和长工一起到田间劳动，回到家里，他扫地、打柴、种菜、挑水、喂猪，忙个不停。

他干活踏实，从不偷懒。踩田，别人一般只踩两遍，他最少要踩三遍。他还在山坡上种各种蔬



菜,把菜园收拾得井井有条。牛栏、猪圈,他也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还常用铁篦子篦去猪、牛身上的虱子、跳蚤和脏物,因此他家喂的猪和牛很少得病。

在长期的劳动中,毛泽东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了穷乡亲,他曾做了不少“傻事”。

一次,正当秋收时节,一场倾盆大雨忽然降临韶山冲。乡亲们急忙奔出家门,抢收自家晒在坪上的稻谷。毛泽东却首先跑到佃户邻居毛四阿婆那里帮着抢收,等他再跑到自家晒的稻谷那里,快要晒干的稻谷已被雨淋得透湿,还有些已被冲进水沟流走了。父亲大为恼火,责骂他胳膊肘往外扭。毛泽东知道,这个时候和父亲申辩,无异于火上浇油。等收拾完稻谷,他才平心静气地向父亲解释说:

“你知道的,四阿婆家里很苦,又要交租,我们家里有点损失,总还可以补救。”听了这入情入理的解釋,父亲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还有一次,一家姓毛的农民,把猪卖给毛泽东的父亲,说好了价交了定钱,但猪没及时赶过来。六七天后,猪价涨了,父亲叫毛泽东去那人家里把猪赶回来。毛泽东到了卖猪的农民家里,只听那位老阿婆连声埋怨:

“唉,我们穷人的命为啥这么苦啊!只怪我把猪卖早了,白白损失了好几块钱。可如今有什么办





法呢？又不能反悔，你把猪赶走好了。”

听了这番话后，一股恻隐之情顿时涌上心头，毛泽东便自作主张，退掉了这桩买卖。当然，少不了又挨父亲一顿骂。

在回家劳动的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每当收工之后，便不顾劳累，替父亲记一天的来往账目。他尽量把账记得清清楚楚，不留一点纰漏。做完账之后，便回到他住的屋，点亮木桌上那盏古老的桐油灯，在暗淡的灯光下，埋头读起书来。父亲发现后，怪罪他浪费灯油，他使用自己那床老蓝布印花被单遮住窗户，以免灯光照进隔壁父亲的住房。

这时候，他不再读那些“四书”、“五经”了，他沉迷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之中。家里没有钱给他买书，他便借书来读。凡是韶山冲能借到的小说，他都设法借来。《说岳全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他一本本如饥似渴地读着。他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些不畏强暴的英雄好汉拍案叫好，他对高俅、童贯、蔡京这些欺压百姓的小人深恶痛绝……

一天，毛泽东又在着迷地读着，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小说中的主人翁净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为什么就没有种地的农民当主角呢？对于这个问题，他思考了两年，终于悟出：这些小说全都颂扬武人，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



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那些写书的文人,也多半是没有搞过田里功夫,没有受过人生艰苦的。那些种田的农民终年劳累,吃不饱,穿不暖,哪有条件和机会读书识字?就是识了几个字的农民,又哪能写书立说?所以写书的当然不是农民。

从此,毛泽东暗自发誓 将来有一天他要写书的话,一定要为农民写书,把种田的、打铁的、挖煤的……都写成英雄豪杰!



2. 少年叛逆者

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使毛泽东从小养成了反叛的性格。

“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旧时代人们的一种教育方法。

先从学校说起。那时私塾先生打学生是家常便饭。体罚的方法,一是打板子,打手心,打头,打脚,打屁股。二是罚跪香——叫学生跪在有棱角的沙石上,一根香燃完了才许起身,有时叫学生跪下,手捧一把烧着的香,烟熏着鼻子很难受,但却不许动。毛泽东对这种“教育”方法非常反感,便用逃学和出走的方法对抗。一次,他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论起来,老师恼羞成怒,到毛泽东的父亲那里告状。毛顺生得知后,拿了一根楠竹丫子,不问青红皂白,见了毛泽东就抽了过来,毛泽东见大势不好,拔腿就跑。眼见父亲追不上了,他才大着胆子,沿着山间小路,朝着想像中的县城方向走去。他想到那里看看不打板子的洋学堂到底是什么样子。谁知他



走了三天三夜，最后还是被家里人找了回来。原来，他只是在山沟里兜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还不到10里路。

回到家里，焦急万分的母亲看到他又黑又瘦、浑身泥污的样子，把他搂在怀里，嚎啕大哭起来。毛泽东伏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也流下了悔恨的眼泪。本来，他做好了让父亲狠揍一顿的准备，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严厉的父亲不但没有打他，反倒体谅了他。回到学堂，老师的态度也温和多了。这次反抗行动的胜利，在少年毛泽东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他终于明白了：“斗争”才是“自卫”的最有效方法。

几十年后，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以他特有的幽默语言，详细讲述了他在家里通过“斗争”进行“自卫”的故事：

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



利用我父亲所引以为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爱的话来回敬他。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我还说 等我到他这样的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 13 岁的时候,一天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



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变本加厉地打骂我。

这个时期,少年毛泽东还从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中寻找他崇拜的造反英雄,当时如《精忠岳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都被老师认为是禁书、邪书,他偏要找来偷偷地看。这些造反英雄的形象把他吸引住了,他把英雄的故事讲给班上的同学们听,讲给村里的人们听。这个时候,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也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天,毛泽东听农民毛承文的老婆七嫂说,她丈夫被族长找人把他五花大绑,押进祠堂,准备按族规严加惩办。

毛泽东知道这“严加惩办”的含义。当时,族权是和君权、神权并列的,犯了族规,族长有权惩治,轻者要打得皮开肉绽,重者要绑上一块石头,扔到水塘里淹死。毛泽东忙问痛哭流涕的七嫂子:

“承文哥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抓他?”

经过七嫂子的介绍毛泽东才知道原来是为积谷的事。积谷是毛家的穷苦人向祠堂交的租子,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祠堂主事就依照旧规,把这些谷子按年份分给穷苦人度荒。今年灾荒严重,米价上涨,不顾农民死活的族长却偷偷地把米卖出去,



把赚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毛承文得知后,找族长讲理,恼羞成怒的族长便以“忤逆不孝、犯上作乱”的罪名把他抓起来,准备重罚。

了解了事情的经过,血气方刚的毛泽东义愤填膺,他仔细核查了事实,又找来了证人,便和许多贫苦农民一起冲进祠堂,与盛气凌人的族长开展说理斗争,终于迫使族长释放了毛承文,退回了贪没的积谷。从此,远近的穷苦人都知道了毛泽东的名字,都说他是一个敢做敢当的好后生。毛泽东也初步尝到了做一个造反英雄的滋味。

还有一次,毛泽东和同学们正在读书的小学堂外边玩,忽然看到村上许多卖豆子的商人从长沙赶回来了。毛泽东好奇地上前打听,才知道长沙城里发生了一次大暴动。

原来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断粮。饥民们推举了代表到抚台(清代省级地方政府的长官)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讽刺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有饿过!”

抚台的话像烈火落到干柴上,一下把饥民们心中的怒火点燃了。他们愤然走上街头,攻打官府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厅标志的旗杆,并赶走了抚台。这时,抚台衙门一个姓张的官员骑马出来,他向人们保证说,官府将想办法帮助他们。哪知姓张的这



个许愿得罪了皇帝，责怪他同“暴民”勾结，被革去了官职。皇帝派来的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许多人被杀，他们的头被割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暴民”的警告。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件事在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多数同学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并不明白这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他觉得，这些“暴民”也是像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的痛苦，他深感不平。从此，在他幼小的心中埋下了叛逆的种子。

不久以后，韶山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会员们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冲突。地主到府衙去控告他们，这个有权势的地主贿赂了官府，哥老会的会员们输了官司。但是他们并不屈服，在一个叫“彭铁匠”的人的带领下，团结起来反抗地主和官府，并撤到本地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山寨。官府派军队去攻打他们。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铁匠被迫逃亡，后来终于被捕并斩首。但在少年毛泽东的心目中，彭铁匠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就在这个时候，本村一个名叫李漱清的先生从外地回来了。据说他在长沙省城当过差，而且是一个维新派，主张破除迷信，他劝人将庙宇改成“洋学



堂”，向农家子弟传播科学知识。这些主张遭到乡里那些守旧分子的坚决反对，认为他是在外面中了洋鬼子的邪气。

然而，这个人却受到毛泽东的极大尊重，他常常跑到李先生家里，饶有兴趣地听他讲外面的新鲜事。慢慢地，他们成了朋友，毛泽东对一向信仰的佛也开始怀疑起来了。

原先，毛泽东的父亲不信神，可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对毛泽东幼年的思想影响很深。她待人忠厚、和善、贤良，持家又勤劳节俭，做饭、拾柴、割草、缝补、洗衣服，什么活都能做。她和亲戚、邻居来往密切，和和睦睦，而且特别关心和体贴穷苦人。遇到灾年，她给那些贫困人家送粮、送物、送钱，父亲不同意这样做，她就背着父亲去做。因此，她在乡亲们的心目中，是有名的贤良妇女。她不断地向自己的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而幼年时代的毛泽东又特别崇敬母亲，母亲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母亲到哪里去，毛泽东总像小尾巴一样跟着她。平时走亲访友，赶庙会，烧香上供，拜菩萨，他都和母亲一起去。因此，母亲信神，毛泽东也信神。他和母亲常因父亲不信神而感到伤心。毛泽东9岁的时候，曾同母亲一起想过许多办法让父亲信神，可是都没有成功。

后来，一次奇遇终于使父亲对神的态度发生了



变化。那天，他出门收一些款子，路上突然遇见一只老虎，正当他吓得手足无措时，不知怎么，那只老虎竟然转身走了。这次奇迹般的脱险，使毛顺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神灵。从此，他一改对神佛的冷漠态度，也开始烧起香来。

而这时的毛泽东，却恰恰相反。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新书。该书的作者郑观应是清末的改良主义者，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方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主张把这些东西引入中国，变革图强以御外侮。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与此同时，他还读了清代倾向改良的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对书中“富国强兵”的主张极为赞同。对他触动特别大的是一本揭露列强瓜分中国罪行的小册子，开头一句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书中写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写到了法、英侵占越南、缅甸的情况。一句句振聋发聩的语言，身边一桩桩活生生的事实，强烈地冲击着他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毛泽东开始意识到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神和佛都不能把农民从苦海中拯救出来！



3. 走出韶山冲

1910年秋天,枫叶又一次红遍了韶山冲。转眼三年过去了,快17岁的毛泽东,在艰苦的劳动中差不多长成一个大人了。父亲看着儿子高高的个子、英俊的模样,心里乐滋滋的。他一心发家致富,打算送儿子去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以便继承父业,光宗耀祖。起先毛泽东十分高兴,因为长这么大,他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能去看看美丽的湘江,看看湘潭这个繁华的城市,是他早已梦寐以求的啊!恰在这时,从湘乡县来的表兄文运昌又给他带来了一个新的消息。这位表兄比他大9岁,此时,正在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他说,那是一所新式学校,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的“新学”却是教得比较多。于是,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决心到湘乡求学去。为了争取父亲的支持,他与母亲商定,邀了舅舅、表兄和同族长老及老师来家相劝,告诉父亲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赚钱的本领。这个办法还真灵,竟然说服父亲点头同意了。



临行前的那天晚上,慈爱的母亲和一向严厉的父亲都来到毛泽东的小屋,帮助他收拾行装,细心的母亲还将有限的盘缠缝在他贴身衣服的口袋里,轻轻地叮嘱他说:“三伢子,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赶路!”

毛泽东望着父母亲离去的背影,望着窗前那皎洁的月光,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他提起笔,在纸上写下了四行诗句: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是毛泽东根据日本人西乡隆盛的一首诗改写的,他把这首诗夹在父亲每日必看的账簿里,以表达他立志求学、义无反顾的决心。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一觉醒来,看见母亲已经把早饭端到桌上。他在母亲温柔的目光注视下,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饭后,太阳才刚刚爬上山头。毛泽东挑起行李,起身出了家门。父亲,母亲,弟弟泽民^①、泽

^① 毛泽民(1896年~1943年),又名泽铭,字咏莲、润莲,毛泽东的二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长。1938年到新疆进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43年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覃^①，堂妹泽建^②都去给他送行。望着母亲那双红肿的眼睛，望着一向严厉的父亲难得的怜惜的神色，再望望弟妹们深情的目光，毛泽东不禁心头一热，两行泪水滚落下来。毕竟，这是17年来第一次远离家门，到50里外的湘乡县独立生活啊！但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他觉得必须尽早离开这个闭塞的家乡。他猛地转过头来，挑着行李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

此刻，一只矫健的雄鹰，正跃过韶峰，向着那一碧如洗的高空展翅飞翔……

东山小学堂是一栋用砖砌成的圆形建筑，看上去像一座寺庙，它坐落在离湘乡县城三四里地的东岸坪，背靠东台山，面临涟水河，环境秀美、幽静，的确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毛泽东没有想到，进这所学校还费了一番周折。原来，这所学校是专门为当地有钱人的孩子开办的，学生们的穿戴都很阔绰，而毛泽东身上穿的

① 毛泽覃（1905年～1935年），字咏菊、润菊，毛泽东的小弟。192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县委书记、红军独立师师长、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等职。1935年4月在江西瑞金英勇牺牲。

② 毛泽建（1905年～1928年），字达湘，乳名菊妹子，毛泽东的堂妹，6岁时过继给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1928年被反动派枪杀。



却是一套粗布短衫裤，看上去十分寒酸，以至于被人误以为是个挑夫。好在表兄运昌充当了他的入学担保人，加上毛泽东一篇题名《言志》的入学作文又被校长李元圃看中，于是学校破例录取了他。李校长高兴地宣称：“今天，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栋梁之材！”

就这样，毛泽东在交了 140 个铜元之后，进了这所新式学堂。在这里，他学习了国文、算术、经文、修身、历史、地理、物理以及音乐、体操、图画等十多门课程，这使他大开眼界。在这些课中，他那铿锵有力的作文尤其得到谭咏春老师的赏识。谭老师看了他写的《救国图存论》和《宋襄公论》的文章，挥笔批阅道：“视君似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在东山学堂，还有一件让毛泽东感到新奇的事，那就是他们的老师中，有一位留学日本归来的人，因为留着假辫子，同学们便背地里叫他“假洋鬼子”。“假洋鬼子”教音乐和英文，毛泽东曾和同学一起讥笑过他的假辫子，但后来毛泽东对他的印象发生了改变。一次“假洋鬼子”教学生唱一首歌颂日本强大战胜俄国的歌曲，毛泽东问：“老师，日本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俄国人？”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还是一个弱小的国家。自从明治天皇亲政，认真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振



兴实业,造海船,制大炮,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很快就赶上西洋,不但打败了沙皇俄国这个庞然大物,还把我们堂堂大清帝国打得一败涂地,逼得清朝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如果中国再不进行变革,将难逃任人宰割的命运!”听了老师的话,毛泽东对这位“假洋鬼子”产生了好感,也更加坚定了救国救民的志向。

后来,毛泽东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维新派人物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王季范表兄也给他寄来了康有为的著作。读后他才知道:原来当他5岁那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叫做“戊戌变法”的变革,有名的维新派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帮助光绪皇帝实行了“百日维新”,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拼死反抗,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康、梁被迫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人士被斩首于北京的菜市口。

这血淋淋的历史使毛泽东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由衷地崇拜康有为、梁启超,赞成君主立宪的制度。说实在的,在此之前,他还不知道中国出了个孙中山,更没听说过黄兴、宋教仁^①的名字,到东山后,他才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

^① 黄兴、宋教仁,资产阶级革命家。1905年与孙中山等人建立同盟会。



已死去,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他原来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革罢了。和周围的人一样,他的脑后依然蓄着一条长辫子。

这时,毛泽东读了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书,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文章里,毛泽东第一次得知“美国”这个国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从要好的同学萧子璋^①那里借来了《世界英雄豪杰》一书,书中记述了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华盛顿、叶卡捷琳娜等世界名人的事迹。毛泽东着迷地读着,禁不住在书上画了许多圈点。从那时起,读书时在自认为重要之处加圈加点,作记号,在书眉上写批语,成为伴随毛泽东终生的读书习惯。在还书的时候,他诚恳地向萧子璋道歉,并激愤地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②、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

^① 萧子璋(1896年~1983年)即萧三,湖南湘乡人,诗人。

^② 安南,即今越南。



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之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战争之后,才取得胜利,建立了美国,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为了表达“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毛泽东给自己取了一个“子任”的名字。随着知识面的扩大和眼界的开阔,他不时得到老师的赞赏。但在那些身着绸缎的富家子弟面前,生性好强的他越来越感到一种难耐的寂寞和压抑,他不能忍受被人看不起的卑下地位,同时他也瞧不起那些人的庸俗与无知。见过一些世面之后,他已不满足于东山小学堂的幽静和湘乡县城的热闹。听说省城长沙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不少学校,抚台衙门也在那里,他决心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再登上一个台阶。到长沙去,到那里继续求学。就这样,在东山小学堂呆了半年之后,在几位热心老师的帮助下,他决定到省城去报考一个为湘乡人办的中学。

1911年春天,当杜鹃花开遍山野的时候,毛泽东又挑起行李,挤进一艘湘江小货轮的三等舱里,开始了他的长沙之旅。站在船头,望着波涛奔涌的湘江,他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等待着这位年轻人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前程呢?



4. 初到长沙城

从乡下第一次到省城，毛泽东挑着行李，穿过熙熙攘攘的坡子街，走进最繁华的街道八角亭。他看到，这里一个个耀眼的招牌，一家家豪华的门面，和湘乡、湘潭比起来，不知要强多少倍。二月的长沙虽然还有几分寒意，毛泽东的心里却感到热乎乎的，眼前的一切都是那样新鲜。他为自己终于能够来到省城而高兴，但他也十分担心，自己一个湘潭人能否被这所为湘乡人办的中学录取呢？好在有东山学校几位老师的引荐信，又把他的籍贯改为“湘乡”，这一次居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顺利入学了。

在长沙，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这个报纸由著名的同盟会会员于右任主编。从报上，他看到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他还得知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他为湖南人中出了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而兴奋不已。



这里,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湖南人。生活在华南崇山峻岭中的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是出了名的,他们还以个性强悍并有政治才能而著称。有句谚语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过去,毛泽东就听说过湖南老乡谭嗣同为戊戌变法肝脑涂地的英雄壮举。现在,他仔细研究了孙中山和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大变革的时代已经来临,作为一个湖南人,必须有所作为!激动和兴奋使他彻夜难眠,他披衣坐起,在灯下奋笔疾书,直抒己见,大胆地提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他用大字工工整整地誊清,第二天一大早,便把它贴到学校的“揭示栏”里。不久,许多同学围拢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纷纷。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可以看得出,他当时还不清楚孙中山、黄兴所代表的革命党与保皇党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的区别。但是,由主张君主立宪、拥护清朝皇帝,到主张推翻清王朝、废除封建帝制和建立共和制,毛泽东的思想显然已发生了重大转折。

“头上的辫子是君主制度的尾巴,我们应该一刀两断!”毛泽东当着同学们的面,一边大声说着,



一边拿起剪刀，“喀嚓”一声，带头剪去了头上的辫子。

“对呀，我们要割掉这条尾巴，把皇帝从宝座上拉下来！”一位和毛泽东要好的同学从他手里抢过剪刀，“喀嚓喀嚓”几声响，把自己的辫子也剪了下来。

这时，原先约好一起剪辫子的另外十几个同学却犹豫起来。因为，在清代，男子留辫子是归顺朝廷的象征。而剪去辫子，弄不好要惹杀身之祸的。这时，毛泽东和他的那位朋友以信守诺言为由，用突然袭击的方法，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

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毛泽东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剪去辫子，以表示与反动没落的清政府一刀两断，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不久，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湖南是第一个起来响应的省份，其他省份的新军和会党也纷纷效仿。一时间，革命如熊熊的烈火，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燃烧起来。

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学里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着。演讲结束，当场便有七八个学生站出来，激愤地表达他们对清朝政府的强烈谴责，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政府。但这时，人们发



现,平时表现最激进的毛泽东却沉默不语。

“润之兄,你这个喜欢发表政见的人怎么一言不发了?”有人向毛泽东发问。

“我在想,革命不能光靠嘴巴讲,还要靠实际行动!”

“那你打算怎样行动呢?”一位同学追问道。

“我已经想好了,到湖北去,当革命军!男子汉应该到战场上去真刀真枪地干!”毛泽东不紧不慢地回答。

大家为毛泽东这果断的决定而震惊。不大一会儿,几位同学也齐声喊道:“对,我们到湖北当兵去!”

四五天之后,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到武汉参加革命军的朋友从同学那里筹到了一笔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须穿雨鞋,毛泽东就到城外军队里的一个朋友那里去借雨鞋。

就在这时,武昌起义军正沿着粤汉路逼近市区,在长沙城外打了一场大仗。同时,城里也发生暴动,各个城门都被工人占领。当毛泽东从朋友那里借雨鞋返回城里时,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于是,毛泽东就跑到一个高地上观战,当看见一面白旗在衙门上升起的时候,他那激动的心情如湘江的浪涛翻涌起伏。当然,他怎么也想像不到,38年后在一个金色的10月,他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毛泽东找到他的朋友后正准备出发到武汉去，听说起义后湖南新军也在招募新兵，以便北上支持武昌。毛泽东就放弃了去武汉的计划，马上在长沙报名参加新军，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后来，他还动员了两个学生参军。

在军队里，毛泽东很快和大多数士兵建立了友谊，与他特别要好的是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在他们眼中，毛泽东是一位“博学”的“秀才”，毛泽东常帮他们写家信，和他们一起拉家常，因而，深得这些穷苦出身的士兵的信赖。当时军饷是每月7元，他除花二三元用作伙食外，其余都拿来买报纸，这更使他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一天，他从报纸上第一次读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感到十分新鲜，便同士兵们热烈地讨论起来，还写信给几个同学探讨这个问题。其实，那时所谓的“社会主义”是“社会改良主义”，还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不过，由此却可见毛泽东早年对科学真理的热切追求。

1912年的春天到了，但中国的大地上依旧寒气逼人。清廷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有关领导权的斗争。正当湖南新军准备采取行动向清廷和袁世凯发动进攻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南京政府宣布解散，南北实现



了“统一”。毛泽东也像大多数人一样,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于是,他也退伍,重新踏上了求学之路。

在求学过程中,19岁的毛泽东也和许多年轻人一样,走了一些弯路。当时,毛泽东并不懂得如何判断学校的优劣,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想干什么,他只是根据报上登的招生广告来选择学校。

他先是想进警察学校,但在考试以前,又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这所学校声称“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有津贴”。于是,毛泽东改变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商。

这时,他的一位在政法学校念书的朋友又劝他去报考政法学校。这所学校的广告许诺:“三年内教会全部法律课程,毕业后即可当法官。”毛泽东写信向父母亲描述了报考这所学校的美好前景,又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等候父母的回信。

有趣的是,这时又有一位朋友劝告他说:“国家现在正处于经济困境中,当前最需要的是能够振兴国家经济的人才。”毛泽东再次动心,并被一所商业学校正式录取。但是,心思不定的毛泽东仍然在盯着报上的广告,当看到一则广告说政府办的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在招生时,便想去学做一个商业专家。这一决定得到喜欢经商的父亲的支持,毛泽东便进了这所学校。但因学校多用英语授课,不懂英语的毛泽东只学了一个月便退学了。



这之后，毛泽东又以名列第一的考试成绩，考取了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他写的一手好文章，备受教师的赞赏。国文老师柳潜读过他的 600 字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后，写了如下批语：

“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力能扛鼎”；“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这位热心的老师还借给他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①，读过之后，使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谁知不久后，他又出人意料地做出退学的决定。他认为，第一中学的课程太浅，内容太陈旧，校规又太繁琐，还不如自学更为有利。这时，毛泽东在第一中学的学习刚好半年。

退学后，毛泽东在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找了一个住处，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图书馆位于长沙东南角的定王台下，林木幽深，环境幽雅，馆内收藏着各种中外书籍和报纸杂志。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他就第一个进去，中午买两块米糕吃，算作午餐，休息片刻，便又开始阅读起来，直到闭馆的时刻到了，才最后一

^① 这是一部中国历代编年史，共 166 卷，里面有乾隆皇帝的谕旨和御批。



个离开。后来,毛泽东对这段读书生活作了这样形象的描述:“那时,我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

在这段自修期间,毛泽东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还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这些反映 18、19 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和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

在这里,毛泽东还第一次看到了一张世界地图。他站在这张地图前,以极大的兴趣研究着,久久地审视着。他为世界之大、人口之多而惊叹,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危机感油然而生。从那时起,他便下定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冬去春来,毛泽东这种苦行僧式的自修生活转眼过了半年,消息传到韶山冲。父亲听说他在长沙既未进学校,又未找工作,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不务正业”,十分恼火,便不肯再寄钱来。加上他所寄居的湘乡会馆已被军队占用,急需寻找新的住处,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他认为,自己最



适合于教书。所以,当看到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不收学费,膳食费低廉”的招生广告后,毛泽东便结束了被他称之为“自己学习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自修生活,以优异的成绩考进这所学校,再一次跨入了学校的大门。



5. 特殊的求学之道

毛泽东是 1913 年春天考入第四师范读预科的,第二年春天,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他又重读了半年预科。到了秋季开学时,才正式编入第一师范本科第八班学习。

搬到第一师范学校第二天,毛泽东迎着春日的朝阳,信步登上学校后面的妙高峰,俯瞰校园,只见几栋青砖灰瓦的两层楼洋房十分耀眼,洋房四周有砖柱和回廊,门窗顶上,都是西洋式的圆拱,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放眼远望,省内最大的河流——湘江从眼前奔流而过,江上帆影点点,白鸥翱翔。隔江便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岳麓山。在白云晴空的映衬下,幽深的树林中,高耸的楼阁清晰可见,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曾经讲学的岳麓书院就坐落在那里。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毛泽东十分高兴。40 年以后,毛泽东曾满怀深情地说过:“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建立了基础,一师是一个好



学校。”

在学校里，毛泽东是公认的高才生，他的学习方法也非同一般。

毛泽东主张学习要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当时，有的同学喜欢谈个人和家庭琐事，有的喜欢谈论婚恋及男女之间的事，也有的同学喜欢谈论升官发财一类功利场上的事。毛泽东从来不参与这类闲谈。他与要好的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谈论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宇宙与人生。

毛泽东说到做到。为了充分利用时间，他每天天蒙蒙亮起床，做冷水浴和体操，然后进教室读书自习；上课时静心听讲，认真笔录；课余时间或到图书馆，或与老师、同学交谈；晚上熄灯后，还常到茶炉房、走廊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苦读。即使放暑假回到家里，他也不肯浪费半点时间，在炎夏之中，仍手不释卷。

为了锻炼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潜心读书的本领，毛泽东常常一个人到学校后山的妙高峰上自习，叫做自甘寂寞，“静中求学”；有时又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称为排除干扰，“闹中求静”。

中国典籍浩如烟海，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其精华？为此，毛泽东十分注重对图书的选择。



1915年9月6日,他在致同学萧子升^①的信中说:
“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
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而卒舞。”

毛泽东曾写过这样一副对联:

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从中可以看出他着重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他认为,人格的完善和学问的长进都有赖于“积累”,他看重“现在”,强调以“久”制胜。对此,他终生身体力行。在革命战争年代,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他身边总带着两大筐书。在他年近八十的时候,还认真学习英语,在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上写满了中文注释。

善于独立思考,勤做读书笔记,是毛泽东求学的又一特点。对于书本上的东西,他从不迷信盲从,对于所读之书、所闻之言、所见之事,他都认真分析思考,而后笔录下来。在一师期间,他用过的各种笔记本就有几网篮,其中有听课时所记的讲堂

^① 萧子升(1894年~1976年),又名旭东,湖南湘乡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总长等职,后长期旅居海外。1976年在巴拉圭去世。



录,有读书笔记,有阅报摘录本,还有抄写本、随感录和日记。这些笔记后来被送回韶山老家珍藏。遗憾的是,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抄他的家,住在附近的族人怕出事,将这些本子和书籍搬到后山烧毁了。一位曾在私塾教过毛泽东的老先生毛宇居,从火堆中抢出一本笔记本——《讲堂录》,保存至今。

这本笔记共47页,前11页是毛泽东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后36页主要内容为听课笔记,也有一些读书札记。《讲堂录》内容广泛,像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诗宋词、宋明理学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学家,都有涉及。有许多处评论历史、政治和人物,有几处记载自然科学常识,并穿插些自己对这些文章的意见及看法。

不动笔墨不看书。凡读过的书,毛泽东总要在空白处注上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所得。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加上浓密的圈点,“此论甚精”、“言之成理”、“此论甚合吾意”等评论,记录了他当时的体会。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则画杠打叉,批上“不通”、“荒谬”或“陋儒之说也”等语。在他读过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留下的笔墨中,处处可见他独立思考、目光如炬的批判精神。

毛泽东不但刻苦读书,善于思考,还能跳出书本,虚心向他人请教,吸取众长。他说:“学问学问,



学与问是不可分的。真正好学的人，一定是虚心好问的人。”

毛泽东首先是向本校的老师求教。在一师的教师当中，毛泽东最仰慕的是杨昌济、黎锦颐、袁谦、徐特立和方维夏。他们居住的“李氏芋园”是毛泽东常去的地方。这里原来是一个官僚的家，现在是第一师范和别的几个学校的教师公寓。毛泽东去得最多的是杨昌济老师家。

杨先生是长沙人，曾在日本留学 6 年，又在英国留学 3 年，但始终信奉中国的理学传统。他为学生讲授修身、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向他们灌输正义感，提倡高尚的道德、远大的理想，激励他们做有益于社会的人。每逢星期日，毛泽东便邀要好的同学蔡和森^①、陈昌^②等到杨先生家里求学问道。杨先生每次都热情款待，平等地和他们一起探讨修身的学问和国家的大事。在他的书房里，杨先生亲笔题写的一副对联给众人留下深刻印象：

自闭桃源称太古
欲栽大木柱长天

^① 蔡和森（1895 年～1931 年），湖南湘乡人，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 年牺牲。

^② 陈昌（1894 年～1930 年），湖南浏阳人，中共党员。1930 年在长沙就义。



在此期间,毛泽东的才华、志向也让杨先生赞赏不已。杨先生曾对章士钊^①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毛泽东、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吾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毛泽东对杨先生极为尊重,他在回忆一师生活时曾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先生对我有很深的影响。”的确,无论是在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还是在他的人格磨练中,都可以看到杨昌济的痕迹。

除向一师的老师请教外,毛泽东还通过杨昌济的介绍,和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一些学士名人、老师、同学书信交往,质疑问难、拜学求教。当有外地学者来长沙讲学时,毛泽东总是千方百计地求教、拜访。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曾帮助和支持过辛亥革命,他在1917年春,亲临长沙参加黄兴的葬礼,毛泽东和同学萧子暲得知这个消息后,特地给这位知名人士写了一封求见信,恳切要求见面求教。

毛泽东还主张通过与同学、好友的探讨、交流以促进彼此的提高。为此,1915年上半年,他和同学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熊光楚、萧子暲等在杨昌

^① 章士钊(1881年~1973年),湖南长沙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73年病逝。



济老师的指导下,组织了哲学研究小组,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在杨昌济家集会,由先生介绍和推荐各种读物,大家讨论读书心得,互相阅读日记,议论时局,评判人物。他还和同学一起,去长沙附近的船山学社听人演讲。

正是通过这特殊的求学之道,使毛泽东在同样的条件下,学到了许多别人学不到的东西。



6. 不安分的学生

在一师期间,毛泽东特殊的性格、特殊的求学之道,显得卓尔不群,深受老师的器重和同学的钦佩。杨昌济常说他是“海内人才”,“能充栋梁之任”。他的同班同学彭道良曾说:“我与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的繁体笔画为二十八画)同班同学,颇知其为人品学兼优,且具独立特行之性格。他常语人:‘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人。’……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他为毛奇^①且语意双关。”

在一师求学的五年半时间里,毛泽东既是一个勤奋学习的高才生,又是一个棱角分明的不安分的学生,曾有许多奇特之举。其中有一段时间,他竟出人意料地作出了退学的决定。

那是 1915 年春天的事。当时,第一次世界大

^① 毛奇,德国军事家,著有军事著作多种,在普法战争中功勋卓著。



战已经爆发，整个世界战云密布，硝烟弥漫。我国的近邻日本趁火打劫，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①。而在一师第八班的课堂上，一堂“静物写生”课正在静静地进行着。教师在讲桌上摆了一只花瓶，一把茶壶，几只茶杯，让学生照着样子画下来。

一直就不喜欢图画课的毛泽东一看就皱起了眉头。记得半个月以前，老师在图画课上发给他一张白纸让他作画，他提起笔一挥而就，画了一个椭圆形，说是鸡蛋，往课桌上一放，就离开教室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了，图画老师给他打了40分，不及格。这次，他又如法炮制，在教师发下来的白纸上画了一条横线，又在横线上画了一个半圆，然后，用毛笔在旁边写上李白的诗句“半壁见海日”，意思就是“太阳将从海上升起”。这样，他很快就交了卷子，走到自修室里看书去了。

“正在上课，你怎么一个人到这里看起来书？让我瞧瞧看的是什么书，好吗？”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突然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自己一向敬仰的杨昌济老师，忙站起

^① 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共二十一条。为换取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对此几乎全盘接受。



身来,轻声答道:

“正在上图画课,我是交卷以后到这里来的。”

杨昌济一听上的是图画课,心里便明白了缘由。他没有马上批评毛泽东,而是从毛泽东手中接过书和笔记本,一看,书是自己教的《西洋伦理学》。笔记本的前11页是全文抄录的《离骚》和《九章》,后面的二十多页一部分是听《修身》和《国文》课的笔记,另一部分是他的读书随感录。他欣喜地发现,其中很多论点恰与自己的见解相同,以下几段更引起他浓厚的兴趣: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

修身。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藪。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而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为万恶之渊藪也。

奋斗。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看到这里,杨昌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笔记本上的一些话是他和其他教员在课堂上讲过的,但能够如此认真听讲,抓住精粹的学生却是不多的。至于那些读书笔记,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也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显然,杨昌济对毛泽东十分偏爱,但从一个长者和老师的角度,他又不得不对毛泽东说:

“润之,你的文科学得很好,但也不能太偏科了,图画课培养一个人的审美情趣,对于师范学校的学生,图画课更加重要啊!”

“杨先生,你知道的,我只对文科感兴趣,就是不喜欢图画课。”毛泽东在老师面前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要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非从哲学和伦理学入手不可。我不愿意在别的课上浪费时间!”

听了毛泽东的话,杨昌济感到心头一震。

他觉得是要和这位好学生深入交谈一下了。因为赶着上课,他便邀毛泽东星期天到家里来谈。

到了周末的晚上,想到第二天要去杨先生家,毛泽东独自坐在灯下,久久地思索着。想起古往今来,多少忠臣良将,都是少壮有为,自己今年都满



21 岁了,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还要搞什么“静物写生”,加之学校规章又格外繁琐,将近 20 门功课门门都要学,他实在不愿让青春再这样白白地流逝了。于是,他断然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退学,找一个工作,边做工,边自修,按照自己的意愿,专攻哲学和伦理学,去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便走出校园,急步匆匆地来到李氏芋园,径直走到写着“板仓杨”三个隶书字的杨昌济先生的门前。来开门的是一个身材不高、模样清秀的小姑娘,她就是杨昌济 14 岁的女儿杨开慧。她的乳名叫杨霞,圆圆的脸蛋绽放着青春的光彩,乌亮的眼睛里透着少女的纯真。

“润之哥,我就知道是你,快请进来吧!”毛泽东是家里的常客了,杨开慧把他看做自己的大哥哥。她微笑着和毛泽东打着招呼,把他迎进爸爸的书房,然后像往常一样,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旁听爸爸和润之哥的交谈。

当毛泽东把自己退学的决定告诉杨先生后,杨昌济不禁大吃一惊,他不解地问道:

“退学?这是为什么?”

坐在一旁的杨开慧也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毛泽东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他坦诚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师。

听了毛泽东的肺腑之言,杨昌济的心里久久不



能平静,过了半晌,他才慢声细语地说:

“润之,你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但说心里话我不赞成你的决定。学校的课程固然繁杂,而做学问总要汲取各方面的知识,根深才能叶茂啊!你认为自修才是最好的学习,其实,也不尽然。你想想看,有老师的指导,有同学的讨论,有像第一师范图书馆这样丰富的藏书,不是更容易进步吗?”

接着,杨昌济还结合王安石变法失败和谭嗣同搞维新流产的故事,向毛泽东说明要成就一件大事情,必须团结群体的力量去做,不能单枪匹马,孤军奋战。

“润之,我的话请你认真想一想,然后再做决定,好吗?”最后,杨昌济语重心长地对毛泽东说。杨开慧也恳切地劝道:“润之哥,你千万别退学啊!”

从杨先生家里回到学校后,毛泽东反复思考着老师的教诲,觉得自己的想法确有偏颇之处,尤其是“团结群体的力量”这句话,给他很大的震动。他改变了退学的决定,决心留在第一师范继续求学。

像以前一样,对一般肤浅和浪费时间的课程,毛泽东根本不去听课,或像上图画课那样应付了事,而专心攻读自己选读的书。学校碍于校规,认为他是品行不正,曾几次决定开除他,经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袁仲谦等许多老师劝说,并出面担保,才免于开除。

为了结交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探求救国



救民的真理，就在杨昌济劝阻毛泽东退学的四个月之后，毛泽东又做了一件“奇事”。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了一则“征友启事”，登在长沙的一张报纸上，邀请“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同他联系。结果，除了第一师范的几个老朋友蔡和森、何叔衡^①、陈昌、罗学瓚^②、张昆弟之外，他得到了三个半人的响应：一个是长郡中学的学生罗章龙^③；另外两个青年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反动派。那“半”个响应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李立三^④。从此，在毛泽东的周围，逐渐团结了一批有志青年，经常在一起议论时事政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不断阅读报纸，关心国家大事，这是毛泽东有别于其他同学的又一特点。他在后来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经说过：“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元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三分之一化（花）在报纸

① 何叔衡，湖南宁乡人，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35年2月牺牲。

② 罗学瓚，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30年牺牲。

③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④ 李立三，湖南醴陵人，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曾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1967年逝世。



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在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上签字的消息传来,一师全校师生群情激愤,立即编印了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及袁世凯卖国行径的《明耻篇》一书,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得知签字的消息后更是义愤填膺。毛泽东在书的封面上奋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916年,极端仇视中国的日本大隈重信政府基础动摇,盛传大隈重信将要下台,这时,国内不少人幻想日本新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一直从报纸上密切关注着中日关系的发展,他在7月25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断然指出:“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他预见:“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历史的发展,果然验证了毛泽东的这段预言。

这时的毛泽东,以超乎常人的努力,更加自觉地投入到求学与磨炼之中。



7. 文明精神野蛮体魄

毛泽东 12 岁那年,曾害过一场大病,从此认识到锻炼身体的重要性。在第一师范,他不但是一个刻苦读书的学生,更是一个狂热的体育锻炼者,主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通过体育强壮身体,磨砺意志。他参加的体育项目主要有冷水浴、游泳、爬山、远足、露宿及六段操运动。

每天拂晓,当同学们还在睡梦之中的时候,毛泽东便早早地起床了。他悄悄来到一师东北角浴室旁的一口水井边,脱光上衣,吊上一桶又一桶水往身上浇,然后用浴巾擦洗全身,边擦边淋,直到全身发红发热为止。毛泽东常年坚持,即使天寒地冻,也从不停止。这是他向杨昌济老师学来的。杨昌济一直坚持冷水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从未间断。

游泳是毛泽东最喜欢、最擅长的体育运动。少年时代,他经常跳进家乡屋前的池塘里学习游泳;在一师,学校前面的湘江就是他畅游的好地方。夏季,阳光照耀在湘江江面上,毛泽东和同学们在江



水中劈波斩浪，你追我赶，尽情地追逐着穿梭般来去的木帆船和小火轮。每当游到橘子洲头，便登上沙岸，边晒太阳，边高谈阔论，赋诗言志，好不痛快。毛泽东的游技好，胆量大，耐力强，不仅在夏日游，直至隆冬季节，仍坚持在江中畅游。

毛泽东的同学罗学瓚曾在 1917 年 9 月 20 日的日记中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今日往水陆洲游泳，人多言此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全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不谓运动中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就是青年毛泽东气吞山河的心声！

游泳的习惯，毛泽东坚持了终生。建国后，他数次横渡长江，还以特有的气魄和幽默说道：“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毛泽东十分喜欢爬山、露宿、风浴、雨浴。在学校后山的操场上，在城墙上的天心阁一带，在与一师隔江相望的岳麓山上，到处都留下了他和同学们的身影。夏日，每当狂风暴雨来临时，毛泽东常一个人跑到后山的操场上，让倾盆大雨淋个痛快。他还曾选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独自爬上岳麓山



顶,然后又从山上跑下来。隆冬,在雪花纷飞的时候,他也常跑到旷野里,尽情领略大雪的风情,他把这称作“雪浴”。

为了锻炼自己的胆量,他常邀请一些要好的同学到橘子洲头及岳麓山上的爱晚亭、白鹤泉等处露宿。晚上,他们迎着阵阵凉风围坐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纵谈国家大事。入夜,各自散开,在草地上露宿到天亮。

长途远足,是毛泽东喜爱的又一运动。他常与同学一道,边走边讨论问题,并随时了解百姓的生活状况。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毛泽东早早地起了床,饭后,约好友蔡和森、彭则厚、张昆弟三人一起郊游。出了长沙城,放眼望去,远山近水尽收眼底,顿觉视野开阔,精神为之一震,不禁加快了脚步,沿铁路线旁的小路往前走去。夏日的太阳火辣辣的,走了十多里路,他们已是汗流浹背,便在一个茶店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赶路。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一个路边饭店,边吃午饭,边和饭店老板交谈,了解当地的情况,调查普通百姓的疾苦。饭后,继续结伴前行。

大约走了三里多路,他们来到了一个清澈的水坝前边。毛泽东十分高兴,和三个同学脱光衣服,纵身跳入水中,洗了个痛快澡。之后,他们又穿上





衣服,踏上行程。

四个人兴致勃勃地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又走了十几里路,来到了湘江边上,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晚饭后,借着皎洁的月光,毛泽东和他们又一起跃入湘江,挥臂斩浪,把一身的疲劳洗个干干净净。上岸后,他们又在江边的沙滩上盘腿而坐,开怀畅谈,谈国运兴衰,谈人生理想,谈唐诗宋词……直到夜深人静,他们才各自睡去。

在实践中,毛泽东还创造了一套体操,叫“六段操”。包括手、足、头部、躯干、拳击和跳跃等运动,共六段二十七节。每天清晨,洗完冷水浴后,他都要做一遍,临睡前再做一遍,每天如此,终年不断。

对于这种自找苦吃、自我磨练的做法,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和与他要好的同学这样刻苦地锻炼身体,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时的学校很不重视体育锻炼,有些八股先生,对体育还有不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学生应当斯斯文文,非礼勿动,还有人说什么搞体育,伸臂露腿,不雅观。1917年,同班



的傅传甲等7名同学不幸患传染病身亡，在学友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悲愤交集，愤然写下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

当时，毛泽东正在探求宇宙之大本大源和人类、社会等大事，他认为，要担当重任，身体虚弱是不行的。一个人纵有天大的学问，如果都像贾谊^①、李贺^②一样，二三十岁就死了，那又有什么用处？没有强壮的身体，哪来的德、智？可是，当时的教育家们大都忽视体育。这样下去，只会使青年学生一个个变得躬腰驼背，瘦弱不堪，上山出气不赢，下水手脚抽筋，见兵器就害怕……这样的文弱书生，怎能担负起改造社会的重任呢？

于是，毛泽东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经过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并结合自己锻炼身体的实践，写下了洋洋七千言的《体育之研究》，发表在同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三卷二号上。文章共分八节，在导言中明确提出“国力茶（niè）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关于体育在德、智、体中的地位，毛泽东指出，德育和智育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高尚的道德诚然可贵，但“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

① 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死时32岁。

② 李贺，唐代诗人，死时仅27岁。



“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他批评当时的学制对体育一点也不重视,结果造成了对学生身体的严重摧残:“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况弱者乎?”最后得出结论:“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

关于体育锻炼与增进知识的关系,毛泽东说:“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篇讲体育的文章,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体育的范畴。毛泽东认为:“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健康的体魄、勇敢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都是拯救中华民族所必需的。

青少年时代的体育锻炼,使毛泽东受益终身。他曾对斯诺说过:“这对于增强我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往返行军,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到了晚年,他还充满豪情地说过:“一个经常注意锻炼身体的人,更不会被风雪的寒威所吓倒。我过去练习过冷水浴,现在年纪虽然大了,冬天也还可以不用热水洗澡,小小的寒冻也还经得住。锻炼的确是重要的事情。”



8. 读“无字之书”

在一师期间,毛泽东还有一段有趣的游学经历。那时,所谓游学,在一般人看来,就是那些没有出息的读书人,不肯从事正当的劳动,又放不下架子,就只好写几个字,谄几行诗,送给土财主,弄几个钱糊口。有人把这叫做“打秋风”,实际上把这种人看作文化乞丐。

毛泽东怎么想起当这种文化乞丐的呢?原来,那天他从一本旧的《民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是有两个青年,决定徒步游历全中国,现在已经到达西康^①的打箭炉。他看了十分钦佩,也很想效仿,只可惜自己是个穷学生,哪有闲钱去应付一路的开销呢?正着急时,忽然想到“游学”这种形式,倒是解决食宿的好办法,时间不允许自己周游全国,那就先从湖南境内开始吧,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周游全国、周游世界。

^① 西康,大体位置在今四川省西部。



他决定游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从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的经历中看到，凡是社会阅历丰富的人，胸襟就格外宽广，司马迁能写出《史记》这样的煌煌巨著就不足为奇了。同时，毛泽东又认真总结改革家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教训，认为他“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正因为不了解社会，所以才出现政策上的失误。联系到当时学校教育与社会相隔绝的现状，毛泽东愈加深刻地认识到：“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于是，他决定学习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经验，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去读那奥妙无穷的“无字之书”。

1917年的暑假伴着炎炎烈日来到了。毛泽东邀请当小学教员的朋友萧子升一道，开始了分文不带、游学农村的生活。他们换上草鞋，每人带一把旧雨伞和一个装有换洗衣服、笔记本、毛巾、毛笔、墨盒的白土布包袱，便顶着炽热的太阳出发了。

在去宁乡的石板大路上，他们走了一上午，只觉得又累又饿，浑身无力，头脑发胀。萧子升躺在地上深有感触地说：“到了饿肚子的时候才知道，身无分文的日子不好过呀！”看到前面有一家店铺，萧子升不禁眼前一亮，从包袱里取出笔墨和红纸，在大石板上挥笔写下了一副对联：



生意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达三江。

写完，他让毛泽东送去换碗饭吃。谁知毛泽东去了不久，又空手折了回来。他告诉萧子升，原来，这是一家药铺，挂的是“益民药铺”的招牌。毛泽东想，药铺老板本欲济世益民，看见要他发财致富的对子，怎么能高兴？所以，他连对子也没敢送，就回来了。萧子升听了毛泽东的想法觉得有理。他苦笑一声，拍拍脑袋又写了一副“慈手济世，妙手回春”的对子送去，老板果然喜笑颜开，并让他们另写了几张条幅和对联，还把药房里的大小牌匾全都更换了，折腾了一两个小时，才让他们过去吃了几碗冷饭，给了一点辣椒炒冬瓜，临走，打发了 20 个铜元。

这初次的乞讨，使他们切身体会到：这一粥一饭，真是来之不易呀！

第二天，他们进了宁乡县城，忙着给店铺换牌匾、写对联，果然多赚了几吊钱，足够三五天的开销。

第五天的黄昏时刻，他们经过 100 多里的步行，来到了好朋友何叔衡的家。何叔衡这年 38 岁了，比一般的同学大了十七八岁。原先，他是宁乡



县的秀才，民国成立后，才进了师范学校的讲习科，去年暑假一毕业，就和萧子升一起，在楚怡小学里教书。他为人忠厚，常戴着一副玳瑁框的眼镜，留着两撇浓黑的八字胡，同学们亲切地喊他何胡子。毛泽东是在一次招友启事中结识他的，二人情投意合，很快成了知心朋友。

何叔衡的家群山环抱，竹林遍野，景色十分优美。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这里住了下来。第二天，参观了村里的猪圈、牛栏、菜园、稻田和山林，了解了何家的经济收支及家族历史，走访了他的堂兄弟和附近的农民。特别是一位贫寒的篾匠师傅声泪俱下的诉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联想到自己的家乡韶山冲，捐税多如牛毛，农民不堪重负的悲惨处境，他激愤地对何叔衡说：

“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以前，我认为只有韶山的农民是最苦的，今天到你们这里一看，才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赶走了皇帝，改换了民国，还是没有农民的好日子过啊！农村这样落后，农民这样凄惨，何时才能翻身啊！”

何叔衡接着说道：“俗话说，官逼民反。农民是最老实的人，但是把他们逼急了，他们也会造反的。听说我们宁乡县的沔山出了个石匠张三元，已经带领几千人起来造反了！”

“是吗？那我倒要去看看！”对历代农民起义做



过一些研究的毛泽东一听这话，便来了精神。

“怎么，你也想去投奔他们？”何叔衡半开玩笑地说。

“我很想去了解一下这些造反者的情况。”于是，毛泽东和萧子升商量，当即决定先去沔山，而后从沔山再去安化、益阳，直奔洞庭湖。

于是，他们谢绝了何叔衡的挽留，便匆匆离开宁乡，向沔山出发。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一座不知名的山上，这里前不挨村，后不着店，肚子却在咕咕地叫。眼看靠送对联混不上饭了，毛泽东灵机一动，便挽起袖子，卷起裤脚，拿起田埂上的一把镰刀，帮助一位老农割起禾来。他边割禾边和老农聊天，这才知道，沔山离这里还有一段路程，老农种的就是沔山密印寺的香火田。老农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生活的艰难，并偷偷地将东家送来的米饭匀给他们吃。饭后，他们告别了好心的老农继续赶路，等赶到沔山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

晚上，他们住进了密印寺，通过一位小和尚的介绍，毛泽东了解到，这金碧辉煌的寺庙里，原来还有黑暗的内幕：沔山的土地 70% 归地主和寺庙所有，70% 的人口当了佃农，还有 20% 稍多的人靠打长工、做短工过活。这密印寺里长住的和尚就有 100 多人，最多时达 800 多人，都是吃白饭、不种田的。去年三月，正当春荒时节，民国的官府却不顾



农民死活，抽丁派款，来这里修庙，胆敢不来者就要抓去坐牢。在这种情况下，有个叫张三元的石匠，邀集了一些穷苦百姓，成立了“同心会”，自制了几百枝梭镖，弄到了三十多条枪，公开举起了造反的大旗！吓得周围的财主和庙里的方丈心惊胆颤。

这个 15 岁的小和尚还痛哭流涕地告诉毛泽东，他的父亲跟随张三元起义不幸牺牲后，母亲和妹妹又遭土豪财主和大和尚的残杀，为了糊口，他被迫出家当了和尚。听了小和尚的血泪控诉，更激起了毛泽东对造反者的同情。他想：我们国家要富强，人民要翻身，就必须动员劳苦大众起来造反，打倒凶恶的列强和土豪、军阀！

几天后，他们告别了这位满腹苦水的小和尚，继续往前走。经过安化县城，渡过秀丽的桃花江，又过了益阳，一直走到八百里洞庭湖畔的沅江县城，他们这才知道，涨满了水的长江，正卷着巨浪向洞庭湖倒灌进来，加上连天的阴雨，导致山洪暴发。防洪大堤被冲得到处都是口子，沅江县城已被无情的洪水吞没，周围漂浮着连根拔起的树木、农具和家畜的尸体，幸存的老人和孩子站在水边，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死去的亲人……

望着眼前凄惨的景象，毛泽东站在波浪滔天的洞庭湖畔，百感交集，任狂风一阵阵吹乱他乌黑的头发，任泪水一次次打湿他破旧的衣襟。这历时一



个多月的游学生涯,这七百多里的步行经历,使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的真实面貌镌刻在他的心里。为恢复洞庭湖美丽富饶的面貌,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决心像张三元那样,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由于沅江周围所有的道路都被淹没,加之开学在即,毛泽东和萧子升只好结束了这次游学生活,用一路上送对联换回的钱买了票,搭乘小火轮返回长沙。

返回学校后,师生们在传阅毛泽东的游学笔记时,纷纷赞誉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壮举。这以后,毛泽东还曾多次游学,1917年12月下旬,他先后到家住农村的同学陈绍休、陈昌家走访,和农民一道担水种菜;1918年夏初,他和好友蔡和森一道,绕洞庭湖转了半圈进行社会调查。通过游学,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真实情况有了真切的了解,这为他日后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9. 社会活动家

在第一师范,毛泽东的活动能力和组织才能也崭露头角。他开展社会活动的第一个舞台便是第一师范的学友会。在 1915 年至 1917 年的四个学期中,毛泽东一直负责文书工作,掌管报告、文件及开会速记等事务。从 1917 年下学期到 1918 年上学期,又被推选为学友会总务(实际主持会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以前,这些职务都是由学监和教员担任的,从他开始,才开创了由学生担任的先例。

他担任总务以后,便提出了让三、四年级学生担任各部部长的建议,以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这一建议当即被采纳。在他的主持下,学友会各项活动空前的活跃,学生成绩展览会、体育运动会、自由演讲辩论会、各种专门问题的学术研究会等,一个接着一个。据一师校志记载,仅 1917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6 日,这 32 天之内,各部活动就达 64 次之多,可谓盛极一时。在此期间,毛泽东着力抓了两项活动:一是大力开展各种学术研究活动。他



督促各部制定切实可行的学术研究计划,为各部聘请义务指导老师,邀请社会名流到学校演讲。

二是大力开展各项体育运动,他以自己坚持体育锻炼的实际感受,向同学们宣传开展体育运动的好处。一师没有室内操场,为解决雨天和晚上体育锻炼的问题,毛泽东负责做了12个木架、20片竹布网分给各班,于是,简便易行的乒乓球运动便开展起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学友会还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游泳队伍,每天课余时间,毛泽东便带着同学们来到江边,纵身投入湘江之中,在滚滚浪涛里奋力搏击,如蛟龙戏水,似万马奔腾,其阵势十分壮观。

志向远大的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校内,他关注社会,忧国忧民,做了几件大事。

那时,随着民族资本的兴起和外国资本的入侵,中国的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第一师范附近,集中了长沙几个新式的企业: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此外,粤汉铁路的武昌—长沙一段和长沙—株洲铁路的工人也都住在这一带。他们的生活十分贫困,更谈不上接受教育了。1916年12月,在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激荡下,第一师范的教职员们顺应教育平民化的呼声,曾创办过工人夜校,但没能坚持下来。

毛泽东十分同情工人没有文化受欺凌的境遇,



便以学友会教育研究部的名义,组织三、四年级学生把工人夜校重新办起来。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夜校招学广告》: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宜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宜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来听过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甚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



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的。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这样的白话广告,在当时可算是新鲜事物。从中可以看出:句句情真意切,处处为穷苦人着想,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极富魅力的语言风格和人格特征。

这个广告开始是请警察分发的,结果只有九个工人来报名。于是,毛泽东等人便带着 600 多份广告,挨家挨户地给工人送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三天以后,就有 100 多人来报名,后增至 300 多人。

夜校终于办起来了,除动员高年级学生来当教员外,毛泽东也亲自教课,并兼任管理工作,对于夜校的大小事宜,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并告诉来学习的工人说,“每次上课,衣服随便,不必求好”,“下雨时雨具自置椅下看管”。

在办夜校的过程中,出身农家的毛泽东与穷苦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工人们也视他为自己的好老师、好朋友。他由此取得了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为他以后从事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在担任学友会总务期间,毛泽东还第一次显示



了军事指挥才能。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湖南地处南北军事要冲,成为军阀们竞相争夺的地盘。作为省会的长沙,更是饱尝兵乱之苦。毛泽东在一师期间,长沙就曾经历多次兵灾和北洋军阀的三次蹂躏。为保护师生安全,一师学生志愿军应运而生。

1917年11月,驻长沙的傅良佐的部队被桂军谭浩明击败,退出了长沙,但谭的军队一时间还未能赶到长沙。这样,长沙城里只有一些警察维持治安。这时,北洋军阀的一支约4000人的部队向长沙溃退,在距一师几里外的河边徘徊。他们一路上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现在兵临城下,更使长沙市民惶惶不安。

“同学们,莫要慌!溃兵不了解城里的情况,谅他们不敢贸然行动。我们只要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将他们赶走。”在这危急的时刻,24岁的毛泽东挺身而出。

毛泽东迅速将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搬出教室里的桌椅板凳,作为障碍,堵住所有的门。他又将大部分同学分成三队,拿着木枪,绕道分布在附近的几个山头上,将溃军包围起来;他还请附近警察出动,带上他们的几支真枪,扼守在校后的妙高峰上。

黄昏到来了。溃军又累又饿,糊里糊涂地进了



包围圈。毛泽东一声令下,几个拿真枪的警察率先开火。接着,埋伏在山头上的学生队伍鞭炮齐鸣,喊声震天:“傅良佐逃走了,桂军进城啦,你们快缴枪吧!”

溃军一下子被这个阵势吓住了,不敢轻举妄动。毛泽东乘机派人和他们交涉,把溃军带到第一师范的操场。毛泽东命令他们放下武器,后退几十步,他们都乖乖地照办。几百名学生乘机把武器搬进礼堂。当晚,缴械的溃军就地露宿,第二天一早,由当地的商会出钱,将溃军遣散,长沙百姓的这大大兵患就这样消除了。

事后,全校师生和长沙市民一致夸赞毛泽东浑身是胆,指挥果断。很久以后,毛泽东在一次闲谈中提到,他搞军事,那才真是第一次哩!

在学友会的工作实践中,毛泽东越来越感受到组织起来的力量。自从那年贴出《征友启事》之后,通过几年的努力,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一个是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一个是萧子升任教的城内楚怡小学。这批朋友主要有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瓚、萧子暉、罗章龙等十几个人。这些人多数是第一师范和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一些是长沙各中小学的青年教师。他们多数来自农村,深知农民的疾苦,和穷人有着深厚的感



情同时,他们大都是杨昌济的学生,同受杨先生“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的影响。毛泽东后来曾对斯诺说过:“这是一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间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和私人问题。……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1917年冬天,在一个北风呼啸的日子里,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又聚集在一起,进行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洪流,国内的新思想、新文化已经发展起来了,再过静的生活和孤独的生活是不对的,应该追求一种动的生活和团体的生活。毛泽东当即提出组织一个学会的建议,得到朋友们的一致赞同。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1918年4月14日,在这个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的日子,在岳麓山下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中,一个非同寻常的青年团体——新民学会成立了。

会议首先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参与起草的会章,确定学会的名称为“新民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并规定“五不”会规,即“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

会议最后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



农为干事。萧子升不久就去法国勤工俭学,新民学会的会务实际上还是由毛泽东主持。

参加成立大会的共有 13 人,另外有 8 人因故未能到会,所以,新民学会最初的会员是 21 人。这个学会后来发展到 70 多人,有不少人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有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骨干,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瓚、向警予^①、蔡畅^②、李富春^③、李维汉^④等,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英名。同时,江河奔流,大浪淘沙,也有一些人背叛了初衷,蜕变成了革命的敌人。还有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和组织失去了联系,走上了教书的生涯……

新民学会成立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就从第一师范毕业了。多年之后,毛泽东曾把他的求学生涯概括为“六年孔夫子,七年洋学堂”,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

① 向警予,女,湖南溆浦人。历任中共妇女部部长、妇女委员会书记等职。1928 年英勇就义。

② 蔡畅,女,湖南湘乡人,蔡和森的妹妹。曾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1990 年去世。

③ 李富春,湖南长沙人。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1975 年逝世。

④ 李维汉,湖南长沙人。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84 年逝世。



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而他于1925年写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便是对这段峥嵘岁月的真实写照: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
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
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
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
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0. 北京之旅

毛泽东毕业以后不久,他最尊敬的老师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当教授。他依依不舍地送走杨先生全家,便和蔡和森、张昆弟等部分新民学会的会员一起,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岳麓山下一个叫半学斋的地方,进行他早已神往的“新村试验”。

什么是“新村试验”呢?这事还得从毛泽东前段时间从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说起。报上说日本有一个作家,很不满意现存的社会制度,便提倡一种“新村主义”。在“新村”里,一切财产都是公有的,人人平等,个个自由,一块劳动,一起生活。毛泽东这时还弄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但却想和他的朋友们在这里试验一下“新村主义”。当然,他们这些美妙的幻想很快便被冷酷的现实击碎了。

此路不通,新民学会该向何处去?那天,毛泽东正在苦闷之中,忽听耳边一阵高喊:“润之,杨先生来信啦!”

毛泽东抬头一看,蔡和森正兴冲冲地跑来。



毛泽东看完信,不禁喜上眉梢。原来,杨昌济在信中告诉他们一个重要消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之中,参战国普遍劳力匮乏。吴玉章^①、蔡元培^②等人趁着法国在中国大批招募工人的机会,鼓励中国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一面做工,一面求学。杨昌济希望他们在长沙把勤工俭学的运动搞起来,还特别提出让毛泽东立即到北京去,帮助开展这个运动。

毛泽东顿感眼前一亮:对!搞勤工俭学,到法国去!新民学会的会员应该分散于世界多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去开辟一个方面!

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得到新民学会会员的一致赞同。不久,蔡和森启程去北京做组织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经过紧张的宣传动员,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借了路费,和24名同学一起搭上小火轮,沿湘江而下直达汉口,又从汉口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毛泽东望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田园山川,思绪起伏。北京,这座古老的政治文化都城,这个全国新

^① 吴玉章,教育家,四川容县人。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966年逝世。

^② 蔡元培,教育家,浙江绍兴人。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他早已向往的地方。正如当年从家乡来到省城长沙一样,这次从长沙到北京,将是他人生历程中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到达北京之后,他们分别住进了湖南的几个会馆。毛泽东起初住在杨昌济老师家,与看门的老人同住在一间小屋里,后为了联系工作的方便,便和蔡和森、罗学瓚等其他 7 名会员一起,搬到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居住。对于这段生活,毛泽东是这样描述的: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这座古城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在古老的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除了优美的景色之外,当时的北京,新文化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正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新青年》为阵地,向一切愚昧落后的东西进行猛烈的抨击,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浪潮,正从这里冲向古老而辽阔的中国大地。同时,在青年学生中,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也正在蓬勃发展,全国来京报名者已近千人,湖南即占三分之一,不少人就是新民学会的成员。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人生旅途又遇到了新的选择。杨昌济希望他或者去法国留学,或者报考北京大学。对青年人来说,这两种选择的前途无疑都是光明的。可是,在这紧要的关头,毛泽东婉言谢绝了杨先生的好意,只请杨昌济为他谋到了一个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职位,月薪8块大洋,只相当于一位教授月薪的五十分之一,除了每月三块五的伙食费外,还要积存一些钱买套过冬的衣服。

那么,此时的毛泽东为什么又做出这出人意料的选择呢?让我们来听听毛泽东自己的解释: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



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至于毛泽东未能报考北京大学，一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想想看，他在一师读了五年书，才用了160块钱，而在北京大学，一年就要200块，韶山家里肯定是拿不出这笔钱来的，而毛泽东又主张自食其力，不肯接受杨先生的资助。二是在国家内忧外困的情况下，毛泽东不愿意在书堆中消耗过多时间，他想找个职业边自修，边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职位，使毛泽东有幸认识了当时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①，并阅读了他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但同时，也正是在这个“兼收并蓄”的北京大学，这个新旧文化及各种思潮汇集和角逐的场所，使毛泽东受到了其他许多社会思潮的影响。正如他后来回忆这段思想历程时所说：“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无政府

^① 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河北乐亭人。1927年在北京就义。



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为了能够在北大旁听一些自己喜欢的课程,毛泽东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毛泽东还拜访过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陈独秀^①、胡适^②、蔡元培等人,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当然,在这段时间里,生活中受到的冷遇,也在毛泽东思想上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还是让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描述吧: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本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①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42年病死。

^② 胡适,安徽绩溪人。曾任北京大学校长。1962年病死。



但是,毛泽东受到的冷遇和他获得的收益相比,毕竟是微不足道的。首次北京之行,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19年3月,毛泽东辞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职务,送新民学会中的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去上海。此后,他便返回长沙,回到他生活了25年的湖南,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斗争浪潮之中。因为他执著地认为,湖南,才是他成长的沃土,那里有他血脉相承的父老乡亲,那里有他志同道合的良朋挚友。



11. 湘江怒涛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风尘仆仆地从上海回到长沙。第二天,在长沙楚怡小学教员何叔衡的家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会聚一堂,聚精会神地听毛泽东介绍他在北京六个半月、上海二十天的所见所闻。毛泽东着重向大家讲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

“世界大战已经在去年11月结束,战胜国方的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理当取消日本在战时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但是,和会上不但不予讨论,反而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转让给日本。对于这样一个公然出卖中国利益的和约,依靠日本军阀和财阀起家的北洋军阀,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照此下去,我们的中国将要被列强瓜分殆尽,我们可爱的中国同胞,就要亡国灭种了!”听了毛泽东慷慨激昂的发言,大家纷纷向毛泽东讲述了半年多来,湖南督军张敬尧封锁新闻,对平民百姓动不



动就抓捕、关押、砍头示众的滔天罪行。

最后，毛泽东以他那厚重的韶山口音对大家说：“列位，我听说，为了反对签订卖国的巴黎和约，北京和上海的学生，都在秘密准备，要在五月七日搞一次游行大会。反对签订卖国的巴黎和约。为什么要选在五月七日？我想大家都不会忘记，这是卖国贼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日子。现在，到五月七日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我们长沙也要抓紧准备，游行大会那天，把爱国的旗子打起来！”

“对，我们赶快行动起来！”

“我们要让他们看看湖南人民的力量！”

……

到会的师生们满腔义愤，一致发出赞同的声音。

从这一天起，长沙学生的爱国热情如奔涌的湘江怒涛，猛烈地冲击着三湘大地，一浪高过一浪。

1919年5月7日，毛泽东和长沙城里的学生们带着三角彩旗，拿着各种传单走上街头。“坚决废止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声，响彻湘江之滨，岳麓山谷。

5月8日，毛泽东从一批被督军张敬尧扣压的电报抄件上得知，四天前，也就是5月4日，北京学生的爱国大示威提前爆发，五千学生在天安门前聚



集游行,要求严惩卖国贼曹、陆、章^①。激愤的学生放火烧了曹汝霖位于赵家楼的住宅,正躲在赵家楼的章宗祥被拖出来痛打一顿。学生们还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誓死争回青岛”,“抵制日货”。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大批军队镇压,把 30 多名学生投入大牢……

张敬尧封锁消息、镇压学生的罪行激起了长沙师生更大的义愤。湘江在怒吼!全中国在沸腾!6月3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长沙学生 1 万多人于当天全体罢课,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斩杀陆曹,以谢天下”。全省各地学生也群起响应。毛泽东虽不是学联的主要负责人,但却实际参加了学联的领导工作和长沙以及全省的抵制日货运动。

也是在 6 月 3 日这一天,北京的学生举行全城沿街大演讲,结果,又有 1000 多名学生被捕入狱。

在此关键时刻,上海工人阶级于 6 月 5 日挺身而出,加入到反帝爱国斗争的行列,发动了意义深远的“六·五”政治大罢工。这预示着,伟大的五四

^① 即北洋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輿,驻日本的公使章宗祥。曹、陆于四年前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章于去年 9 月答应把青岛和山东全省让给日本。



运动已从单纯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全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了政治斗争的大舞台!

接着,全国相继有 20 多个省、100 多个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终于迫使北京政府于 6 月 7 日释放被捕学生,10 日下令免去曹汝霖等卖国贼的职务。在和约签字前夕,上万名旅法华工、留学生和华侨包围了中国代表团的驻地,警告中国政府代表如果出席和约签字,立即捕杀,并开出准备偿命的名单。

28 日,在爱国群众强大压力下,中国政府代表终于拒绝赴会签字。

“五四”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消息像一阵春风吹到长沙,吹遍湖南。在湘江两岸,洞庭湖畔,革命的浪潮如开闸的洪水,奔泻而出,势不可当。

1919 年 7 月 14 日,为了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湖南学联的机关刊物《湘江评论》创刊号在滚滚的革命洪流中问世了。担任主编的毛泽东以他大无畏的气概、犀利的笔触,接连发表了三篇论述“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详细论述人民必须联合、团结、组织起来,和有组织的统治压迫阶级对抗的极端重要性: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评论》的出版，像春雷一样在中国的南天炸响，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第一期印了



2000份,当天销完,又重印2000份。从第二期起,每期印5000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争相购阅,长沙的学生们自动地在街上销售,毛泽东自己也到街上去卖。北京的《新青年》、《新潮》和《晨报》副刊都对《湘江评论》做了推荐和介绍;成都的《星期日》、上海的《时事新报》都对《民众的大联合》做了转载。李大钊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在《每周评论》上对毛泽东大加赞扬:“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湘江评论》像一颗烈性炸弹,炸得统治者头昏目眩。督军张敬尧恼羞成怒,第四期以后,便下令查封,同时派出军警,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不屈不挠的毛泽东很快又出任《新湖南》周刊主编,继续进行革命宣传。不久,又被张敬尧查封。毛泽东便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张敬尧的黑暗统治。这个张敬尧是北洋军阀“皖系”的一个将领。自从他当了湖南省督军兼省长以后,搜刮民财,无恶不作,湖南的老百姓对他十分痛恨,称之为“张毒”,都说:“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赶走张敬尧,已成为湖南社会各界的共同愿望。

长沙的十月,江水闪着寒光,秋风透着凉意。就在毛泽东与反动当局艰苦斗争时,一个最大的不幸降临到毛泽东的头上——慈爱的母亲文七妹不



幸病逝。毛泽东带着跟他在长沙读书的小弟毛泽覃连夜赶回韶山,母亲已经入棺两天了。当毛泽东从二弟毛泽民口中得知母亲临终时仍在呼喊着自己的名字时,悲痛欲绝,泪如泉涌。他久久地守护在母亲的灵前,一件件童年往事浮现在脑际。在阴冷的秋夜里,在摇曳的灯光下,一篇催人泪下的《祭母文》从他的笔端奔涌而出:“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养育深恩,春晖朝霏。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huī),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

过了“头七”,毛泽东才含着泪水,告别母亲的亡灵,带着小弟泽覃返回长沙。

回到长沙之后,毛泽东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全身心地投入到驱张运动中。

11月,毛泽东参与领导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出“再组宣言”,继续公开活动。

12月2日,经过毛泽东等人的精心组织和策划,八千多学生、两千多工人组成的游行大军,来到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一次焚烧日货的示威大会。骄横霸道的张敬尧派他的四弟张敬汤带着一营队伍来镇压。张敬汤破口大骂男女学生为男女土匪,湖南人都是土匪,并让士兵把台上的人拖下地来,又是罚跪,又是打耳光……

学生们被激怒了!湖南人被激怒了!驱张运



动涌动着。这时,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的斗争也日益激烈。直系的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本是“有功之臣”,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位置却被皖系的张敬尧占去。直系岂肯善罢甘休?!当时驻在常德的直系将领冯玉祥也对张敬尧表示不满。

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直系皖系两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张敬尧已经完全孤立了,驱逐张敬尧出湖南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领导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和学联的积极分子,于12月6日起发动了全省学校总罢课。湖南学联用中学以上学校一万三千名学生的名义宣告:“张毒一日不去,学生一日不返校。”

总罢课开始后,湖南学生界教育界迅速组织了一个“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和西南地区,进行反张的宣传和鼓动。毛泽东亲率40人的赴京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福佑寺的禅房便是“湖南驱张代表团”办公的地方。毛泽东还于12月22日成立了一个“平民通信社”,自任社长,向京、津、沪、汉各大报馆寄发驱张的新闻稿。

转眼到了1920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北京参加湖南各代表团联合请愿行动,并作为与政府谈判的六名代表之一,揭露张敬尧的罪行。

这时,直、皖两系军阀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节节进逼下,张敬尧于6



月 11 日从长沙仓皇逃走,不久,他的部队也从湖南境内撤出。地方军阀谭延闿和赵恒惕的湘军乘机控制了湖南的局势。谭延闿自封为省长兼督军,赵恒惕担任湘军总司令,他们打着“湘人治湘”、“施行民治”的旗子,开始了新的军阀统治。

驱张运动胜利结束了。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被胜利所陶醉,他清醒地看到:从全国的局势来看,还是天下纷争、军阀混战,中华民族仍在危难之中,要挽救中国,还需要长期的奋斗和抗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毛泽东在心中默念着屈原的这句名言,又投入到新的斗争之中……



12. 真挚的爱情

1920年的冬天夹着雪花，吹着寒风来到了。长沙的各个学校都放了寒假，忙碌了一个学期的教员、学生们终于迎来了一个休息的日子。

这一天，担任了通俗教育馆馆长的何叔衡和周南女校的国文教员陈昌、《湖南通俗报》的编辑谢觉哉^①，还有方维夏^②、彭璜^③、王季范^④等，突然都接到了一张请帖，要他们到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去开“紧急会议”。

都放假几天了，还有什么“紧急会议”呢？难道出了什么大事？带着疑问，也带着几分紧张，大家

① 谢觉哉，湖南宁乡人。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71年逝世。

② 方维夏，湖南平江人。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1934年牺牲。

③ 彭璜，湖南湘乡人，新民学会会员。

④ 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的老师、学监。



如期来到妙高峰下的青山祠。这里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员宿舍,当时任附属小学主事的毛泽东就住在这里。只见毛泽东和往常一样,穿着那件灰不灰、蓝不蓝的长棉袍,满面笑容地站在宿舍门前迎接前来“开会”的客人,从他的表情上看不出有一丝紧张,不像是出了“大事”的样子。他身边站着一位文静、秀美的女子杨开慧,这是大家熟悉的霞姑娘,她虽然只有19岁,现在还是福湘女子中学的学生,但一向为人大方,做事果断。她和毛泽东的恋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所以她出现在这里,一点都不奇怪。不过,细心人却发现,今天的霞姑娘似乎多了一些腼腆,从她含羞的眸子里,大家似乎悟到了什么。

大家说说笑笑地走进屋里,发现室内虽然还是原先的样子,但显然比过去要整洁得多了。一向以雄辩著称的青年教员陈昌眼睛一亮,突然发现了室内的重大变化:在毛泽东的硬木板床上,除了他从韶山带来的那床老蓝印花布的棉被之外,如今多了一床白地、红花、洋布被面的新棉被,床头上还多了一只皮箱。这下大家才恍然大悟,一下明白了这个“紧急会议”的议题。

“润之啊,你和开慧这可真是新式结婚哟,祝贺!祝贺!”戴玳瑁框眼镜的何叔衡率先道贺,其他的人也都嘻嘻哈哈地说笑着,热烈地向他们祝福。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毛泽东连声道谢。



其实，这个先结婚、后宣告的主意还是杨开慧提出的呢！

关于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恋情，还得追溯到6年之前。那天，在杨昌济家里，当身材魁伟、雄姿英发的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杨开慧时，她还是一个13岁的少女。这位娴静端庄、聪明好学的霞姑娘，闪着一双晶亮的眼睛，坐在一旁听着爸爸和毛泽东高谈阔论，她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请自己深深仰慕的润之哥解答。以后，毛泽东常把自己的笔记拿给开慧看，开慧也把自己写的日记和笔记送给毛泽东看。开慧多次参加毛泽东组织的登山、郊游活动，还学习毛泽东常年冷水浴的坚忍精神，一年四季坚持冷水浴。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女孩子可是凤毛麟角啊！

1918年7月，17岁的杨开慧随家北上。8月，毛泽东便来到北京，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后，他便成了杨家的常客，常和杨开慧一起交流学习心得、畅谈人生理想。在异乡相逢，两人感到分外亲切，更增加了相互的感情。

1919年的冬天，毛泽东作为“湖南驻京代表团”的领导成员，又一次来到北京。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下了几天几夜，马路上、树枝上、四合院的房顶上都堆起了雪花。偌大的北京城，寒凝大地，一片冷清。



“请问，湖南代表团的先生是在这儿住吗？”杨开慧听说毛泽东来京，踏着厚厚的积雪，找到代表团住处，焦急地问道。大殿里传来了回音，从那浓浓的韶山口音里，杨开慧一下便听出这就是润之哥的声音，心中不禁一阵激动。

“润之，你躲到哪里去了？”开慧含笑地走进大殿，改用纯粹的长沙话问道。

“我正在这里写驱逐张敬尧的稿子嘛。你怎么来的？看你冻成这个样子，快来烤烤火！”正在伏案写作的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向开慧投去深情的目光。

“我是奉父母之命请你回家住的，在家里写文章不会冻手冻脚，写好再送来就是了。”开慧在火炉旁的小马扎上坐下来，亲切地说。

“哎呀！这恐怕难以从命哩！你想，代表团还有这么多人在这里住着，我怎么好一个人离开呢？二老的盛情我领了，请向他们转达我的谢意！”毛泽东一脸诚恳地向开慧解释道。

对此，开慧早有思想准备。她站起身来，无限深情地对毛泽东说：“润之，我理解你、支持你！我自己也要跟你们一起参加斗争！”

从此，毛泽东和杨开慧两颗炽热的心更加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在故宫，在北海，在香山，到处都留下了他们依恋的身影。杨开慧在日记中写道：“我



是十分地爱他。自从听到他的许多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她还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觉得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

1920年元旦过后不久,毛泽东最尊崇的老师杨昌济不幸病逝,杨师母和开慧哭得死去活来。毛泽东满含热泪,和开慧一起日夜守候在灵前。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妥善安排下,开慧一家扶柩南下,在故乡板仓,安葬了自己的亲人。

不久,在父亲生前好友李肖聃的帮助下,杨开慧身穿粗布开襟衣、青色裙子,留着闪闪发光的短发,进了长沙的福汀女中。后来,又与另外4名女同学冲破重重阻力,进入岳云男子中学第十四班学习,实践了她关于“男校开放女禁”的主张。

1920年10月,火样的红叶染遍了岳麓山,又一个收获的季节来到了。毛泽东在湖南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杨开慧毅然投身到这个革命的组织之中,成为第一批青年团员。同时,他们的爱情也在共同的奋斗中日渐成熟了。

就在这个“紧急会议”的头一天,开慧提着一个书包,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不坐花轿,不备嫁妆,不用媒妁之言,自由地同毛泽东结了婚。开慧还提





出：“既然是完全自由的结合，就应该打破一切古礼古法，不需要任何一种婚礼。”直到第二天才把朋友们请来，向他们郑重宣布，给他们一个惊喜。这天，他们在外面的厢房里摆了一张方桌，从饭馆里叫了六块钱的菜，毛泽东和杨开慧双双起立，向亲友们连连敬酒，表达谢意，亲友们也轮流敬酒，向他们道贺，直到傍晚时分，大家才高兴地散去。

这次酒宴之后，杨开慧继续在校学习。每逢假日，便来到这里与毛泽东团聚。

1921年6月下旬的一个傍晚，长沙城的上空乌云密布、雷声滚滚，一阵暴风雨即将到来。在小西门的招商局码头上，一高一矮两个人健步登上一艘客轮。轮船迎着夏夜的凉风驶向上海。站在船尾甲板上的这两个人就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他们是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秘密通知，谢绝了亲戚、朋友的送行，肩负着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重托，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这是毛泽东婚后第一次远行。临行前，开慧依偎在毛泽东身边，一再要求给他送行。毛泽东拉着杨开慧的手，帮她擦去脸上的泪珠，深情地说：“莫哭嘛，我去开会，几天就回来的。你怎么像个小孩子呀！参加这样一个会议，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哩！”开慧这才破啼为笑。

7月上旬，毛泽东和何叔衡经武汉到达上海。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子学校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12名代表围坐在一张菜台旁,每人面前放了几张油印文件。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可洛夫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毛泽东和其他各地代表分别向大会报告了当地的工作。接着,代表们来到望志路108号(现为兴业路78号)的厢房楼上,继续进行大会的议事日程。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大会的最后一天(31日)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

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①、张国焘^②三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

在大会期间,毛泽东担任会议记录。与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的李汉俊^③、李达等人相比,毛

① 李达,湖南零陵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66年逝世。

② 张国焘,江西平乡人。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后被开除出党。1979年死于加拿大。

③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脱党。1927年11月被军阀杀害。



泽东在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他也很少发言,但他却十分注意聆听别人的发言。在代表住处的一个房子里,这位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年轻人经常迈着沉稳的步子,走走想想,不时用手指去“梳”“梳”浓密的黑发。有时,他苦心思索竟达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会看到,有的同志因此责怪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的事哩!

党的“一大”之后,毛泽东回到长沙,被聘为湖南长沙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他随即辞去一师附小主事的职务,住进船山学社,以养病为名,积极开展建立党的湖南地方组织的工作。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在长沙城外的公共坟墓场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在坟墓中间的小路上一边走动,一边热烈地谈论着。那位身材魁伟、背略有点躬的是毛泽东,在他的旁边,那位矮矮的身材、宽宽的肩膀,长着黑胡子的是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他们正在这里秘密讨论组织湖南共产党的问题。1921年10月10日,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正式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

就在这时,杨开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起党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为了掩护毛泽东的



活动,她把母亲接到身边,一起住在中共湖南省支部(1922年改名为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所在地——长沙市郊清水塘22号。

在那些清苦的日子里,开慧既是毛泽东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又用她女性的体贴和温柔,为毛泽东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家。在清水塘那摇曳的灯光下,杨开慧伴着毛泽东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13. 在安源工人中间

共产党湖南省支部成立后,首先在长沙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一个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在湖南开展起来。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毛泽东第一次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充分展现了毛泽东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

1921年冬天,毛泽东穿一身旧蓝布衣服,背着一把雨伞,和李立三等人徒步来到安源考察工人状况。安源煤矿是江西萍乡煤矿的一部分,是当时中国较大的矿山之一,约有12000多人,当地还有株萍铁路的工人约4500人,且湖南籍人占有很大比重。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本的三重压迫,蕴藏着很大的革命力量。

一天,毛泽东提出要到工人最集中的西平巷掌子面去看看。

“那可是经常发生事故的‘老虎口’啊,去不得,千万去不得!”陪同的工人连声劝阻。

“你们工友们不是成年累月在那里干活吗?我



为什么去不得？毛泽东谢绝了工人的劝阻，下到矿井，穿过又矮又小的巷道，来到掌子面。他吃惊地发现矿工们一个个竟是赤身露体，全身沾满了煤灰，看上去都成了黑人，只是头上围条布手巾，手里拿着粗笨原始的工具挖煤，有的地方煤层很薄，他们就躺倒身子去挖，那些运煤的矿工，拖着沉重的煤筐在巷道里爬来爬去。

“你们为什么连衣服也不穿？”见此情景，毛泽东强忍着眼中的泪水，亲切地问。

“黑心的洋人、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哪管咱们工人的死活！你都看到了，来这里挖煤的人都是自备一块‘三尺布’，在井下包着头当矿帽，出井时围在腰里当遮羞布，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矿工们悲愤地向毛泽东诉说着。

在安源，毛泽东还亲自爬上矿工们住的三层床，看看他们盖的抹布似的破被，亲口尝了他们吃的霉米烂菜，还来到锅炉旁，坐在木头墩子上与司炉工亲切交谈。

“毛先生，你说咱们工人啥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那位司炉工拉着毛泽东的手问。

毛泽东指着地上的一粒小石子说：“这块小石子一脚就可踢开，但如果是块大石头，就不容易搬得动了。安源的工人团结起来，就像一座大山，资本家不但搬不动，倒下来还会把他们砸扁、砸死！”



听了毛泽东的话,这些满面煤灰的工人脸上绽开了笑容。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立即派李立三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后来,又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和弟弟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于是,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便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工友们像迎接一个盛大节日,“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不绝于耳,鞭炮声、锣鼓声回荡在安源上空。

9月14日,安源路矿1.7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

工人们向路矿两局提出了十七条政治、经济要求。经过5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带领工友们取得了罢工斗争的完全胜利。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湖南全省。工人斗争的热情空前高涨。从1922年9月至12月,先后爆发了粤汉铁路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长沙铅印工人罢工等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在毛泽东的直接发动和领导下,这些罢工都取得了胜利,受到社会的瞩目和党中央的高度赞扬。

在与工人的频繁接触中,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后来,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曾深有感触地说:“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了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

1922年10月,毛泽东当上了爸爸——长子毛岸英来到人间,给这个小家庭增添了新的欢乐。当开慧看着劳累一天的毛泽东亲吻着儿子,忘情地欢笑时,她的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甜滋滋的。

湖南工人运动的兴起,使省长赵恒惕大为光火。他把毛泽东视为最危险的人物,向他伸出了魔爪。

1923年4月的一天夜里,住在清水塘的毛泽东接到紧急通知:赵恒惕派兵抓他来了。毛泽东马上藏好文件,接过杨开慧递来的行李箱,从屋后穿过菜园小路,消失在夜幕之中……

赵恒惕狗急跳墙,在街头贴出通缉令:悬赏三千大洋缉拿毛泽东。

半个月之后,毛泽东从容布置完湖南党的全盘工作,才告别开慧和孩子,离开湖南前往上海,随后又南下广州,投身到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之中。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又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日常事务,起草、签发文件,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

这一年,毛泽东刚好三十岁。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激情满怀,信心十足。而半年之后,春风得意的他,又迎来了新的使命。

1923年底,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毛泽东要由长沙去上海,再转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临行前一天的晚上,毛泽东望着熟睡的儿子和正在为自己准备行装的妻子,依依不舍,心绪难平。他含着泪水,挥笔写下了一首离别词《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zhù)。



14. 国民党的大官

1924年1月20日,在广东高等师范学院的礼堂内,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在39号座位上,坐着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毛泽东。他被指定为19个章程审查委员之一。针对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他旗帜鲜明,慷慨陈词,以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人物的形象出现在讲台上。

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在一份文件上写上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这个提案显然是针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

对此论点,共产党代表李大钊当即严厉驳斥,国民党左派人物廖仲恺也给予反驳。

“主席!主席!三十九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年轻的毛泽东抓住时机,申明观



点。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未获通过。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作了多次颇有见地的发言。这位湖南青年的出色表现，立即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他在亲自拟定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中，毫不犹豫地写上了毛泽东的名字。就这样，毛泽东顺利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一跃成为国民党的大官。

大会以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在上海执行部的工作。6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带着毛岸英、毛岸青到上海和毛泽东团聚，一家人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在楼下厢房里，靠天井窗边有一张三个抽屉的写字台，中间是卧室，床上挂着从湖南带来的白色蚊帐，用竹竿撑着。中间还有一个方桌，靠桌边是毛泽东写文章的地方。桌边有两只凳子，一只宁波式摇篮，里面睡着刚满半岁的毛岸青^①，下面的架子是木头的，岸青哭时，大人用脚踏踏，摇篮便开始摇动，岸青就不哭了。

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毛泽东和以叶楚伦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带头联名上书孙中山，揭露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受到叶楚伦等人的排挤，加之积劳成疾，1924年年底，毛泽

^① 毛岸青，毛泽东次子。



东携妻儿回湖南老家“养病”。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然而他的三民主义革命精神却越来越深入人心,国民革命的浪潮也席卷全国。而以同年8月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暗杀为标志,国民党内部逐步形成了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国共合作的天空布满了阴云。

1925年9月,毛泽东回到广州,不久,即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32岁的毛泽东走马上任不久,国民党右派便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①、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的职务。这些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的人物还操纵上海的《民国日报》,大肆反苏、反共,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毛泽东挺身而出,在他亲自创办并兼任主编的《政治周报》上,发表短小精练的杂文,给以针锋相对的还击,指出“反共产”的实质是:“一般反革命党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

^① 谭平山,广东高明人。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和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逝世。



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显然这里所说的“联合战线”就是后来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

针对有人对国民党右派搞分裂的担忧,毛泽东指出:从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和结构成分来看,国民党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现象,但它不足以阻碍中国的国民革命。

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斗争下,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受到了党纪处分,但一个国民党右派的代表却跳出来说:“国民党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

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当即予以反驳:关于共产党人的身份,“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至于共产党的活动,“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



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

毛泽东发言的有理有据,迫使那名代表很不情愿地收回了提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但这次大会在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国民党右派的攻击却没有拿出什么对策,在选举的问题上,甚至决定向新右派退让来缓和联合战线内部的矛盾。结果,新右派的代表人物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里,蒋介石原来只是一个军长,此时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总监,这就为他日后篡夺领导权提供了条件。后来,毛泽东在谈到国民党二大时会沉痛地说:“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果然,两个月后,蒋介石就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借此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在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和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力主反击,因为



黄埔军校有 500 多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 6 个军中,5 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叶挺独立团也掌握在共产党手中。

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却被当时具有决策权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拒绝,中共中央也从上海发来指令,对于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合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就这样,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又提出了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对于这样一个限制共产党的规定,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却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性格刚毅的毛泽东气愤之极,拒绝签字,全会表决时他也没有举手。

最后,会议还是通过此案,于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毛泽东也于 1926 年 5 月 25 日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位置,把他的精力投入到另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之中。



15. 农民运动的“王”

1925 年底,毛泽东根据他在韶山养病期间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文中明确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这是针对当时共产党内存在的两种倾向而写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其实,早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便提出了农民运动的问题,他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造反的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



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经过长时期的探索,毛泽东以他卓越的智慧和洞察力认识到这个关键性问题,并全力投入到农民运动中来,从而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毛泽东还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之晒着酷热的太阳,冬之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同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统一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9月11日,毛泽东以满腔的热情,送走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班的学生。学生们像革命的火种,撒向全国各地。此时,广州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农村大革命的烈火也越烧越旺。湖南省,这个由毛泽东亲自建立起来的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革命的浪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毕业于第六



届农讲所的毛泽民、王首道等 30 多名学生回到湖南后,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到 1927 年 1 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民工作人员有 203 人,农协会员从 40 万人激增到 200 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到 1000 万人,有近一半的湖南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在反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斗争中展开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也被冲得七零八落,有些农协和工会代表甚至已经参加了县务会议。

农民运动像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一片哗然,社会上各种议论和指责也接踵而至。

“什么农民运动?完全是‘痞子运动’,既破坏了社会秩序,又扰乱了北伐后方!”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坐不住了,发出了一片叫骂声。

“农民这样做太‘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止被人利用。”一些中间分子开始动摇起来。

“湖南的工农运动太过火了,是一种幼稚的举动,发展下去,必将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在 1926 年 12 月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毛泽东的做法又遭到了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的批评,并做出了这样的错误决策: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从右向左转,同时扶持汪精卫取



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

面对社会上的攻击和党内错误决策，不屈不挠的毛泽东决心以事实来加以反击。

1926年12月17日，毛泽东偕杨开慧等亲自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考察，回到长沙后，参加了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又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在省农协负责人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从长沙登船，踏上了去湘潭考察的路程。

5日晚，在湘潭县银田镇的农民座谈会上，30多位农协代表围坐在毛泽东周围，谈笑风生。

“农民协会办起来了，许多农民涌进土豪劣绅家里杀猪出谷，连小姐和少奶奶的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高露乡的代表绘声绘色地描绘着他们同地主豪绅斗争的情景。

“滚得好！”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高兴地说。他想起在故乡韶山冲，在农民群众的欢迎大会上，他也曾用风趣的语言谈到农民协会的力量：

“过去，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民国十四年，我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一些人对我讲‘我们八字不好，坟山不贯气。现在，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只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



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走好运,他们的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又走坏运,坟山也一起不贯气了么?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贯气了。如果不要农民协会,只要皇后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在湘乡的座谈会上,当听说宋塘有个姓朱的地主婆对抗农会,农民用纸扎了猪头形象的假面具,勒令她戴着去示众,把地主的体面威风一扫而光时,毛泽东兴奋地站起来,大声喊道:

“好得很!农民运动的兴起,这是几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奇迹。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嘛!他们的行动,好得很嘛!”

在座谈中,毛泽东还鼓励农会迅速壮大农民武装,他旗帜鲜明地说:“你们想想看,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没有武装行吗?干革命,就要枪对枪,刀对刀的干!”

“毛委员,搞武装,人有的是,可武器到哪里搞呀?”有人疑惑地问道。

“你们不是有梭镖吗?另外,县里团防局有的是枪,把枪抢过来,不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武装了吗?毛泽东不仅给农协的人出主意,不久,还通过省农协派了一位黄埔军校的学生到湘乡,帮助培训农民自卫军。



2月5日,毛泽东带着丰硕的成果回到长沙,结束了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的考察活动。

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到武汉,在都府堤四十一号住所的卧室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向中共中央写信汇报这次考察情况,他由衷地希望中共中央能够接受这些来自革命实践的呼声。不久,一篇长达两万余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赶写出来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写道:“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到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3月5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先刊发了此文。

3月12日,文章又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上登载。

4月,瞿秋白^①以《湖南农民革命》为题,出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

^①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5年就义。



发。他在序言中写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①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他还在文中送给毛泽东一个“农民运动的王”的称号。

就在毛泽东的这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问世不久，杨开慧又在武昌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可是，毛泽东实在太忙了，在这样的时刻，他无法守候在妻子身边。这段时间，他的肩上又新添了三副担子：3月30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4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毛泽东等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4月4日，就在儿子出世的那天，毛泽东作为中央农民讲习所常务委员，正在主持开学典礼哩！这不，直到孩子出生第四天，他才匆匆赶到妻子的身边。

望着开慧含泪的目光，摸着儿子红红的小脸蛋，毛泽东带着愧意的脸上露出笑容。他知道，开慧是能够理解他的，他高兴地和开慧一起为儿子取名岸龙^②。抬眼望着窗外乌云密布的天空，一种忧

^① 彭湃，广东海丰人，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1929年牺牲。

^② 岸龙，又名毛远智。30年代在上海失踪。



郁的神情即刻又爬上了毛泽东的脸庞。他预感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一场险恶的狂风暴雨即将来临，他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担心，也为新生儿子的前途忧虑。

等待着毛泽东和这个家庭的，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前景呢？



16. 挥师上井冈

就在毛泽东见到刚刚出世的小儿子毛岸龙后的第5天,即4月12日,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举起屠刀:上海的工人300余人被杀,500余人被捕,5000余人失踪。4月18日,蒋介石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宣布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①为非法,陈独秀、毛泽东等193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上……

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政治风云突变的紧急关头,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上山”的策略:“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①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果然,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也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封闭工农组织,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把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推入血泊之中。

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到了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

共产党人别无办法。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两万多人,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怡和新房”公寓里,中国共产党的一代精英秘密聚会,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正在进行。陈独秀没有到会,28岁的瞿秋白临危受命主持中央工作。在血与火的熏陶中愈发刚毅、精瘦的毛泽东慷慨陈词,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中领导权等四个方面,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作了批评。特别是关于军事工作,他尖锐地指出:

“从前我们骂中山(指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瞿秋白深知“上山”、“弄枪杆子”



的观念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他从深度近视眼镜片底下向毛泽东投去真诚的一瞥，嘴角露出了一丝会心的笑容。

会后，瞿秋白诚挚地对毛泽东说：“润之，现在形势严峻，任务艰巨，中央的人手很缺，我看你就留在中央工作吧，也好助我一臂之力！”

毛泽东面有难色地思索片刻，最后还是坦率地说道：“秋白，你的盛情我领了。但我觉得下面的实际斗争更需要人。中央既已决定我在湖南组织秋收暴动，我就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绿林好汉交朋友！”就这样，秋白不再说什么，他紧紧地握住毛泽东那双厚实有力的双手，默默地祝福他一路珍重。

8月12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前委书记的身份离开血雨腥风的武昌城，搭乘货车连夜赶到长沙。这时的长沙，酷热难当，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马日事变^①后，反革命的枪声四处响起，被抓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一个个戴着脚镣、手铐被推上囚车……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毛泽东深知此次任务的艰难和危险。在这特殊的时刻，他急赴爱妻杨开慧的家乡——长沙县清

^① 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何键所部在长沙发动叛乱，捕杀共产党及工农群众，称为“马日事变”。



水乡板仓村。开慧是8月初带着两个儿子从汉口回到板仓的，她也在时刻牵挂着丈夫的安全。

“开慧，我就要去组织秋收暴动了，你带着孩子要多多珍重！”毛泽东凝视着妻子愈加清瘦、俊秀的脸，深情地说道。

“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开慧许久才开口问道，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总会见面的！孩子全靠你了！”毛泽东帮她揩去泪水，安慰她说。

“你放心地去吧！孩子长大了，会沿着你的脚印走的！”开慧仰首望着丈夫，坚定地回答。毛泽东一下把开慧搂在怀中，泪水也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毛泽东走后，杨开慧一直带着孩子在板仓老家从事地下工作。1928年10月，日夜思念毛泽东的杨开慧写下了《偶感》一诗，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1930年10月,开慧在板仓家乡不幸被捕。她带着大儿子岸英,在狱中坚持斗争,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拷打,她厉声说:“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11月14日,在长沙城浏阳门外,杨开慧英勇就义,为革命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当地农民冒着被砍头的危险,连夜把她的遗体运回板仓,埋葬在青山环绕的棉花坡上。

毛泽东从报上得到噩耗后,悲痛万分。后来,他对开慧的亲属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

27年之后,毛泽东在给老战友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写信时,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表达了他对杨开慧的真挚情感: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
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
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成永诀!

安顿好妻儿,当晚,毛泽东便风尘仆仆地从长沙出发,奔赴株洲、安源和铜鼓三地,传达“八七”会



议精神,组织秋收起义骨干军事力量,确定起义部队编制和进军路线。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一、二、三团,在前敌委员会领导之下,由毛泽东任党代表,卢德铭为总指挥。会议还决定,起义部队配合各地工农武装,计划分三路进军长沙。

不料,当毛泽东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做安源煤矿的采购员从安源赶往铜鼓时,在路上被民团抓住。

民团团丁奉命把毛泽东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幸好他们并没有认出这就是他们多年来悬赏捉拿的毛泽东。毛泽东急中生智,便拿出身上借来的几块钱,贿赂押送的两个团丁。这些团丁都是雇佣来的,枪毙一个“采购员”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没有别的办法,毛泽东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他才找到机会。他一下子从押送的队伍中挣脱出来,撒开腿往田野里跑。

“跑了,跑了,快追呀!”待毛泽东跑远了,两个受贿的团丁才喊了起来。几名手持梭镖的团丁追了过来。

毛泽东翻山越岭,发现一个四周长满荒草的水塘,便把身子潜入水中,只露出脑袋隐藏在草丛中。



追来的团丁用梭镖往草丛中乱戳，他们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梭镖几乎可以碰到毛泽东的脑袋，幸好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只得放弃搜寻。毛泽东等敌人走后爬出水塘，乘着夜色向铜鼓赶去。由于毛泽东的鞋子在被敌人抓住时便被收去，赤着的脚板磨得都是血口子。路上正巧遇到一个打柴的农民，毛泽东和他交上了朋友，拿出身上剩下的七块钱，请这位老农到山下为他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休息一夜之后，第二天继续赶路。当毛泽东最后安全地走到铜鼓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卢德铭领导下，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手拿大刀、梭镖的工农武装和手持长枪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战士们高喊着“打倒汪精卫”、“打倒唐生智^①”、“暴动胜利万岁”的口号一起冲锋陷阵。起义之后，穿长袍、蓄长发的毛泽东诗兴勃发，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

^① 唐生智，湖南东安人。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等职。解放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湖南省副省长等职。1970年病逝于长沙。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
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
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反革命势力急忙调集重兵，向革命队伍扑来。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之起义军的一些军官麻痹轻
敌，起义队伍接连受挫，损失惨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起义军面临艰难的抉择：如
按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继续攻打长沙，势必全军覆
没。如果退却的话，便会蒙受临阵“逃跑”的罪名。
师长余洒度是原武汉警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自以
为懂得军事，一直未把身边这个教书先生出身的毛
泽东放在眼里，坚持要打长沙（后来，这个余洒度还
是叛逃到国民党那里去了）。

在这紧要的关头，毛泽东审时度势，不顾个人
得失，在总指挥卢德铭支持下，断然作出了“向萍乡
方向退却、沿罗霄山脉南下”的决定。

9月20日凌晨，凉风习习，在浏阳文家市里仁
学校的操场上，工农革命军一、二、三团1000多名
指战员集合完毕，毛委员站在队前，庄重地向大家
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说：

“这次起义我们虽然打了几个败仗，受了点挫
折，但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



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我们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了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只要我们团结得紧,继续勇敢地战斗,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毛泽东的话,给了遭受挫折的战士们极大的鼓舞。会后,这支千人的工农革命军,高举“工农武装割据”的大旗,沿湘赣两省边界南下,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战略进军。行军中,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磨破,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担架,来到他的面前:

“毛委员,快上担架,让我们抬你走一会儿吧!”

“谢谢你们,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毛泽东谢绝了战士们的关心,忍着疼痛,一边走还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

9月23日,起义部队在萍乡芦溪遭到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部队剩下不到一千人了。

经过5天的艰苦行军,部队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来到群山怀抱的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他宣布:



“同志们，我们的部队要在这里进行一次改编。本着自愿的原则，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愿意留下的就留下，愿意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我们还欢迎。”

然后，将原来的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官兵一致，经济公开。这三项措施的实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们自由散漫的作风，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10月3日，毛泽东对改编后的全体指战员做了动员讲话：

“同志们，敌人在我们屁股后面放冷枪，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干革命，现在当了军长。我们现在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

“毛委员不怕，我们也不怕！”

“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怕干不起来？”

毛泽东朴实的话语，激起了战士们继续斗争的热情。当天，工农革命军离开三湾到达宁冈县古





城。为了消除宁冈的地方武装袁文才^①部队的疑虑,毛泽东于10月6日带上少数随从,亲自到大仓村会见袁文才,并慷慨地送给他100条枪,帮助他扩充武装力量。袁文才为毛泽东的诚意感动,当即回赠了几百块银元给工农革命军作军费,并帮助说服了井冈山上的王佐^②部队站到革命军一边。

10月23日,王佐派代表朱持柳前来迎接部队上山,毛泽东率队在荆竹山村旁的大路边欢迎,并当场宣布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只红薯”和“打土豪要归公”的三大纪律。

10月27日,部队进驻井冈山中心——茨坪,受到王佐部队和当地群众的欢迎。毛泽东又送了70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70担稻谷和一些银元。袁文才和王佐这两个“山大王”在毛泽东的感召下,为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此,工农革命军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毛泽东亲自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它将以燎原之势,蔓延全中国。这一年,毛泽东只有三十

^① 袁文才,江西南冈人。井冈山农民武装领袖,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后,他带领农民接受改编,为建立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作出过贡献。1930年牺牲。

^② 王佐,江西遂川人。井冈山农民武装领袖,接受改编后曾任工农革命军副团长、师长。1930年牺牲。



四岁,他终于找到了施展自己“改造中国”伟大抱负的用武之地。他深知,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条布满荆棘而又险象环生的路。但他决心走下去,只要是认准的路,就一定要走到底。艰难困苦、百折不挠——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



17. 危难之中

位于湖南酃(líng)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交界处的井冈山,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山势险要,密林遮天蔽日,只有小路穿插于树林沟壑之间,进可攻,退可守。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都有水田和村庄,四周二十多县尽是盛产粮食、人烟稠密的丘陵。山里还盛产南瓜,一个南瓜常常重达百斤左右,如果部队被围,就可以用南瓜来填饱肚皮。而且这里远离中心城市,国民党军队鞭长莫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的确是工农革命军落脚的好地方。

1927年10月中旬,国民党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爆发战争,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兵力空虚。毛泽东乘机率工农革命军下山,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县城。

国民党当局原以为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已被消灭得差不多了,此刻十分震惊。1928年初,国民党江西当局派出一个团和两个营的兵力,对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发动了进攻。

毛泽东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方针，经数小时激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一个营和宁冈靖卫团，俘虏近 300 人，大获全胜。

这样，到 1928 年 2 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游击队、赤卫队。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在井冈山建立起来。

然而，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却落到了毛泽东的头上。3 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根据中共中央上年 11 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 12 月 31 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毛泽东在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说中央已决定将毛泽东“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让何挺颖当书记。这样，毛泽东一下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这无疑是毛泽东投身革命以来在党内受到的极为严重的打击。但是，毛泽东挺住了，虽然思想



上不痛快,但行动上却服从了组织。让当师长就去当师长。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率队出征,配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举行了湘南暴动,后又掩护他们摆脱追兵,向井冈山撤退。

4月24日前后,井冈山根据地大本营——宁冈砦市春风和煦,万木争荣。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姹紫嫣红,竞相开放。在龙江书院的状元桥上,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互相倾慕、神交多年的朋友,今天终于见面了。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从此,井冈山斗争和中国革命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朱毛会师,一致决定将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陈毅率领上山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毛泽东提议朱德任军长,得到大家衷心的拥护。朱德、陈毅一致推举毛泽东任党代表。

“你们别开玩笑,我被中央开除了党籍,当党代表怎么行?”毛泽东一口回绝。

“什么?”朱德、陈毅大吃一惊。

毛泽东便把周鲁传的话讲给他们听。

“这个周鲁真是乱传圣旨!”朱德听了介绍,恍然大悟,他对毛泽东说:“这事我知道。你没有坚持打长沙,中央只是撤掉了你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你还是中央委员嘛,怎么不能当党代表?”

大家这才如梦初醒,一致推举毛泽东出任红四



军党代表兼军委书记。而后,又讨论决定:陈毅出任军政治部主任,王尔琢出任军参谋长。全军编为三个师九个团。

看着漫山遍野的红旗、青松和翠竹,看着壮大起来的革命队伍,毛泽东忘记了个人的屈辱,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一个月之后,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与19岁的贺子珍结为伴侣。早在大革命时,贺子珍就担任了永新县首任团支部书记,县党部妇女部长,1927年3月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并被任命为县委妇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请她担任宁冈农民自卫军的宣传队长,成为井冈山上的第一个女战士。毛泽东上山后,在共同的斗争生活中,贺子珍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毛泽东也很喜欢她,并如实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

朱毛会师后,接连粉碎了湘赣两省敌人的两次进剿,毛泽东、朱德在实战中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为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边界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湘赣边界割据进入全盛时期。

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在井冈山建立起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始,到1930年,全国



各地相继建立了十多块革命根据地,红军总数也发展到十万人。国民党对此十分恐慌,调集重兵,先后对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企图扑灭即将燎原的革命烈火。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向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并扬言要在3个月至6个月内彻底解决问题。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总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对策。

会议之后的一天,在红军集结地小布的大河滩上,红军战士列队站立。周围山风冽冽,红旗招展,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两侧,毛泽东亲笔手书的长联格外醒目: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后撤,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朱德致开场白之后,毛泽东习惯性地左手叉腰,挥舞着右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动员讲话。他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还精辟地分析道:

“这次‘围剿’,敌军虽有十万之众,但都不是蒋



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吃掉这两个师,这次‘围剿’便可以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而我军有四万余人,如果一次打对方一个师可占绝对优势,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现在,我们就先打离我们最近的谭道源师,瞧,它们就在右边那座大山后面的源头,把它吃掉后,我们再去吃离我们稍远的张辉瓒师。为了诱敌深入,我们已派红三军到东固去牵他的‘牛鼻子’去了……”

毛泽东简短的动员,极大地振奋了红军官兵的士气。

第二天拂晓,部队轻装向北,在小布与源头之间设下埋伏,派兵诱惑五十师出战。但老谋深算的谭道源龟缩不出,想让张辉瓒先动手,便电告张辉瓒请求支援。

急于抢夺战功的张辉瓒接到电报,立即出动,直向龙冈扑来。

龙冈是个狭长的盆地,周围群山环抱,山中林深苔滑,是红军设伏的好地方。毛泽东当机立断,调集红军在山林中潜伏下来,等候敌人的到来。

张辉瓒自以为兵强马壮,来势汹汹,没想到一头钻进红军布设好的“口袋”里。毛泽东乘敌人立足未稳,马上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顿时,嘹亮的冲锋号声响彻山谷。红军官兵从



四面八方冲向敌群。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激战到下午六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势如铜墙铁壁,杀得敌人哇哇乱叫,九千余人自相践踏,乱作一团,纷纷缴械投降。

见此情景,张辉瓒绝望了,穿上一套下级军官的服装,钻进深山密林匆匆逃命。最后,还是被红军战士从茅草丛中揪了出来。

“张辉瓒捉到啦!十八师完蛋啦!”

红军战士和江西老表的呼喊声回响在毛泽东耳畔。

毛泽东一阵兴奋,立即同朱德一起,指挥红军主力乘胜进军,向位于龙冈以东的谭道源师追去。

1931年1月3日,红军主力追至东韶,一举歼灭谭道源师的一个旅。其他各路敌军闻风丧胆,全线撤退。至此,红军五天之内连打两个大胜仗,歼敌一万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战后,毛泽东诗兴勃发,挥毫写下了著名词章《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二十万军重入赣”，说的是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兵力发动的第二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由西向东横扫七百余里，歼敌三万余人，俘敌一万一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军的第二次“围剿”。

第二次“围剿”失败，蒋介石痛心疾首。不得已，亲率三十万人马（其中十万是他的嫡系精锐），气急败坏地向三万红军扑来。

毛泽东沉着应对。从1931年8月6日至9月15日，他和朱德一起，指挥红军突破敌军重围，从容转战，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大批作战物资。从而宣告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又以失败告终。

毛泽东率领红军连续打破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就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时候,国内外政局风云突变。日本突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四个月内,我国的东北三省陷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地位,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

这时,在共产党内,也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27岁的王明^①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倚仗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在1931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代表左倾教条主义者,取得了统治地位。当年9月他去设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工作后,又指定他中山大学的同学、时年24岁的博古^②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代替他在党内发号施令。

这个博古长得精瘦,带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③的亲密伙伴和坚定拥护者。他们敌我不辨,

①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金寨人。以他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党中央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严重的损失。

② 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

③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实行错误的指挥,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



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一味强调“进攻路线”，而对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路线，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从此，毛泽东又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境地，政治上的打击接踵而来。

1931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刚到苏区不久，便在瑞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们给毛泽东扣上一大堆帽子，指责他是“狭隘经验主义”、“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设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了毛泽东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实际上取消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1932年6月16日，蒋介石又调集五十万大军，向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只能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由于负责军事指挥的周恩来、朱德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的作战方针，仍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来100万部队、200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者



博古、李德把毛泽东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采取了“两个拳头打人”和“防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使红军在一系列防御战中遭受严重损失，经过一年苦战，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突围长征。

本来，博古、李德还不愿意带毛泽东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在红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才被允许和贺子珍一起参加长征。但按规定不准带孩子，这样，毛泽东和贺子珍只好把他们可爱的儿子毛毛^①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贺怡照顾了。在战争时期，毛毛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可惜，后来再也没有找到。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来临了，患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被人抬到于都河畔准备渡河。萧瑟的秋风中，望着夕阳西下的河水奔流远去，毛泽东百感交集，耳畔依稀响起战马的嘶鸣，还有苏区人民情意缠绵的歌声——

九送红军上高山，
一阵北风一阵寒。

^① 毛毛，即毛岸红，毛泽东和贺子珍1932年12月在福建长汀所生。



问一声啊红军哥——
几时人马再回还？
.....





老样子打下去,红军就只能毁灭。大家强烈要求改变当前的领导,希望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

在长征初期的这段时间里,因伤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和张闻天^①、王稼祥^②,也开始讨论起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1935年1月9日,毛泽东骑着他的大白马,进了被红军攻克的遵义城。

1月15日晚饭后的七点钟,在国民党一个师长的豪华住宅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后果和长征中作战失利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适当的行动。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

这次历时三天的会议主持人是博古。李德坐在门旁边。

博古首先发言,把红军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中央苏区以外的红军配合不力。他的发言显然是推卸责任。

① 张闻天,又名洛甫。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35年遵义会议后,代替博古负总责。

② 王稼祥,安徽泾县人。曾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遵义会议后,为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员和书记处书记。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坦率地承认第五次反围剿中阵地战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受到与会同志的赞扬。

接着,毛泽东做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他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并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红军同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作战并取得胜利的事实,反驳了他们认为失败是由于数量上的劣势造成的这一观点,说明了失败的原因不是数量,而是战术,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

毛泽东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出了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没有机会说出的心里话。

“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王稼祥的发言直截了当。

张闻天、朱德、聂荣臻和彭德怀也都坚决支持毛泽东。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的工作,从而清算了“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领导核心,帮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3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一起被中央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开始独立于莫斯科的指



挥棒之外。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长征途中，中央红军的电台被打坏了，从此和上海和莫斯科失去了联系，而决定毛泽东命运的遵义会议，正是在任何人都无法遥控指挥，也无须任何人批准的情况下召开的。人们不敢想像，假如这部电台当时依然能够正常使用的话，其结果又将如何？

在危难中复出的毛泽东，不久便以他大无畏的气概和超人的智慧，写下了军事上平生最得意的一笔——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3万余人从遵义出发，挥师北上，于1月29日在土城、元厚场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准备北渡长江，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由于张国焘违背中央关于红四方面军向西线进攻，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的指示，致使敌人得以沿长江构筑严密的封锁线。因此，中央红军只好放弃原定的渡江计划，西进至云南威信地区。然后乘贵州境内敌人空虚之际，调头东进，于2月18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占领娄山关，重入遵义，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毛泽东和军委纵队一道进驻遵义，在经过娄山关的时候，他策马登上了山顶。这时，太阳还没有落山，战场上血迹斑斑，硝烟弥漫。野草丛中一块刻着“娄山关”三字的石刻跃入毛泽东的眼帘。他



诗兴勃发，写下了苍凉、凝重的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打乱敌人的部署，3月16日，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茅台三渡赤水，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渡江，急调大军布防长江。但出乎敌人意料，红军突然折回贵州，于3月21日晚，又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3月底南渡乌江，佯攻云南，威逼昆明。然后又向西北方向急进，于5月巧渡金沙江，飞夺铁索桥，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间，红一方面军翻越了常年积雪、人迹罕至、空气稀薄的大雪山，在四川与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两大红军主力虽然会师了，但又面临着分裂的危机，每次开会，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要挟中央，争权夺利，甚至考虑用非常手段来解决他和中央的分歧。面对这来自内部的挑战，毛泽东沉重的心情可想而知。随后，中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过



草地北上。9月上旬,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坚持南下,在无法说服张国焘的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领红一、三军团继续北上。9月12日,在甘肃俄界把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随后突破天险腊子口,冲破了敌人设下的最后一道堵截,把敌人想凭借天险消灭红军的梦想打得粉碎。

翻越岷山后的第三天,即1935年9月20日,毛泽东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读到一张报纸,意外地发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和面积不小的苏区,到那里只有700多里的路程了。异常兴奋的毛泽东当即决定:到陕北去,实现北上抗日、创建根据地的目标。随后就派人同陕北红军联系。

长征的落脚点就这样最终决定下来。一年来红军且战且走,选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落下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漫无目的地行军。如今终于有了方向和目的地,怎不让人欣喜若狂?

毛泽东顿觉心胸豁然开朗,又一次诗兴大发,一首千古流传的史诗《七律·长征》一挥而就: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跨越六盘山。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

毛泽东登上海拔3000米高的峰顶时,心潮澎湃,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1月5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他向随行部队的讲话中,对长征作了这样的总结: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热情地接待了第一个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用十几个晚上的时间向他讲述了长征的故事,讲起了长征中的苦难和牺牲,狂欢和胜利。毛泽东还戴上红军军帽,身穿黑蓝色军装,让



斯诺为自己拍了一张闻名国内外的半身照片。在保安破旧的窑洞前，在黄土高原耀眼的阳光下，瘦削的毛泽东侧身转头，直视前方。这个特写镜头，和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一样，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人们看到，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深藏着一个革命者超人的坚毅，跳动着一个“马背诗人”澎湃的激情。

艰难的长征结束了，毛泽东依旧深深眷恋着马背上的生活。马背上的颠簸往往使他诗兴大发。直到晚年，他谈起马背上的生活和在马背上哼成的诗作，仍然怀着抑制不住的激动。1955年，62岁的毛泽东在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时曾经说过：“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韵律。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那些日子，还觉得留恋。”

的确，越是艰难困苦的环境，他的诗词创作欲望就愈强，他的诗作就愈能体现一种博大恢宏的气势，给人以荡气回肠的壮美感受。



19. 窑洞烛光

这是 1938 年初春的一个夜晚，黄土高原的寒风还在呼呼地吹着，作为红色根据地的延安已经进入了梦乡。可是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依然闪耀着明亮的烛光。在两支蜡烛的陪伴下，毛泽东正凝视着漆黑的窗外，构思着一篇伟大的著作。

转眼，红军到达陕北已经两年多了，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系列事变一幕幕闪现在毛泽东的眼前：

1936 年 2 月，为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和打通抗日道路，他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歼敌一万多人，于 5 月胜利返回延安。

1936 年 12 月 12 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为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在西安发动政变，扣留了蒋介石。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从抗日大局出发，和平解决事变，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

1937年9月,我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击毁敌汽车100余辆,取得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了南京,30余万同胞被屠杀在血泊之中。

1938年3月下旬,日军七八万人向徐州附近的台儿庄进攻。国民党集中数十万兵力与日军会战,歼敌精锐部队1万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的最大胜利。后来日军于5月初进攻徐州,国民党军队仓皇撤退。5月19日,徐州失守。

屈指算来,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10个月,北平(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着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人们感到迷惘。有人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不利方面,而看不到有利方面,到处散布“亡国论”;有人只看到有利方面,而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鼓吹“速胜论”。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



的经验做个总结。

毛泽东已经有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他总是伏在桌子上不停地写,有时实在太累太困了,就打盆冷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到院子里转一转,躺在椅子上闭目养一会儿神,又继续写。

“主席,吃饭啦。吃完饭,睡会儿再写吧!”毛泽东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警卫员把饭菜给他端去,关心地说。

“好,我等一会儿吃了就睡。”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头也不抬地写着。

约莫过了一顿饭工夫,警卫员推门进去收拾碗筷。一看,他还在写着,饭早已凉了。警卫员无可奈何的摇摇头,只好把饭菜端去热一热,再给他送去……

就这样,五六天过去了。毛泽东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面颊明显地消瘦下去。

到第七天,毛泽东还没有停下笔来。警卫员看他冻得直跺脚,就拿了盆炭火搁在他的脚边,又找了条毛巾毯,给他垫在椅子上,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

“警卫员,快过来一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毛泽东突然叫了起来。警卫员急忙跑了过来,一股破布烂棉花的焦糊味冲入鼻子,毛泽东正忙着脱那只正冒着烟的棉鞋哩。原来他聚精会神地写作,把棉





鞋也给烤着了,只得换上单鞋。

“主席,您还是睡一会儿再写吧!”警卫员用水把棉鞋上的浓烟浇灭,乘机又劝说起来。

“好!好!我一会儿睡!一会儿睡!”毛泽东说了这句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话,点上一支烟,又提笔写了起来,把刚才发生的事忘得无影无踪。

八九天以后,当启明星再次从东方升起的时候,眼圈发青、眼里布满血丝的毛泽东把警卫员叫来,交给他一卷用报纸卷好的纸卷,让他过延河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而这时的毛泽东侧身躺着,不断地用手捶着自己的腰,疲倦的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一篇五万余字的历史性巨著《论持久战》,就这样在延安的窑洞里诞生了。据统计,收入《毛泽东选集》的 158 篇文章,有 112 篇都是在西北的窑洞里写成的,而《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战争的性质,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

《论持久战》精辟地分析说,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



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

毛泽东指出: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他总结道:“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毛泽东还以犀利的眼光,科学地预见了持久战将经过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着重阐明了关于人和武器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增强了人们对抗战胜利的



信心。同时也使他博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钦佩与尊重,连他的老对手蒋介石也不得不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把《论持久战》的精神,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抗战开始后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写出了这篇能正确指导战争实践的著作,并且毛泽东在文中的预言,都被后来的抗日战争实践所一一证实。从此,毛泽东——这位农民出身的伟大战略家和预言家,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不少西方记者远道而来,试图通过这位神秘的人物,来推测中国革命的未来,其中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他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就是典型的代表。黄土高原上的这座古城延安,给黑暗中的人们指明了方向。一批又一批的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青年学生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这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938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去苏联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演员出身的江青结了婚。



20. 延安岁月

1941年的春天挟着风雪和严寒来到了黄土高原。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到1941年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恰在此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6月20日,苏德战争爆发。同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两国立即对日宣战。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已进行了四年多以后,这时才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然而陕甘宁边区的困难却日益严重。

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与此同时,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八路军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蔬菜的地步,战士鞋袜没法补充,工作人员办公、学习没有纸,冬天没有被子



盖……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住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常常不带警卫,一个人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无拘无束地跟老百姓交谈。当和部属或来宾们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拉他站在中间,他随意地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没有一点架子。干部和一般群众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跟他说。

1941年6月的一天,延安城里大雨滂沱。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开会讨论征粮问题。“轰隆隆”一声巨响,会议室突遭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便发牢骚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炸死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没有叫人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雷劈一事发泄不满。毛泽东知道工作上这个失误后,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1941年的二十万担(每担100公斤)减至1942年的十六万担。这件事的处理,使老百姓看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毛泽东在老百姓心中的威信更高了。

1943年,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层层封锁,妄图把我抗日军民困死、饿死在他构筑的牢笼之中。同时,日军向我各抗日根据地发起了更加疯狂的扫荡。革命前途危在旦夕!人



们在急切地寻找着新的出路。

在这危急的时刻,这年初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军民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那激奋人心的声音又一次在人们耳畔回响:“同志们: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条是眼巴巴地等着饿死;一条是散伙回家不干革命;还有一条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三条路应该走哪一条呢?”

讲到这里,毛泽东微微停顿了一下,又用充满希望的眼光看着大家,像是在等待大家的回答,又像在认真思索。片刻,他又坚定有力地说:“我们肩负着解放中华民族的重任,当然只能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是通向胜利的路。党中央号召边区全体军民拿起枪杆子、锄杆子、笔杆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建设边区,保卫边区,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全面‘围剿’,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毛泽东的讲话,给人们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会场上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大会之后,王震旅长率领三五九旅,浩浩荡荡地开往南泥湾,举世闻名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了!官兵们两个月就开荒 720 多万亩,人均达到 60 亩。

金色的秋天带着累累硕果来到了南泥湾。只见谷子、糜子漫山遍野、随风荡漾;西红柿、大萝卜、大南瓜长满了山冈;一排排整齐的窑洞依山而建;



酒坊、商店、照相馆、俱乐部一应俱全……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机关的勤务人员也制定了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毛泽东因工作繁忙，便让后勤部门在他住处附近给自己分一块荒地。大家劝他说：“主席工作很忙，不一定参加生产啦。”

“不行！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参加生产。”毛泽东一口回绝了对他的照顾，后勤部门只好给毛泽东分了一亩地。下午，毛泽东便在休息时拿锄头挖起地来。几个警卫员、勤务员忙跑来和他一起挖。毛泽东忙阻止他们说：

“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

不久后，蔬菜长出来了，毛泽东又和勤务员小王一起挖大粪施肥。杨家岭村有一个游手好闲、成天瞎逛的农民，看到毛泽东冒着烈日在地里劳动，也被感动了，提起锄头便上山开荒去了。

在延安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毛泽东总是和人民群众、普通官兵同甘苦、共患难。

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是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吃大灶，一个星期只改善一次生活，吃一次馒头。大家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身体不好，提出让大家少吃一顿馒头，让毛主席多吃点馒头，不要搞平均主义。毛泽东知道后坚决不肯，他说：“还是大家一块吃。”以后，条件好一



些了,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才跟大家分开吃饭。

在延安,从中央领导到每个炊事员,都是三年发一套棉衣,两年发一套单衣,每人每月五角零用钱。因为当时没有染料,无论是棉衣或单衣,都是用谷草灰煮成的灰色。为了节约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大家的棉衣或单衣都是补了又补,到换装时,都争着不领新的。袜子不够穿,大家就冬天穿袜子,夏天赤脚穿草鞋。

毛泽东的勤务员李晋用自己纺的纱给毛泽东织了双袜子。毛泽东舍不得穿,又让李晋纳了双布袜底,然后把布袜底缝到袜子上再穿。

陕北的冬天,寒风刺骨,不戴帽子是万万不行的。在大生产运动中,部队官兵自己动手,赶做了一批毡帽。在那种条件下,原料不好,做工又差,做出来的毡帽帽壳平塌塌的,帽檐往下吊,样子不好看,没有人愿意戴它。

有一天,警卫员从外面拿回来一顶这种帽子,把大家的意见也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接过毡帽看了看,笑着说:“这帽子不错呀,没人戴我戴。”说着就把帽子戴到自己头上,还故意到院子里走了一圈,惹得大伙都笑了。以后,毛泽东外出开会、做报告,就常常戴着这顶毡帽去。

在延安,中央领导没有小车坐,到哪儿都是骑



着马去。后来，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汽车，大家想，这下主席外出活动可有小车坐了。谁知道分配小车时，毛泽东提出：“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较大的同志。”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辆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德总司令使用，一辆给了延安的“五老”（即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使用，毛泽东仍然骑马。有一次，毛泽东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毛泽东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也肿得老高。这时，朱德和“五老”定要把车让给毛泽东坐，甚至让司机把车开到他的跟前，毛泽东还是拒绝乘车，并且风趣地说：“胳膊有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说完，照样坚持步行开会。

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备团直属警卫队的警卫员张思德在烧炭时不幸牺牲。毛泽东得知后十分难过，亲自指示警卫团把张思德的遗体擦洗得干干净净，换上新衣服，又买了一口好棺材。

9月8日，延安枣园的操场上，秋风阵阵，气氛凝重，毛泽东亲自题写的“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格外醒目。中央警卫团和党中央机关的部分同志共一千多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这里为张思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站在一个土墩上，用沉重的语调做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高度评价了张思德这位普通士



兵的一生,为世人留下至理名言:“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从1942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基本上肃清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帮助全党进一步树立了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作风,使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思想基础。

1945年春天,各个战场捷报频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91万人,民兵有220万人,19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接近1亿。在欧洲战场上,1945年5月8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乘胜不断向日本本土进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在这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同年4月,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七大拉开了序幕。此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共产党,参加会议的代表是从120万党员中推



选出来的。代表们坐在木制的长凳上,前面摆着一排绿色花木,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大厅两侧的墙边插着 24 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时起走过的战斗历程,插放红旗的“V”形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当 547 名正式代表和 208 名候补代表带着 120 万党员的重托走入会场后,全场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并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在随后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经过历史的选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七大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是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并不单指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而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过去,由于苏联共产党的影响,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党在革命斗争中、工作中吃过不少苦头,走过不少弯



路,也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现在,全党都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在中共七大的闭幕式上,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眼睛里闪耀着夺目的光芒。他这时的心情,也许只有那些同他一起经历了艰苦探索和卓绝斗争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毛泽东在闭幕词中,以他那洪亮的声音,向全党发出号召 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21. 重庆谈判

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过去了。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甚至比毛泽东原来预想的还要快。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百万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歼灭了日本关东军。同一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解放区军民对日大反攻。惊人的喜讯迅速地在延安传开了,从这座山传到那座山,从这个窑洞传到那个窑洞。每座山上都点起了篝火。兴奋的年轻人把木衣箱、旧皮鞋和草鞋都一古脑儿扔到火里,高兴得手舞足蹈,嘴里忘情地叫喊着:“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跟你们这些旧东西再见啦!”8月10日至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开始大反攻,如果日伪军不投降,就坚决予以消灭。

在中国抗日军队和苏联红军的沉重打击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在8月14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是的,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艰苦卓绝的战争。这场战争结束了中国百年来任人宰割任人凌辱的历史,四万万中华儿女怎能不为这个伟大胜利而高兴呢?

然而,这时坐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在兴奋之际,却独有一种异常的冷静。透过人们欢庆胜利的花环,他清醒地看到了笼罩在中国上空的乌云:蒋介石正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屠刀指向中国共产党。

这时,毛泽东的工作更忙了。他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用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当办公桌,上面摆上笔墨纸砚,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饿了就啃几口干粮;困了,就站起来踱踱步再继续工作。他一会儿伏案疾书,一会儿转过身来,和前来汇报工作的各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交谈。

这时的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他还需要一段时间做军事和舆论上的准备。于是,他便一边调兵遣将,做好打内战的准备,一边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断定毛泽东是不会去的,到那时候,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谈,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人身上。



对此,延安各界普遍认为:这是蒋介石的欺骗伎俩,千万不能上他的当。但毛泽东认为,为争取和平建国、戳穿蒋介石的“和平”伪装,在这个时刻,不能退却,必须将计就计,毅然决定亲自偕周恩来、王若飞^①等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消息传开后,引起延安各界的震动,许多人痛哭流涕,向党中央请求,决不能让毛泽东冒特大风去重庆。毛泽东深深地领会大家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他耐心地解释说:

“第一次蒋介石打电报邀我去重庆,我们不理他,这是针锋相对!第二次要我去重庆,我们也没理他,这也是针锋相对!蒋介石煞费苦心第三次来电了,这下他还是会认为我不去重庆的。如果我这次不去,那就会受他的骗,中他的计。因为如果我还是不去重庆,他就会欺骗人民,说三次电请都不去重庆,这是共产党不要和平,要打内战……”前来劝说的人们被毛泽东深刻的洞察力说服了。

一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

“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

^① 王若飞,贵州安顺人,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6年4月因飞机失事遇难。



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37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飞机徐徐降落，早在机场上翘首企盼的人们立即把目光投向舱门，只见身材魁梧、身穿灰布衣的毛泽东出现在机舱口，正在向热烈欢迎的重庆各界人士挥手致意。

“看，毛泽东来啦！毛泽东来啦！”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毛泽东健步走下舷梯。中外记者蜂拥而上，一下子把毛泽东包围起来，周恩来连忙上前招呼，向他们散发毛泽东的书面谈话，这才使毛泽东得以脱身，与各界人士握手交谈。

毛泽东亲临重庆出席和谈，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听说毛泽东已经到达重庆机场，蒋介石才发觉自己一点准备工作都没做，这才赶紧召集会议，讨论应急对策。国民党制造的“共产党不要和平”的谣言，一下子就被戳破了。

这天晚上，蒋介石在他的住处设宴，欢迎毛泽东。当两个人的酒杯碰到一起时，他们都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自1927年那次血腥的屠杀之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所不同的是：当年蒋介石面对的是一位手无寸铁的年轻共产党人毛润之，而现在站在他



面前的,已是一位领导着 1 亿人口和 120 万军队的共产党领袖。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毛泽东在重庆停留了 43 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三天住在蒋介石的山洞林园外,其他时间大都住在地处郊区的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在一起。他白天到城里会客、谈判,晚上回来后,首先是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摸国民党代表的动向,把握谈判的发展趋势,制定有关的政策。回到自己房间后,他还要通览当天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还要看当地发行的其他各家报纸,以便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应,掌握时局的脉搏。

从 8 月 30 日到 10 月 8 日,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会谈四次,其余的具体谈判,是由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的。

正如毛泽东事先预料的,谈判中,争执最激烈的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谈判持续近一个月,仍处于僵持状态。国民党不顾现实,妄图利用高压手段达到目的,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相反,中共更加广泛地赢得了人心。国民党方面感到高压已无济于事,谈判破裂或无结果都难以向国内外交待。与



此同时,进犯上党解放区的3.5万军队被我全歼,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无可奈何地缓和了态度。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签字后,毛泽东从二楼下来,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晚,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会谈。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之前解决。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除了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广泛接触。他来到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了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张澜担心地对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一点信义!”毛泽东说:“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不是很有价值了吗?”张澜感叹地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回心转意,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

毛泽东还拜访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朋友柳亚子。并应他的要求,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这首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立刻在重庆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人们从这首词中



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毛泽东。看到了他不仅有统领雄兵百万的元戎之气,还有儒雅温恭的飘洒气派和文人气质。传说中的“匪首”毛泽东,原来还有这样的文采!经新闻界这样一“炒”,倒把国民党报纸多年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诋毁宣传“炒”得翻了个个儿。毛泽东以他的文人气质,折服了大后方的人们,对那些在国共之间持观望心态的文化人,尤其具有影响力。据说,国民党宣传部门本想弄出一首盖过《沁园春·雪》的词,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来发表,可惜策划半天,最终还是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只好不了了之。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偕王若飞乘一架运输机飞回延安,而他作于1936年2月的那首气势磅礴、气象万千的千古绝唱《沁园春·雪》,却永远留在了大后方人们的心中: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2. 李德胜的脾气

就在《双十协定》签订 8 个月之后,1946 年 6 月 30 日起,经过精心准备的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协定”,动用其正规军约 160 万人的兵力,向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原、华东、华北和东北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一场新的大规模内战终于爆发了!

且看当时双方力量的对比 美国人帮助蒋介石装备了 45 个美式机械化师,训练各类军事人员 15 万人,给予国民党作战飞机 936 架,舰艇 131 艘。此外,蒋介石集团从投降的日军手中接收了 100 万人的装备,还得到大量的经济援助,总兵力达 430 万人。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只有“小米加步枪”,总兵力仅 127 万人,在军事、经济、交通、地理和人口等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

面对蒋介石集团的猖狂进攻,特别是面对美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有些人害怕了。有人甚至说,如果中国和握有原子弹的美国打起来,中华民



族有被毁灭的危险。

对此,8月6日下午3时,在杨家岭窑洞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旁,身穿蓝布衣服的毛泽东对前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侃侃而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决定战争胜利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最后又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告诉斯特朗: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从毛泽东那坚毅的神情里,斯特朗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果然,不到一年,我解放军就消灭了蒋介石的军队71万余人,活捉了100多名将官。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失败了。蒋介石不得不收缩兵力,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1947年3月,他急调胡宗南23万兵力向革命圣地延安和陕北扑去,妄图吃掉中共留下的保卫党中央的2



万军队,进而把延安的中共首脑机关一举摧毁。

蒋介石首先调集他全部空军的五分之三,飞到延安上空来了。远远望去,那黑乎乎的一大片,好似一群乌鸦在盘旋,把阳光都遮住了,在延安上空乱撞,轮番地狂轰滥炸,真想用炸弹把这块土地犁平了。

在飞机的掩护下,胡宗南^① 指挥他的人马,开着坦克、大炮和汽车,浩浩荡荡,猛扑过来。

而此刻,在离敌人不远的延安王家坪的一孔窑洞里,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② 五大书记正在镇静自若地开会。突然一声近处的爆炸过后,窑洞顶壁上的土哗哗掉落下来。原来,弹片把院子里一棵大树的树皮都给炸掉了。警卫员拿着拣回的弹片让毛泽东看,劝他赶快撤离延安。毛泽东接过弹片,微笑着说:“嗨,这钢不错嘛,正好打两把菜刀用用!”

面对敌机的不断轰炸,大家一致劝说毛泽东向石洞内转移。毛泽东说:“莫要慌吗,他扔他的炸弹,我办我的公!”照样不买账。

3月16日中午,两颗重磅炸弹在王家坪毛泽

^① 胡宗南,蒋介石嫡系。1947年率部进犯陕甘宁边区,遭到人民解放军痛击。

^② 任弼时,湖南湘阴人。曾任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50年病逝。



东的窑洞前爆炸，但洞内却异常平静。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边看地图边问：“客人走了吗？”

“谁来了？”警卫参谋贺清华不知哪来的客人，疑惑地问道。

毛泽东用笔指指上方：“飞机呀！”大家这才恍然大悟。毛泽东就是这样，越是在危险的情况下，他越是镇定自若。

这天傍晚，毛泽东还把刚调到延安的新四旅的指挥员找到自己在王家坪的住处，谈了他的制敌方法。他说：“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敌人差些，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他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

为了确保安全，他们请求毛泽东尽快转移到黄河东边去。

“感谢大家的关心，不过，我还是要留在陕北。”毛泽东面露自信的微笑，“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过着和平的生活，现在有了战争，我们就离开陕北，这怎能对得起老百姓呢？因此，我决定和陕北人民在一道，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第二，我之所以暂不离



开陕北,还因为胡宗南有 20 万人马,而我们仅 2 万人马,敌我力量对比这么悬殊,比其他战场要危险得多,作为军事负责人,我怎能不留在陕北呢?现在,几个解放区刚夺得主动权,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会在这里多下些‘本钱’,其他战场就可以轻松一点。这样,咱们负担虽然重些,但如能把敌人牵住,最后还要消灭他,这不是很划算吗?”

18 日,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上疏散完毕,延安城里已能听到清晰的枪炮声,但毛泽东仍在王家坪的窑洞里工作。枪炮声越来越近了,警卫员劝毛泽东早些走,毛泽东说:“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哩!”

就这样,毛泽东一直工作到黄昏,才在大家的劝说下走出窑洞,走下山坡。回头望望居住了十多年的延安城和巍峨的宝塔山,他带着依依不舍的神情说:“延安是我们的,不久我们还会回来的!”随即上了那辆早在抗战初期,由马来西亚华侨赠送的救护车,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

3 月 19 日,胡宗南的部队在几十架飞机的掩护下,心惊胆颤地进了延安城,而蒋介石则得意地飞到这里,为胡宗南开了个隆重的庆功会。他狂妄地预言:再有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把毛泽东的军队彻底消灭。哪知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后,采取“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十倍的胡宗南军队从容



周旋，三战三捷，歼灭敌人一万四千多人，把这个“西北王”拖得筋疲力尽，也把蒋介石的牛皮戳得稀巴烂。

在这期间，为防止意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把党中央“一分为三”：第一部分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转战陕北；第二部分由刘少奇、朱德率领，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省平山县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第三部分以叶剑英为首，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活动。

毛泽东化名“李德胜”，表示离开延安，解放战争必得胜利的意思。他有时是骑着那匹大青马，有时拄着一根竹竿步行，在山沟里与敌人周旋，指挥着一场上千万人参加的战争。

这一带古时被称为“秦塞”。骑着战马、站在黄土高原的毛泽东神采飞扬，迎风而立。举目远眺，塞外风光，尽收眼底。望着那连绵的关山和高耸的烽火台，他突然又找到了唐代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感觉。“马背诗人”的诗情在停歇了十年之后，又一次喷涌而出，他随口吟咏了一首《五律·张冠道中》：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
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



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战争的生活是艰辛的。转战陕北期间的毛泽东平时吃的是小米、萝卜和白菜，有几天断了粮，只得喝面粉和榆树叶熬的稀粥度日。毛泽东显得十分消瘦，体重也明显地下降了。但是，战场上的奇迹却屡屡出现。

1947年8月18日，胡宗南的得力干将刘戡的7个旅“咬”住中央机关的几百人不放，一直追到黄河边上。

听着敌人的枪声在耳边响起，毛泽东却不予理睬，还悠然自得地唱了几句京剧《空城计》。休息之后，毛泽东又带领中央机关朝白龙庙的山上走去。任弼时急忙吩咐后面的部队把上山的痕迹擦掉，以免被敌人发现。

“不用擦！就在这里树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毛泽东听了，出人意料地说道。

“还是擦掉吧，敌人追上来就麻烦了！”同志们劝道。

这下毛泽东发了脾气：“有什么麻烦？给我竖，我看他刘戡到底有多大本事。”过了一会儿，山下响起了枪声，毛泽东问：“是刘戡来了吗？”又索性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仿佛真要看看刘戡是个什么样子，直到弄清是对岸民兵打的枪，毛泽东这才站起



身来继续往前走。

半夜时分，部队来到半山腰，摸黑进入一个小村子宿营，天下起雨来。

就这样，在潇潇秋雨中，毛泽东进入了梦乡，而此时，刘戡的几万追兵也在山下不远处安歇下来……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中最惊险的一幕，要算是1947年8月的一天，在葭（jiā）芦河边突围了。

那是一个暴风骤雨的天气。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的几百人来到曹庄，一直跟着毛泽东转又接连扑空的刘戡，气急败坏，率七个旅从北路、南路、西路，像饿狼般包抄过来。担任直属司令部司令的任弼时见这里距东面的黄河只有十几里路，便对毛泽东说：“看来我们只有向东去了。”

“我决不过黄河！”毛泽东不听劝告。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脾气，他灵机一动，说：“前面就是葭芦河，等过了这条河再说吧。”

冒着连夜的暴雨，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葭芦河边。哪知在试渡时，由于水流湍急，十几名战士连人带羊皮筏子转眼便被浪涛吞没。这时，敌人已经追了过来。几名战士应声倒在敌人的枪口下。

情况紧急，危在旦夕！人们的目光一起投向毛泽东的身上。

“老侯，给我拿支烟来！”毛泽东伸出两个指头，轻声说道。马夫侯登科立刻从小油布包里掏出一





支烟，避开风雨，为毛泽东点上火。

毛泽东站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吸着烟。顷刻，他那“李德胜”的犟脾气又上来了。他扔掉烟头，果断地说：“决不过黄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怕邪！”

说罢，毛泽东迎着风雨，踏着泥水，带着几百人的队伍，沿河堤向前走去。

面对毛泽东的异常举动，敌人吓得目瞪口呆：枪声奇迹般停了下来，一个个呆呆地看着毛泽东一行人从河堤上走了过去。直到毛泽东走远了，才放了几声冷枪，也许是给他们自己壮胆吧。

就这样，毛泽东用他那政治家的胸怀和军事家的智慧，牵着敌人在陕北转了一年的圈圈。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行程一千多公里，住过 12 个县的 38 个村庄，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垮，为中国革命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8 年 3 月 23 日中午，毛泽东戴着一顶半旧的棉帽，坐在一条颠簸的小船上渡过了黄河，进入了晋绥解放区。有趣的是，他骑的那匹大青马在渡河时，却突然从渡船上跳入黄河往回游。连战马也留恋这十三年征战的陕北故土啊！经过半小时紧张搏斗，木船渡过了黄河。毛泽东大步登上河岸，回头望着波涛翻涌的河水，他的眼睛湿润了，心里默默地念着“再见了，陕北，等解放了全中国，我们还会回来的！”



23. 江山再造

东渡黄河之后,毛泽东一行风尘仆仆,日夜兼程,在风雪中翻越五台山,由山西进入河北,于4月13日来到了晋察冀边区政府与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县的城南庄。这里位于县城南面30多里,东距保定约300里。周围峰峦层叠,山高谷狭,城南庄就坐落在胭脂河北岸。毛泽东在聂荣臻司令员原来住的两间房子里,一住就是35天。

5月18日,有一架国民党的飞机突然飞到城南庄的上空盘旋,不久,又有两架轰炸机飞来。

聂荣臻急忙向毛泽东住的房间走去。看见通宵工作后的毛泽东正穿着蓝条毛巾睡衣躺在床上休息,聂荣臻用低沉而又急切的声音对毛泽东说:

“主席,敌人飞机来轰炸,请你快进防空洞!”

毛泽东若无其事地坐起身来,以风趣的口吻说:“运输大队长(指蒋介石)又来投下点钢铁好嘛,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用!”

事不宜迟,聂荣臻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把担



架抬过来，不容分说，把毛泽东扶上担架就走，一路小跑奔向后面的防空洞。刚刚进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驻地的小院附近浓烟四起，其中一枚正好落在毛泽东所住的院子里爆炸了。毛泽东住的那两间小房子，门窗的玻璃都被震碎，一些鸡蛋也被弹片炸得稀烂。见此情景，聂荣臻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如果不是躲得快，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看来，敌人已经获得毛泽东住处的情报^①。当晚，毛泽东便转移到二十多里外的花山村。九天之后，毛泽东一行平安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西柏坡位于河北平山县境内，是个七八十户的小村，坐落在滹沱河北岸一个向阳的马蹄形山弯里。村子虽不靠大道，却有一条平坦宽敞的路，绕过柏树坡的山脚，跟大道相连。房舍不是集中为一大片，而是建在田边、坡脚，拉成一长溜儿，掩映在茂密的树阴之下，是个环境幽雅、风景秀美的地方，又不惹人注意，即使走漏了风声，敌人要空袭，也难以找到目标。从军事上看，它正处在大山与平原的交界处，能攻能守，向前可以通向全国各大城市，向后可以固守巍峨的太行山，在这决定国家命运的关

^① 后来，在保定解放之后，从敌伪档案中查明，敌人是通过打入我内部的特务获得情报的。



键时刻,选择这里作为党中央最后决战的指挥部太合适了。

进入村子,可以看到几棵苍翠的古柏长在半山坡上,坡前是一块广阔而肥沃的农田,坡脚有一溜儿石灰砸顶的土坯房子,房前打一圈墙,便是中央局大院。毛泽东住在大院的东头,跟周恩来、任弼时是邻居。在这里,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统观全局,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将要跨入一个新阶段,与蒋介石大决战的时刻到来了!他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里,日以继夜地工作着,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

根据毛泽东、党中央在西柏坡做出的先解放东北、再回头解放华北的战略决策,我东北野战军于1948年9月12日打响了辽沈战役。从10月15日至19日,东北野战军解放了锦州、长春,东北战场势如破竹。

1948年10月19日下午,蒋介石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策划辽西决战之后,向所谓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面授“出奇制胜”的“良策”,乘中共总部兵力空虚,出动十万人马,于10月28日直取石家庄和西柏坡,“端掉共党的老窝,把毛匪和共党总部消灭,这样就可以很好地配合辽西兵团收复锦州”。

10月23日晚,打入北平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时平,将这一紧急军情报告地下党组织。



10月25日,华北军区司令部的急电发到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立即召集军委领导商量对策,当即决定就近抽调一部分主力迎击敌人。

部署完毕,毛泽东习惯地点上一支烟,猛吸了一口,脑子里在急速地盘算着。到敌人28日拂晓发起总攻仅有3天时间了,我军增援部队距各作战地点都很远,决不能让敌人抢先来到我们家门口。想到这里,他灵机一动,对大家说:

“我的意见,我们也来学学诸葛亮,给蒋介石和傅作义唱段空城计。通过新华社,把他们的阴谋作公开的揭露,告诉他们,我华北军民已作好一切准备。晓得了这些,我看他们还敢不敢轻举妄动?还要告诉他们,北平已是一个空城,他们如果不想要北平的话,就大胆地来吧!”

听了毛泽东的主意,大家连称好计,一致赞同这个对策。于是,周恩来以军委名义向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华北一兵团徐向前和二兵团杨得志及地方部队下达紧急命令,一场粉碎蒋、傅偷袭西柏坡的大战开始了。

当晚,毛泽东握起毛笔,迅速起草一份新闻稿,叫警卫员立即送新华社。然后,他伸了一下懒腰上了床,很快便进入梦乡。

蒋介石听到这个广播,果然十分震惊。他本来是要出其不意偷袭的,没想到刚刚准备动窝就被共



军知道了,而且知道得这么详细。他暴跳如雷,把傅作义骂了个狗血喷头。傅作义也感到莫名其妙,只好向委员长保证 迅速追查,严加惩处。

敌人听到广播后,顿时阵脚大乱。蒋、傅的精锐兵团摸不准我军的底细,不敢贸然挺进,我军乘机跑到敌人前面,造成了阻击和南北夹击之势。

10月31日,广播里又传来了毛泽东写的另一篇文章:“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你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在这凌厉的新闻攻势面前,已经出动的国民党北平、太原两路大军心惊胆颤、军心涣散。

蒋介石见偷袭不成,只好气急败坏地下达撤退的命令。巴不得早些退兵的偷袭部队连滚带爬,日夜兼程,退回到北平老窝。

这时,蒋介石收到准确的情报:冀西平山县驻有中共首脑机关,而且确无重兵!

当蒋介石为是否重新出兵而犹豫不决的时候,新的情报又送到案头:大批共军已开至保定石家庄沿线。时间恰在他们刚刚撤兵之后。蒋介石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

三个月之后,毛泽东亲自部署和指挥的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都已结束,天津也已解放,在长江以北辽阔的土地上,蒋介石只剩下北平这座孤城了。



百万解放大军把北平团团围住，只待攻城的命令一下，就会万炮齐发。

而在此刻，守卫北平城的华北剿共总司令傅作义，却带着他的几名心腹，悄悄地来到了共产党的首脑机关、解放大军的总指挥部西柏坡，要求亲自拜见仰慕的敌人——毛泽东。通过对共产党多年的了解，又通过作为地下党的女儿傅冬梅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他已下定决心，向共产党交出自己率领的40万大军，也交出这座完整的北平古城，决不做为世人唾弃的千古罪人。不过，傅作义虽然接受了和谈条件，但他心里仍然有些不踏实。在和谈条件已经在执行又尚未全部执行之时，他向共产党提出了这个要求，很快得到答复。

听说傅作义来见，毛泽东穿一身灰色的棉布制服，没戴帽子，脚穿一双圆口布鞋，向傅作义走来。

傅作义慌忙向前迈了几步，向毛泽东行了个军礼。毛泽东随即赶上前来，跟傅作义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傅作义双手和双腿都有些颤抖，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有罪！”

“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嘛，让北平城内百万居民免受战争之灾，让千年古城得以完整保存，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毛泽东爽快地回答道，并设身处地地替傅作义考虑，关切地问道：

“不知傅将军下一步有何打算？我们热忱地欢



迎你留下来,但如愿回到蒋先生那里,或者到国外去,我们也会给予方便和协助的。”傅作义听后,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

就这样,在毛泽东的部署下,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就浩浩荡荡进入了北平,迎接他们的是欢快的锣鼓,激情的秧歌和挂满泪花的人群。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北平,住进西郊香山的一个中西合璧的院子。院内古木参天,银杏婆娑,因有两股清泉从石缝里流出来,故称“双清别墅”。

一住进双清别墅,毛泽东就开始筹划渡江战役了。

4月21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毛泽东立即于当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00万解放军,在东西数百里波浪滔滔的江面上,张帆摇橹,开动了两万多艘船只,迎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向南岸驶去。

渡江成功的消息传来,毛泽东禁不住高兴地对周恩来和朱德说:“想当年,曹操动用83万人马攻打东吴。如今,我们调动的是200万人马,气势比曹操大得多哪!”

4月23日,渡江大军占领南京,总统府屋顶上那杆飘了多少年的青天白日旗,在解放军官兵的欢呼声中被扯了下来。



这天下午,毛泽东坐在双清别墅内走廊下的木椅上,左手拿着一份印有特大字号“南京解放”标题的报纸号外,正低头仔细地看。这位“马背诗人”的诗兴诗情突然间迸发了,于是,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篇从他的笔端奔涌而下: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随着解放战争一步步走向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已成为人们的共同要求,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毛泽东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前推进的同时,广泛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

为了工作上的方便,6月15日,毛泽东从香山双清别墅移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丰泽园后靠中海,正对南海,西邻静谷,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座建筑。丰泽园里的一个四合院叫菊香书屋,早先是清朝皇宫藏书的地方。院子里有老槐苍柏,鸟雀盘绕其间。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地方,一住就是17年。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1949年9月21日下



午七时,毛泽东健步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5分钟之久。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9月30日,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人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还决定北平改名为北京,以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会议还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当夜幕将要降临的时候,毛泽东和政协全体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并朗声宣读他亲自撰写的碑文。这一夜,毛泽东又是彻夜未眠。

第二天是10月1日。下午,毛泽东换上那身临时赶制的黄呢子衣服,乘车来到天安门城楼背后。然后,大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30万各界群众早已经高举着红旗、标语,敲锣打鼓汇集到了天安门广场,等候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下午 3 点钟,毛泽东来到麦克风前,运了口气,一字一顿地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顿时,广场上 30 万人掌声如潮。接着,毛泽东亲自按动控制广场中央国旗升降的按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顷刻间,广场上礼炮齐鸣、欢声雷动。54 门礼炮齐鸣 28 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流血牺牲而取得胜利的 28 个年头。今天,新中国终于以独立的主权国家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隆隆”的礼炮声向世界宣告:旧中国死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怎能不热泪盈眶、欢喜若狂呢?



24. 初访莫斯科

就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后仅两个多小时,中国政府就收到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

紧接着,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用最快的速度拍来贺电……

毛泽东收到苏联贺电,坐在沙发上,点燃一支烟,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感谢斯大林、苏联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关键时刻给予中国的支持,他认为,亲自出访苏联与斯大林会晤的时机成熟了。毛泽东的脑海里不禁回忆起他与斯大林的交往经历。

那是在1942年6月,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刻,斯大林派飞机送医务人员来到延安,并给毛泽东带来一封信和10件皮大衣、10双长筒皮靴、



10条毛毯。另外还有几双矮腰皮靴和几箱纸烟。毛泽东向苏联客人询问了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对他们来中国表示欢迎。在送走客人后,他只留下一箱纸烟和一双矮腰皮靴,其余的都分给其他同志了。

第二天,客人要回去了,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回信,并让人缝了个小布袋,装上些他亲自种的红辣椒。他微笑着说:“延安这里,没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送这点礼品,表示我们的谢意吧。”这袋红辣椒和信便由机组同志转到了斯大林手中。虽然不知道斯大林对这袋红辣椒是什么态度,但毛泽东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到新中国诞生之前这段时间内,斯大林对自己是了解不深的。这位大元帅一直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直到蒋介石最后完全冷淡了苏联而全力转向美国后,斯大林才开始意识到这个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在未来中国的重要地位。他多次对身边的人说:“这位毛泽东从来没有到过苏联,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大都到过苏联,毛泽东可算是例外了。其实早在一年多以前,毛泽东就有了亲自出访苏联的想法,他想同斯大林直接交换一下对中国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等方面的意见。这个出访意愿却被斯大林婉转地回绝了。



直到1949年1月31日,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又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作为全权代表,秘密来到西柏坡。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米高扬并没有表明什么态度,说是只带了耳朵来,回去向斯大林汇报,就这么离开了中国。对此,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这是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人缺乏信心的表现。毛泽东以博大的胸怀对斯大林的做法表示理解。并有力地挥动着手臂对他的战友们说:“我们要从大局出发对待斯大林的错误干预,更重要的是以实际行动让人家看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彻底推翻蒋家王朝,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现在,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况且可以参加12月21日斯大林70岁诞辰祝寿活动,并签订有关条约、协定。

1949年12月6日,古老的京城,雪后初晴,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人们欢庆的笑脸,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息。毛泽东将在今天,亲自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从北京出发,登上前往苏联的专列去与斯大林会晤。

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他率领的新中国第一个赴外国访问的代表团,毛泽东显得格外高兴。他身着一套灰色的中山服,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与前来送行的人们一一握手告



别。而后,大步登上专列。汽笛一声长鸣,专列载着毛泽东和他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向东北方向呼啸而去。

12月9日到达满洲里后,换乘苏联的宽轨火车向莫斯科驶去。

经过一周的旅途,火车于12月16日正点开进银装素裹的莫斯科,时针正指向12点。

车站广场上,手持鲜花的男女青年欢呼雀跃;月台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等高级领导人在寒风中热情地迎候毛泽东的到来。由于天气寒冷,怕毛泽东吃不消,欢迎仪式十分简短,毛泽东匆匆检阅了仪仗队,便乘车前往下榻处——莫斯科郊外斯大林战时的住所。

当天下午6时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毛泽东。

毛泽东跨进大门,斯大林便微笑着迎上前去,伸出双手与毛泽东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斯大林惊喜地端详着毛泽东那高大的身材,动情地说:“我们欢迎你的到来,真想不到你是这样年轻,这样健康。”斯大林随即把全体政治局成员向毛泽东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也向斯大林通报了中方随行人员的情况。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桌两边坐下来之后,斯大林微笑地望着毛泽东红润的脸庞,又禁不住赞叹



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真诚地祝你健康。”

“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没处说……”

“不不不——”没等毛泽东说完，斯大林接过话茬，连声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此刻，他也许想到了过去对毛泽东将信将疑、对中国共产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策表示反对的往事。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听了斯大林的话，毛泽东会意地笑了。

会谈转入正题，斯大林习惯地捏着烟斗吸了一口，认真地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我们衷心地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今后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代表中国人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毛泽东诚恳的话语和儒雅的风度吸引了苏联领导人，他们把目光一起投向毛泽东，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

而此刻，斯大林最关心的还是中苏结盟的问题。他取下嘴上的烟斗问：“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回答斯大林的问话,只是说:“我想请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一趟。”

其实,这是中央政治局关于毛泽东此行的决定。给斯大林祝寿后,毛泽东在苏联休息,条约的谈判则由周恩来随后去办。

12月21日,装饰一新的莫斯科大剧院,华灯四射,金碧辉煌,斯大林70大寿庆祝大会正在这里隆重举行。各兄弟党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毛泽东就坐在斯大林的身边。在13个到会的国家中,毛泽东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词,在他300余字的致词过程中,全场三次起立长时间鼓掌。人们对于这位新中国的领袖表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

在莫斯科期间,为了调剂生活,毛泽东看了几十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等。斯大林得知后赞扬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苏方还安排毛泽东参观了列宁格勒。毛泽东到了波罗的海的芬兰湾时,大海和陆地已被冰连在一起。他站在冰上举目远眺,心潮起伏,似乎又触发了诗人的灵感。他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我要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

周恩来从国内赶到莫斯科,按毛泽东的要求,加紧了和苏联方面的谈判。



转眼到了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代表苏联、周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在条约上签了字。

有趣的是,在签字仪式上,斯大林和毛泽东站在一起,比毛泽东矮些。照相时,他向前移动了一下,在照片上就显得和毛泽东一样高了。

1950 年 3 月 14 日晚,毛泽东回到了北京,结束了他这次卓有成效的首次出访。



25. 与美国人叫板

就在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半年之后，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又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美国总统杜鲁门却宣布派兵到朝鲜，并派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为逃亡到台湾的蒋介石打气撑腰，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1950年9月15日，美国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由美国驻远东部队的总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总司令，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动大批飞机和舰艇，在朝鲜仁川登陆，并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警告，悍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我国东北部分地区遭到轰炸，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支援。

面对强敌，我们该不该出兵？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经济恢复刚刚开始，20多年战争的创伤尚待养息，财政状况还很困难，新区土改还没



有进行,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我们再也经不起战争的折腾了。”

“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还相当落后,海、空军更处于初建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去跟握有原子弹的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较量,谈何容易?”

“如果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经济建设能不能进行?”

从大家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出兵的不利因素很多,这的确是一个非同一般的问题。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听了大家的发言,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

到底应该怎么办?会议之后,在丰泽园的菊香书屋里,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不停地吸烟喝茶,浓浓的烟雾弥漫在整个房间。几十年来,同帝国主义抗争的历程一幕幕在毛泽东脑海里闪现。

抗战胜利后,有个美国人对毛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美国人的话,否则美国人会骂你们的,会给蒋介石撑腰。毛泽东则无所畏惧,毅然决然地答复说:“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果然,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就把



蒋介石集团赶到了台湾。

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同入侵中国长江的英国“紫石英号”等4艘军舰发生武装冲突，“紫石英号”被我军击中搁浅在镇江江面，其余三艘逃走。事后，英国政府竟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甚至主张派出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进行武力报复。对此，毛泽东毫不相让，严正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在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面前，英帝国主义退缩了，再也不敢动手动脚了。

几十年的斗争实践，使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说它是真老虎，是因为它总是要吃人的；说它是纸老虎，因为从本质上看，从长远的观点看，真正强大的，不是反动派，而是人民。对于吃人的老虎，向它让步的结果，只会助长它的淫威。它既要来侵略，我们就要反侵略，不同帝国主义见一下高低，我们要和平建设也是困难的。与以前相比，我们现在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同时，为本国建设前途着想，也应该出兵。

想到这里，毛泽东下定决心与美国人叫板，在朝鲜战场上比高低。他把手中的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用沉重的声音喃喃地说道：“看来只



好横下一条心,打完这一仗再说了。”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召集中央五常委和彭德怀、彭真、林彪、高岗等来到他的住处讨论,从6点钟一直研究到12点。

会上,在其他同志发言后,匆匆从西北赶来的“彭大将军”彭德怀说:“出兵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可以找到借口。”会议做出了出兵决定,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选定由英勇善战的彭德怀挂帅出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国政府也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决定。

中共中央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发表宣言,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号召。身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又是几天几夜睡不好觉,他密切注视着前线的战事,以便随时作出部署。而这时,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也坐不住了,他作为毛泽东钟爱的儿子,从小吃过不少苦,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曾任红军中尉,建国后,在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在父亲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之后,他毅然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递交了要求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请求赴朝参战。

彭德怀没有同意,他便去中南海找父亲。

“好哇!你去朝鲜,可以在战火中经受考验嘛。”面对儿子的请求,毛泽东十分爽快地答应下



来。他十分爱岸英这个有志气的孩子,但决不给他特权。在从苏联留学回来后的5年中,毛泽东曾送他去农村种地,参加土改,现在又在工厂里接受锻炼。毛泽东深深知道送儿子上战场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儿子的这个举动在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美援朝中的分量。他想,如果岸英的妈妈开慧活着的话,也会支持儿子的行动的。

听说毛泽东要送儿子出国参战,有人劝阻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责任很重,不要去参战了,在后方同样可以支援前线嘛!”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了。

就这样,毛岸英匆匆告别了新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刘思齐,于1950年10月19日,也正是麦克阿瑟指挥侵略军占领朝鲜的同一天,随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在志愿军总部担任机要秘书和翻译。

我军入朝后,第一次战役便打了一个大胜仗,一下子歼敌1.5万人,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11月25日,美国侵略军和南朝鲜李承晚军队开始报复,第二次战役打响了。不甘失败的麦克阿瑟声称,他心爱的第八集团军和阿尔蒙德的第十军,将像一把铁钳子一举把敌人围歼,他许诺在圣诞节前一定结束战争。



当日上午 11 时,3 架敌机掠过我志愿军总部上空。防空警报一解除,毛岸英便从防空洞跑到作战室投入工作。谁知刚飞去的那 3 架敌机又折回来,投下百余枚汽油弹。顿时,作战室被浓烟和烈火吞没,毛岸英和作战参谋高瑞颐壮烈牺牲在烈火中。

“唉,毛主席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我,我怎么向他交待哟!”得知毛岸英不幸牺牲的噩耗,彭德怀在朝鲜的大山里仰天一声长叹,晶莹的泪花在寒夜的星光下闪耀。

“主席,我没有保护好他,毛岸英同志牺牲了,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在不久回国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完工作之后,彭德怀向毛泽东如实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沉痛地说。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停地吸着烟,湿润的眼睛呆呆地凝望窗外,大概想起儿子岸英许许多多的往事。许久,才喃喃地说道:“革命战争哪有不死人的?岸英作为一位普通战士、共产党员,为国际共产主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是他应尽的责任。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

听了毛泽东的话,彭德怀再也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两行泪水夺眶而出。他理解毛泽东晚年失子的痛苦,他为毛泽东豁达的胸怀深深地感动了。

在这之后不久,朝鲜战场上捷报频传,毛泽东



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第二次战役共歼敌3.6万余人,把逼近鸭绿江边的侵略者打回到清川江以南,并乘胜前进,收复三八线以北。这一战役彻底砸断了麦克阿瑟的“铁钳子”,也粉碎了他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美梦。被西方捧为“战神”的麦克阿瑟终于低下了头。

1950年12月3日晚上,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与前来中国商谈朝鲜战局的金日成紧紧握手,金日成在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谢意之后说:“毛泽东主席,前些天,外电报道,杜鲁门宣布要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不知你对此有何看法?”

“这个嘛,”毛泽东轻轻掸去烟灰说,“狗急了还要跳墙,美国在朝鲜打输了,脸上无光,挥舞一下手里的原子弹,心里也许好受些。原子弹在他杜鲁门手里,他什么时候要扔,由他决定,不过,原子弹已非美国一家独有,他可以扔,别人也可以扔,这就由不得他杜鲁门喽。总之,我看杜鲁门是不会轻易放弃朝鲜的,不过我们也下了决心,他杜鲁门愿意打多久,我们就奉陪多久!”

听了毛泽东的表态,金日成满怀信心地走了,而中南海的灯光,一直与鸭绿江对岸的战火联系在一起。在这之后,毛泽东不知又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又在灯下起草了多少份指导战争的电文。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欣慰地看到,国内增产节约支持



前线的运动和其他多项工作蓬勃发展,前线、后方互相鼓励,国民经济恢复的速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加快,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又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就这样,从1950年10月25日入朝参战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经过两年零9个月的较量,终于有了结果。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10分,在朝鲜的一个小村庄——板门店,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克拉克上将,这位继麦克阿瑟、李奇微之后的第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打胜的停战条约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美国人至此似乎才明白:如果说,在世界的西方有一个不好对付的美国,那么在世界的东方,也有一个新中国更是不好惹。

会后,200多位记者,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

消息传来,毛泽东悲喜交加。两年来,他因担心刘思齐不能接受岸英牺牲的现实,用强颜欢笑的形式瞒了儿媳两年,独自承受着精神和感情上的痛苦。直到这时,毛泽东才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儿



媳,并对悲痛欲绝的儿媳说:“战争,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牺牲。岸英走了,今后,你就是我的女儿。”

当刘思齐提出将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时,毛泽东摇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

于是,在朝鲜,在平安道桧仓郡,在志愿军烈士陵园,便增修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三尺高的花岗岩石碑,碑上刻写着这样几个大字 毛岸英烈士之墓。

1959年,毛泽东拿出路费,让刘思齐和妹妹邵华(后成为毛泽东次子毛岸青的夫人)去朝鲜为岸英扫墓。以表达他对岸英和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英烈们的悼念之情。



26. 不怕邪的毛泽东

1959年9月30日,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她的十周年庆典,这一天,北京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到处都是欢歌笑语。中南海里的毛泽东虽然明白,与苏联领导人的分歧和矛盾已日益加深,但在这十年大庆的时刻,他依然向苏联发出了邀请信。

听说作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要率团来华参加庆典,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金龟子(在俄语里,“赫鲁晓夫”就是“金龟子”的意思)来了,就谈谈嘛。”接着,他用火柴点燃了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脑海里又浮现出和赫鲁晓夫两次会谈的情景。

第一次是1954年,赫鲁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并参加国庆典礼,毛泽东就苏方归还中国的旅顺和大连,移交在中国满洲(指东北)一带的铁路权利等问题,开诚布公地向赫鲁晓夫阐明了中国坚决收回主权的观点。



毛泽东就是这样,为了捍卫祖国主权和民族利益,不管对谁,不管在什么场合下,他都表现得坚决果断,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大出赫鲁晓夫的意外,当时,赫鲁晓夫还提出,希望中国派1万或更多的工人到苏联的西伯利亚去,帮助他们开发森林。

听了这个建议,毛泽东马上想起了多少年来,外国人一直把中国看作一个获得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他竭力克制住内心的愤怒之情,尽可能用一种和缓的口气说:“对不起,赫鲁晓夫同志,在我们看来,这是对几万万中国人的侮辱,没想到这话出自你的口,叫我怎么回答呢?”

赫鲁晓夫听到此话后尴尬的样子,至今还映在毛泽东的眼前。

可是,就是这个赫鲁晓夫,在1958年第二次来到北京访问时,又不知趣地提出了希望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

“赫鲁晓夫同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把中国的海岸都拿去好了。”毛泽东一听,又来了火,他不顾赫鲁晓夫的面子,没好气地说。

“假如你们愿意的话,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基地嘛。”一贯以老子党自居的赫鲁晓夫似乎还弄不清楚毛泽东发火的原因,在他看来,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而毛泽东



深知一百多年来,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所作所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屈辱和灾难,决不让外国的一兵一卒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这是不容商量的原则问题。所以,他斩钉截铁地对赫鲁晓夫说:“不要的,我们不想使用你们的基地,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里干什么!”

这次是赫鲁晓夫第三次来华。他到达北京机场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去机场迎接,并安排他下榻在钓鱼台。和上次来华时一样,赫鲁晓夫到中国的当天,双方便在颐年堂举行了会谈。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斜对面坐,两党两国的其他领导人分别坐在两边顺序排开。赫鲁晓夫历来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自居,在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面前,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但通过几次接触和较量,他对毛泽东的魄力、魅力和意志力量有所了解。特别是上次访华时,当他看到毛泽东在游泳池里,一会儿躺在水面上,一会儿直立在水中的精彩表演,一下子惊呆了 和自己套着救生圈,手脚乱刨的姿势相比,这个毛泽东,真不愧是游泳高手。当然,更让他头疼的还是谈判桌上的毛泽东。

会谈开始后,赫鲁晓夫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气势。随着话题的深入,气氛越来越紧张。



“希望你们考虑释放唐奈与费克吐两名美国飞行员。”不久前，在与美国总统会谈时，赫鲁晓夫已经许了愿，此刻，便向毛泽东表达了他的意思。

“不行。”毛泽东简短果断地回答，“这个事儿不能商量。”

“这两个人是执行入侵我领空的间谍侦察飞行任务的。”外交部长陈毅进一步补充说，“至于俘虏的其他五名飞行员，我们早已放给他们了。”

这个问题上达不到目的，赫鲁晓夫又转而以批评的口气谈到了中印边界冲突的问题。他以不屑一顾的表情说：“你们为了那么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冲突，那里有什么？那是很不值得的！”他还放肆地说道，“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走。”

“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样讲完全是错误的。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怎么能说放跑了他呢？”毛泽东挺直腰板，毫不相让。

这次会谈就这样在争吵中结束了。

第二天，北京举行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天安门广场上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头戴草帽、身穿乌克兰式衬衣，又恢复了笑容，似乎不曾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站在他身边的是身着深灰色中山服的毛泽东。望着广场上一队队走过的中国士兵，赫鲁晓夫借机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



去。”

早有思想准备的毛泽东从容答道：“需要是需要，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由你们决定。”

听了这样的回答，赫鲁晓夫无言以对。

到了晚上，毛泽东照样给了赫鲁晓夫最高的礼遇。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陪同他观看焰火。赫鲁晓夫又毫不知趣地提到建立无线电台和潜水艇基地的敏感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我最后说一次，这绝对不行的！而且我不想再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毛泽东再一次断然拒绝。

赫鲁晓夫耸耸他的双肩，两手一摊，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这时，噼噼啪啪的礼花爆炸声，夹带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在广场上空弥散开来。

赫鲁晓夫没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决定提前踏上归程。毛泽东站在机场上，目送赫鲁晓夫一行人登上飞机，升空而去。从他那严峻的目光里人们能够看出，毛泽东知道赫鲁晓夫此去意味着什么，中苏关系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对此，不信邪的毛泽东早有思想准备，并有充分的自信：中国人永远不会做任人驱使的奴隶，中国人有能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中国人决不低头。



赫鲁晓夫经 1958 年和 1959 年这两次访华,终于明白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绝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不久,中苏两党的分歧就公开化了。

6 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突然袭击,公然向各兄弟党代表团散发了苏共中央 6 月 21 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宣称列宁主义若干原则已经过时,指责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拉开了围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 1960 年 7 月 28 日到 9 月 1 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终止派遣专家。赫鲁晓夫还命令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 250 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陷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赫鲁晓夫的这种做法不要说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就是从国际法上讲也是不允许的。它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几代人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对于赫鲁晓夫的这一套伎俩,毛泽东早就预料



到了。他清楚地记得,在此之前,赫鲁晓夫曾提出:中国可以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不必自己搞。

毛泽东当然没有接受这一番“好意”,决心发展中国自己独立的核力量。1958年,在中苏科技人员的合作下,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研制工作进展顺利。

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上,以无所畏惧的革命胆魄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可没有这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正当我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全面展开的关键时刻,正当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时期。赫鲁晓夫瞅准时机卡中国的脖子,单方面撕毁了与我国在核技术研究上曾有过的协定,命令苏联专家带走了重要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赫鲁晓夫以嘲讽的口吻说:“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恐怕连裤子都穿不上。”

当此紧要关头,一贯不信邪的毛泽东听了这话,嘴角露出浅浅的一笑,以他那特有的幽默语言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毅然决定:自己动



手,从头摸起,准备用 8 年时间,把原子弹研制出来。后来,中央军委又进一步提出,发展尖端技术,要以“两弹(原子弹、导弹)为主,导弹第一”。陈毅元帅针对赫鲁晓夫的嘲讽,掷地有声地说:“就是脱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技术搞上去!”

为了表明自力更生的决心,为了激励科研人员奋发图强、勇于攀登的精神,毛泽东根据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1959 年 6 月,给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程取了个“596”工程的代号,同时明确指示:“总的工作由恩来同志统管。”

外国专家走了,许多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放弃优厚的待遇,奉命回国,与中国科学院和一些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一起,投身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之中。

从此,“争气弹”成了原子弹的代名词,一切为了“596”,成了所有参与原子弹研制、试验的人们响亮的口号,宁可砸锅卖铁,也要造出自己的“打狗棍”。在菊香书屋的书案上,毛泽东饱蘸浓浓的笔墨挥毫疾书:“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一个“愤”字,凝聚了一个民族的豪情壮志!

1962 年 12 月 26 日,一个风雪飘飞、腊梅绽放的日子。这一天,是毛泽东的 69 岁生日。他预感到在 1965 年以前,第一颗原子弹极有可能爆炸成



功,于是诗兴大发,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这首诗向人们宣告:无论是美国的核讹诈也罢,还是苏联的“卡脖子”也罢,英雄辈出的中国人民决不屈服!毛泽东坚信:不管风云如何险恶,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在大西北旷古洪荒的罗布泊畔,随着一声巨响,一股蘑菇状烟云腾空而起,直冲云霄。

毛泽东立刻得到报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可以想见,毛泽东在得知这一消息时,心情该是何等的兴奋!在那个令人铭心刻骨的“596”之后,仅仅五年时间,中国人民硬是在严密的技术封锁和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了原子弹。人们更无法统计,那一刻,在罗布泊畔,在首都北京,在大江南北,在大洋彼岸,有多少中国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中国,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侮的民族,再不是那个任人祸害宰割的“睡狮”了。随着中国“巨龙”的腾飞,中国人正





以崭新的姿态,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曾几何时,一些核大国气势汹汹、咄咄逼人,而此刻,那个不可一世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慌乱地惊呼“中国的核爆炸“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幸的时刻之一”,“不应该对这件事等闲视之”。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在西方国家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中国人何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在关键时刻卡中国人的脖子,嘲讽中国人“连裤子也穿不上”的赫鲁晓夫,却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中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被他的手下人推下了台,不久便销声匿迹了。

不过,这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沉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为了进一步打破核大国的核控制,他以其伟大战略家的胆识和气魄,又响亮地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27. 困难时期

1960年的冬天来到了。寒冷的北风呼呼地吹着，枯黄的落叶伴着沙尘漫天飞舞。北京城里一片冷清。这时，刚刚度过11岁诞辰的年轻的共和国，正进入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在国内，由于急于求成，毛泽东在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违反了经济建设的规律，造成了极大损失。再加上连续的自然灾害，造成农业减产。在国际上，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我国工业建设带来了严重影响。人民生活日益困难，吃、穿、用的东西严重缺乏，城市用粮严重告急，经济困难状况压倒了一切。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经济困难是暂时的。他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同甘共苦，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在这方面，作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时刻铭记进北平时说的“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誓言，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以



他的实际行动,给全党做出了表率。

当时,毛泽东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在中南海内一所古老的砖瓦平房院落里。一个过道将北房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侧的一间是毛泽东的宿舍,一张睡惯了的硬木板床摆在靠北墙的中间,上面放着用白布包起的荞麦皮枕头。被褥都是棉布棉花做的,色很淡,里外套上白布。因为毛泽东有躺在床上看书、看报、办公的习惯,所以,他的床很大,足有五尺宽,一半是用来放书的,平时书堆得足有一尺多高。床头西边有个小桌,上面放着台灯和香烟、火柴。西山墙南侧面有个立柜,挂着两件随时穿的衣服。此外,还有两把椅子散放在室内。当中的过道,摆着一张圆桌,就算是餐厅了。进入西厢房,便是毛泽东的图书室,里面贮藏着他经常阅读的书籍。办公室在东厢房,一张写字台靠近西窗下,写字台前是一把老式的转椅。东西墙前摆着一大两小三张沙发和一个茶几,靠近北墙立着一个衣架。这就是毛泽东当时的办公设施。

在生活上,毛泽东也带头过艰苦日子。他对保健医生说:“我不吃猪肉和鸡了,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我看有米饭、青菜,有盐、油就可以了。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起渡荒还债。”

毛泽东不吃猪肉,服务人员又想办法弄点鱼和别的肉类给他吃。谁知这样一来,毛泽东干脆宣



布：“不吃荤菜了，只吃米饭和青菜。”身边的工作人员急了，便一起劝他说：“主席，你不能这样了，你这样下去会把身体搞垮的！”

“全国人民都是这样，我哪能一个人搞特殊啊！”毛泽东感激地望着大家，语重心长地说。

以后，毛泽东让炊事员每顿只给他炒一碗青菜，两盘小菜，并要常做些粗米、小米合起来的“二米饭”吃。就连这样的清淡饭菜，他都舍不得一个人吃，每天晚上这顿饭，都一定要值班的卫士跟他一起吃。

在家里，毛泽东对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都十分疼爱，但对她们的要求却也十分严格。两个女儿考上大学后，毛泽东安排她们都在学校吃住，和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住在宿舍里，睡上下铺，吃一样清淡的伙食。平时，她们总是穿一身旧蓝布衣服，和同学们一样上课，一样劳动，一样参加各项活动。她们两、三个星期才回家一趟，不是骑自行车，就是挤公共汽车，毛泽东从不允许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她们。

一次，卫士长李银桥得知李讷在学校食堂吃不饱饭的情况后，便搞了一包饼干，悄悄地给李讷送去。

毛泽东得知后，对着李银桥大发脾气，厉声说道：“我讲过多少次了，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的嘛……”李银桥知道毛泽东的脾气，低着头，小声嘀咕道。

“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毛泽东一拍桌子，“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女儿！”

毛泽东穿的也十分俭朴。他有两件睡衣，已穿了好多年了，线开了，就缝一缝再穿，哪里破了，就用块旧布补起来，也不知缝补了多少次。一次，工作人员偷偷地给他换了一件新睡衣。毛泽东发现后就很不高兴，还是坚持要穿旧的。直到逝世，毛泽东一直穿着这两件睡衣。有人数过，这两件睡衣，一件上有 67 个补丁，另一件上有 59 个补丁。

在三年困难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生活是这样，那么，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又是怎样呢？毛泽东是从一位农村来的亲戚那里得知实情的。

那也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毛泽东堂兄的儿子贺凤生从湖南老家赶到北京，一见到毛泽东便说：“主席，你晓得乡里现在的情况吧？晓得下面刮‘五风’（即当时基层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等）吗？晓得现在有些干部作风多坏吗？”

“好哇，我正要听听这方面的情况。”毛泽东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并让他好好准备一下，找个时间专门来谈。

不久，贺凤生应邀向毛泽东汇报。



他大着胆子,向毛泽东讲述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提出后,乡下大刮“五风”的情况:一家一户都拆了房子去居民点,搞得到处鸡犬不宁。干部把一两百户人家弄在一起过“共产主义生活”,只允许一个大队开一个食堂,吃大锅饭,餐餐萝卜菜红烧,缺油少盐,吃得男人大肚子水肿,女人没法生孩子。就这样,干部还在到处吹牛皮,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仓里明明没得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哭爹骂娘。

讲到伤心处,贺凤生落泪了。毛泽东皱着眉头,静静地听着,不时抽上一口烟,抬眼望着窗外,陷入久久的沉思之中。这次会见,不知不觉谈了三个多小时。

贺凤生要回家乡去了,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高兴地对他说:“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我已经和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交换了意见,党中央国务院进行过研究,认为食堂要拆散,生产要恢复,浮夸风要制止。我给你个权利,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真的,社会上像你贺凤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

与贺凤生的谈话,对毛泽东触动很大,很快,便将他的正确意见,吸收到制定党的方针、政策上来。1961年1月,毛泽东主持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会上,讨论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调整为重点,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全面恢复与发展;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次序,提出先安排吃饭问题,后搞基本建设的思想,经济建设速度不能过高,要求不能过急,只能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会议强调,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大办粮食,争取农业丰收。会议还明确指示,开展整风整社,坚决纠正“五风”现象。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力开展调查研究,1961 年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会后,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中央领导、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纷纷下到基层作调查,毛泽东也派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下去作调查,调查之风在全国上下盛行起来。

广泛的调查研究,对迅速地纠正错误,缩短经济困难的时间,减轻人民承受的痛苦,起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敢于正视错误、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精神,深受党和人民的赞许。

1961 年 8 月,毛泽东在江西庐山与有关人员谈话时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以便多作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做官僚主义者;二是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还请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地质学家,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自己的



一生写进去,把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人民去评说。我认为自己的好处占 70%,坏处占 30%。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不是圣人。”

在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他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并提出了“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的名言:“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发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精神,人们并没有一味指责工作中的失误,而是团结一致、奋勇向前,更由于一直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终于渡过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欠苏联的全部债款,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1964 年底、1965 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28.“文化大革命”风云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毛泽东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由于他对中国革命的成功所建立的巨大功绩,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当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威望。人们把他视为伟大领袖,人民的救星,认为只要听毛主席的话,按他的指示办事,就会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但是,历史证明,任何伟大的人物都不可能完全正确,不可能不犯错误,毛泽东也是一样。

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在晚年逐渐脱离实际和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

自 1962 年春“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的思想和注意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认为 在最近几年内,国内的和国际的阶级斗争都非常激烈。赫鲁晓



夫的上台,就是修正主义的上台,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主要的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且这场斗争将会长期地斗下去 在国内,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并且与国际上的斗争紧密相联。

这种对阶级斗争的夸大估计,逐步形成了一个“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思想,后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65年以后,他又认为他的接班人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必须变更接班人。

毛泽东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于是,1966年的夏季,在毛泽东的发动和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党的各级组织



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1967年1月,从上海开始,在全国刮起了夺权之风,到1968年9月15日止,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对此十分欣慰。因为全国的党政机关已瘫痪很久,无政府状态必须早日结束,才能稳定全国的政治局势。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会上,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刘少奇错误地定为“内奸、工贼、叛徒”,“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还把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当作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入党章,严重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完全确定下来,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取得了党中央的不少权力。

1969年11月,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直到1980年才平反昭雪。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文革”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



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虽然有意要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但“九大”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九大”之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又开始争斗起来。

“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林彪做了不少讨好毛泽东的事。他大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从人的行列里，吹到神的位置上，从领袖成员中的一分子，夸大为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所谓超天才。“九大”之后，林彪一伙同江青一伙在一些问题上产生矛盾，又认为毛泽东有意改换接班人，就迫不及待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攻势，企图搞掉政敌。

当林彪一伙急于抢班夺权的阴谋被毛泽东揭穿后，他们又开始阴谋策划“武装政变”计划，即“五七一”（“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工程，要以暗杀手段谋害毛泽东。

毛泽东察觉到林彪一伙的野心，1971年7月，他南巡两个月，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揭穿林彪的阴谋，并巧妙地避开了林彪爪牙的陷害，于1971年9月12日安全回到北京中南海住地。

谋害毛泽东的阴谋未能得逞，林彪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南北割据。在这个阴谋又流产后，林彪改南逃为北叛，决计向北逃往国外。

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50分，林彪偕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等乘坐三叉戟飞机飞出国境，进



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叛国的面目彻底暴露。在此之前,有人曾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毛泽东听后沉思半晌,才慢慢地说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历史真是铁面无情。人们万没想到,林彪乘坐的飞机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坠落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荒原上,机毁人亡。

林彪集团的覆灭,是令人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以后被称为“九一三事件”。它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失败。

“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的打击太大了。在那些日子里,78岁的毛泽东一下苍老了许多。由于长期大量地吸烟,毛泽东患了支气管炎和肺气肿,一段时间,还患上比较严重的老年性疾病——大叶性肺炎,他每日因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和学习,为国家的安危决策着一件又一件大事。有许多时候,他默默地回顾着几年“文化大革命”的历程,陷入长久的思索之中……

毛泽东在晚年曾对人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



命。”

实践证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使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中国人民将永远感激他，并将永远载入历史的史册。而他做的第二件大事却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他本人也承认，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也造成了毛泽东人生中的悲剧。



29. 历史性的握手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动乱，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但这并不是说，这十年中就毫无成就可言。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领导下，我国在国防和外交上的成就就非常引人注目。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的乐曲响彻太空。

这些成绩的取得，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增强了保卫祖国安全的力量，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国民党的代表悄悄地离开了联大会场。当



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电报,邀请中国迅速派代表团参加联大。

当天下午,已在病中的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立刻给周恩来打电话,明确指示:

“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指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为代表或是副团长”。

不久,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当乔冠华以他那特有的风采和洪亮的声音宣读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发言稿时,会场多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心把很早就开始筹划的改变中美、中日关系的大事提上日程。

还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明确表示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 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后来,在25日的《人民日报》上,又以头版显著的位置刊出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



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出了信息。

1971年春天,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樱花盛开的日本名古屋举行。毛泽东抓住机遇,断然决定,让已两届未参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参加比赛,并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这一出人预料的决定,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并被冠以“乒乓外交”的美名,获得了“小球转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就这样,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被一双大手轻轻地推开了。

1972年2月21日,又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美国总统尼克松真的到了北京机场。当时,毛泽东虽在病中,却清晰地记得尼克松定于这天抵达北京。

尼克松到北京4个小时之后,毛泽东决定立即会见尼克松。这么快就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使刚刚到京的尼克松和他的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喜出望外,也忙坏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当时,毛泽东正在生病期间,客厅里摆了一张大床以及其他一些方便病人的各种物品,客厅需要整理。更为麻烦的是,毛泽东近一个多月一直生病,衣貌不整,花白的头发长得很长,胡子也好久没刮了。要会见这么重要的外宾怎么能行?

可是,平时不很讲究衣着外表的毛泽东却只让理发、刮脸,别的事都无所谓——这就是毛泽东的



性格和脾气。不一会儿,理发师来了,很快便给毛泽东理完发,刮好脸,擦上头油,梳理好发型。当时毛泽东脚肿得厉害,过去的鞋穿不进去,只好换上肥大的新圆口黑布鞋,又换上新做的灰色“毛式”衣服。顷刻,人们熟悉的伟大领袖的形象,又出现在大家眼前,但却无法遮掩他身体的浮肿和虚弱。

不久,尼克松、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的丰泽园,步入毛泽东的书房。

当客人走进门时,秘书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毛泽东站立起来,欢迎尼克松的到来。当他们两人握手的时候,都感到非常高兴。一位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一位是东方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家,在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在这里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

尼克松后来是这样来描述他眼中的毛泽东的:“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分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

等到尼克松在沙发上坐下来之后,他惊异地发现,这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上也堆着书,整个房间看上去与其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的会客室,不



如说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

彼此寒暄了一会儿后,基辛格对毛泽东说:“我在哈佛大学任教时,曾安排学生研讨你的著作。”

“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毛泽东用中国人典型的谦虚口吻不经意地说。

“您的著作已经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世界。”尼克松接着补充道。

“我一直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我顶多只能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而已。”尽管毛泽东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思维却像闪电一样敏捷。

在谈到美国总统选举时,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还笑着说:“在您上次的竞选中,我投了您一票。”

“那您一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指周恩来)邀请我们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只争朝夕”这四个字,毛泽东会意地笑了。这四个字,是他在1963年发表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中提到的,想不到,竟被这位远隔重洋的美国总统记住了。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状



况,这次会谈本来只安排 15 分钟,由于毛泽东的谈兴很浓,他不顾周恩来频频看表的神情,一直延续到一个小时,直到已明显地露出倦容时才结束。

毛泽东站起身来,拖着脚步慢慢地走向门口,嘴里毫不掩饰地对尼克松说:“这些年来,我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尼克松说。

毛泽东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这次会谈,又一次表现了毛泽东非同一般的思想、性格和谈话的魅力。他没有客套话,也不谈具体问题,谈的内容虽然使人感到离题很远,但过后体会到,所谈的内容,正是上海公报的框架。基辛格发现这点后,非常敬佩毛泽东,他竟然把一个极其严肃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放在谈笑中完成了。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之后,由周恩来和尼克松会谈,完成了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按原定日程,第二天就要发表公报了,但随同尼克松来访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却吵吵嚷嚷地提了许多意见。

怎么办?

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听了,一阵剧烈的咳嗽过后,一改他与尼克松会谈时的轻松与幽默,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坚定地回答:“你可以告诉尼



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停了一下,毛泽东习惯地吮了下嘴唇,一字一句地说:“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晚年的毛泽东虽然疾病缠身,但他那维护祖国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坚强意志,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2月27日,人们期盼已久的《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了。从此,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这是双方对立、隔绝20多年后出现的突破,有力地改善了中美关系,举世震惊。

4年之后,当下台后的尼克松再度访问中国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糟了。他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只能从喉管里发出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只能靠在笔记本上写字来进行交谈。尽管如此,看得出,他的思想仍然是那样敏捷、深邃,他的性格依然是那样刚毅。谈话结束时,秘书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搀着他为尼克松送行。但当电视镜头和聚光灯对着他们,要录下他们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一下推开他的秘书,一个人站在门口和尼克松告别。

中美关系的改善,有力地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两国政府经多次接触后,在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



中国。27日,毛泽东接见了田中角荣。会谈中,他以宽广的胸怀和远大的眼光,本着向前看的原则,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做了安排。

晚年毛泽东深谋远虑,紧紧把握住历史时机,促进了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为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改变世界的形势,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共同奋斗的结果!



30. 最后的路程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在 1972 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他还多次严厉批评了极左思潮。这种做法却引起了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如出一辙,他们正是靠极左思潮起家的。于是,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纠集在一起,极力反对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对双方的分歧,毛泽东直接出面“裁决”,认为应该批极右而不是批极左。这就使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了。这样,“文化大革



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避免地继续下去。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他。毛泽东深知,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他在支持周恩来陆续解放一批老干部的同时,决心起用已被打倒的邓小平。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1973年8月党的“十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这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他的政治生涯转机的开始。但是,复出后的邓小平一上来便面临着与江青集团的尖锐斗争。

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41岁的造反起家的王洪文被提到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也分别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这就为他们结成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创造了条件。1974年初,毛泽东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想借此统一人们的思想,肯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这个口号,把矛头对准了他们篡夺领导权的最大障碍周



恩来和一大批老干部,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江青一伙。他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还针对江青到处说“我代表毛主席”的谎言,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在会上,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搞帮派活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泽东的批评,无疑是对江青一伙的一次沉重打击。

1974年夏,周恩来因病情恶化住进医院。就在这年8月,毛泽东的眼病被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但要等成熟后才能采取手术措施。这对于手不释卷的毛泽东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啊!周恩来得知后,十分着急,除指示眼科专家会诊外,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毛泽东。

1975年1月5日,由于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邓小平正式出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堵住



了“四人帮”篡权的道路。会后,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大刀阔斧地开始整顿工作,纠正“文革”中的一些错误做法。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主持了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再次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并迫使江青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检讨。这对遏制江青的嚣张气焰,起了关键性作用,也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条件。

1975年7月下旬,毛泽东左眼的白内障已经到了成熟期。为了重见光明,他接受了手术治疗的意见。手术时,毛泽东特意让人放那首充分表达爱国志士宽广胸怀和伟大抱负的曲子——岳飞的《满江红》。毛泽东特别喜欢这首曲子。他边听乐曲,边接受手术。在这沉着有力的乐曲声中,大夫从容不迫完成了针拨手术。第二天,毛泽东的左眼重见光明。在场的人都感到无比的高兴,毛泽东也开心地笑了。

在这段日子里,邓小平领导的对国民经济的整顿工作已到了关键时刻,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国人民在危难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然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却使用一切手段否定整顿工作,在毛泽东面前诬陷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这一点恰恰正是毛泽东最担心的事情。因为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做他一生



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种不安和担心也越来越强烈。正如他反对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一样,他虽然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但却不能容忍从根本上否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发生。本来,毛泽东希望由邓小平主持,按照“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口径,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以便统一认识。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要求,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失望,下决心进行“批邓”。于是,“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全国局势重新陷入混乱。

1975年10月下旬,在北海西岸三〇五医院内,周恩来做完最后一次手术,病情日见加重。而一堵红墙之隔的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后来,两条腿也不能走路了。此刻,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共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半个多世纪的老人,虽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

1976年,共和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年来到了。

1月8日上午,一夜未眠的毛泽东侧卧在床上,正静静地听秘书读着文件。突然,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急匆匆地赶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



毛泽东听后，沉默不语，很久，才轻轻地地点了点头，慢慢地闭上眼睛，顷刻，两行泪水从眼角流了下来。对于周恩来的逝世，毛泽东也许早就料到了，但此刻，他已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对战友的哀思了……

在十里长街送总理的路上，人民群众悲痛欲绝。这时候，他们多么希望毛主席能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呀！四年之前，也就是像今天这样的寒冬时节，当陈毅元帅不幸逝世时，病中的毛泽东曾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追悼会上。毛泽东身穿大衣、带着黑纱，向党旗覆盖着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三鞠躬的情景，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然而，这一次，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的病情，便没有安排他参加有关周恩来逝世后的一切活动。而这时的毛泽东，也确实已无力行走了，他只能痛苦地仰卧在病床上，以长久的沉思，来寄托对战友的悼念。

1976年的春节到了。在那个寒冷的除夕之夜，毛泽东身边只有几个工作人员相伴。他像往常一样，侧卧在床上，让人帮着一勺一勺地喂，吃了几口他平生最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饭后，他用刚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

随后，听到房外一阵劈里叭啦的炮竹声，毛泽



东那因病而变得松弛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这样，毛泽东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个除夕之夜。

春节过后，在江青一伙的鼓噪下，批判邓小平的运动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同时，人民群众对“四人帮”无比仇恨的烈火，也在心底熊熊燃烧，等待着燎原的一天。

这一年清明节前后，北京几十万群众抬着花圈、举着挽联，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在全国各地，也同时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四人帮”采取卑劣手段，欺骗党中央和病中的毛泽东，把这个运动定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在4月5日这一天，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残酷的镇压，邓小平也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又一次被打倒。“四五运动”是人民群众积蓄多年的对“文革”不满、对“四人帮”愤恨的情绪的总爆发。虽然被镇压下去，却为后来打倒“四人帮”创造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这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病情更加严重了。6月初，毛泽东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才度过了危机。可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却接踵而来。沉重的打击一个接一个：

7月6日，与毛泽东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朱德



委员长突然逝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全市房屋毁尽,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人。全国人民忍痛抗震救灾。

地震后,为安全起见,工作人员将毛泽东抬到屋外,安置在临时的抗震棚里。此时,毛泽东已卧床不起了。

8月28日,人们背着江青,把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女儿李敏叫到毛泽东身边。当时,毛泽东还能看清她是李敏,握住女儿的手,闭目不语。李敏以为父亲睡着了,想把手抽出来,但毛泽东紧紧地抓住女儿的手,并睁开了眼,含着泪水,与女儿说话。

9月5日,毛泽东病情严重恶化。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从9月7日到8日下午,已在垂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经连续四个多小时抢救无效,毛泽东走完了他生命中最后的路程,与世长辞了。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如同晴空中的惊雷在神州大地上炸响。全国上下,一片悲哀。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怀着极其沉痛和无限崇敬的心情,隆重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在全国的工厂矿山,在行进的列车上、军舰上,汽笛长鸣,声震长空,举国上下,默立致哀。



追悼会过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便紧锣密鼓地加快了夺权步伐。他们万没想到,代表人民群众的正义力量率先挥出了铁拳。10月6日,中共中央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采取断然措施,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此,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同国内外敌人做斗争,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的业绩永载史册,他的英名万世流芳,他的思想和事业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同时,也植根在世界各国朋友的心里。

现在,毛泽东已离开这个世界四分之一世纪,他亲手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澳门已经回归祖国,海峡两岸的统一



大业正在逐步发展。中国人民已经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他热爱的祖国,正大步融入世界经济的洪流之中。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将在新一代中国人的手中变为现实。

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毛泽东。



主要参考书目

《毛泽东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

《毛泽东传》（修订本），（美）R. 特里尔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31年12月版。

《毛泽东传》，（美）斯图尔特·施拉姆，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文人毛泽东》，陈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毛泽东之谜》，晓峰、明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青年毛泽东》，高菊村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毛泽东谈毛泽东》，胡哲峰、孙彦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毛泽东的后半生》，（美）罗斯·特里尔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5月版。

《伟人之初 毛泽东》，曹志为著，浙江人民出版



社,1991年5月版。

《毛泽东轶事大观》,王伯福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

《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孙宝义编著,知识出版社,1993年1月版。

《统帅毛泽东》,肖显社、王丽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李越然回忆,权延赤整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毛泽东轶事》,董志英编,昆仑出版社,1989年3月版。

《东行漫记——新中国从这里走来》,阎涛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版。

《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陈晋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陈敦德著,昆仑出版社,1989年出版。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汪东兴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走向神坛的毛泽东》,李银桥著,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3月版。

《毛泽东的故事》,李银桥、权延赤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8月版。



后 记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我的老首长、总参谋部办公厅主任林建超将军的热情鼓励,邵华将军的秘书何炳富先生也给予真诚的指导。书稿写成后,著名作家、《早年周恩来》的作者庞瑞垠老师和出版社资深编审邵平先生在百忙之中审读和修改,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解放军理工大学的纪鹏飞、单海波等同志帮助打印、校对书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的夫人刘淑琴、女儿孙燕楠、外甥女孙岩作为这本书的最初读者,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书刊,吸取了许多专家、学者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谨向上述同志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期待着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1 年 12 月 26 日初稿

2004 年 4 月 22 日改定